

# 玫瑰女王



## 阿根廷首位民选 女总统

**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

翻译：吕霞 (Eva Blanco)

作者：Sandra Russo

完稿于 2016.11.20



玫瑰的故事



Eva Blanco 大理  
2016年10月10日

特别鸣谢

CHINA-ARG CONSULTING LIMITED

中阿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对本书的全程赞助。

Eva Blanco

Buenos Aires, Argentina





第一本样书送给阿根廷驻华大使先生  
Primero libro al Embajador Diego Guelar

Embajada Argentina en Beijing, China

Nov 2016



# 目 录

译者的话 1

1 童年 1

我想找到73年的那个大学女生，问问她过去是什么样的生活。  
她的所思所想是否还在如今的女总统身上呈现。

1955年政变的恐怖回忆  
原生家庭父母关系不和

2 一段痛苦的记忆 39

“我们会事情有着不同的看法，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世界观”

一颗照明弹落家里了  
叔叔被枪杀了  
童年里书籍的陪伴

3 女院高中生涯 51

美丽是女人的责任。

## 4 优雅与权力可否兼得？ 63

女人们总是会对那些看起来或我们认为比自己优秀的其他女性产生嫉妒。这说出来并不光彩，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我们自己的小曲肚肠里，依旧是像先前的黑猩猩一样，渴望着雄性首领把目光停留在发情期的我们身上。当看见另外一个女性展示出如烟花般绚烂的光芒，而我们自身只是微弱的星星之火时，就形成了嫉妒肆意滋长的基础：即有些女人做到了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于是只能被那可怜的小火苗所牵引，这就是嫉妒。当然在当今社会，“雄性领袖”是一个开放性的比喻，可以指向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权力。

## 5 活跃的党员 85

我对她说“妈妈，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  
然后，突然各个角落都出现了枪炮声。  
有从看台那边过来的，也有从后面过来的。  
我拉扯着妈妈，在争吵。  
她喊叫着“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从这里拉走”。  
一个恐怖场景下的一场荒唐的争论。

## 6 闪婚了 102

他看见她非常漂亮，听见她一直笑，整个旅程都在笑，就决定留在前面的座位没过去打招呼，几乎是躲起来的。

就是在这个 2 月 16 号,在这辆公交车上,他发觉他们交往的时候,Cristina 从来就没有如此开怀地笑过。

他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也正是这一天,他知道自己永远地失去了她。他放手了。

## 7 同是革命伴侣,两种不同人生。 113

Cristina 被关在一个女子监狱。那个月被拘留的有 3 个女犯。有一个之前是女警,她因在马黛茶里放了老鼠药,试图杀害她丈夫而被捕。另外一个年轻女孩是被她继父强奸,被关起来是因为在公众场合扰乱治安。还有一个是刚向她的情人开了一枪。

在头晕脑胀的阵痛里,她认出了那件栗色的灯芯绒裤子,这一幕永远地刻在她的脑海里。这条栗色的灯芯绒裤子,能证明眼前这个小小的,饱受屈辱和折磨苦楚的男人就是 Chiche。他戴着兜帽,赤着脚,戴着手铐,指甲没有了,满是被折磨的流血的痕迹。

## 8 重返政治舞台,他实现了当省长的诺言 127

Néstor 曾说从一杯鸡尾酒到另一杯鸡尾酒是无法统治一个国家的。

当她听见 Néstor 当着梅内姆的面重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当她看着他孤身一人,高傲而果敢地站在人群中,她大声说:“这就是我嫁的男人!”

## 9 孩子, 两段生产经历 145

1977年, Cristina说:“如果在我换尿布的时候, 脐带掉下来了, 我就去死算了。”

1984年, Cristina再次怀孕了, 但是流产了。

1990年, Cristina当时是省议员, 在预定剖腹产的前一天晚上12点她还在办公室里工作。之后和同事去一家餐厅吃饭, 过了凌晨2点才躺下。几个小时之后, 花儿就诞生了。

## 10 家庭生活是一个避难所 156

Cristina让自己适应家庭生活, 甚至连她婆婆的炖菜她都照学得一模一样, 这是她亲近婆婆的一种方式, 去模仿她。

Cristina在分娩后, 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化妆。当她在圣马丁街上撞车时, 她的右颧骨被折断了, 而她大叫着要一面镜子来照。

## 11 她是用爱在捣乱 175

有一天他们被邀请到Kirchenr家, 去了很多人。带了几瓶葡萄酒, 2公斤的冰淇淋。中午, 开了两辆车过来, 下车后他们感到很奇怪, 里面很安静, 也没有烤肉的炊烟。他们走进隐秘的花园看见了他们。Cristina非常放松地躺在太师椅上, 专注于一本书, 而Néstor在花园另外一头读他的那本书, 他们俩都忘记了有访客。

## 12 Cristina: “这里不是兵营,而我也不是新兵” 182

Cristina 开始抛出一串问题,而这家伙开始冒汗。有人向会议主持传纸条,上面写着:“让她闭嘴!”

Carrio 指着一本大部头的书给 Cristina,对她说:“你得在这上面签字。”Cristina 回答:“我是不会在任何我没有仔细阅读过的文件上签字的。”

## 13 Cristina 的首席顾问对其的回忆 195

Maria belen 来到她面前,Cristina 做个手势让她靠近来,对她耳边说:“你看你的衬裙透明了。你穿起来非常好看。嗯?但是透明了,要尽量避免走光。”

## 14 Cristina 在卡塔玛卡省遭攻击 208

Diego Buranello 当时陪着 Cristina,当他回想起这段行程时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这么害怕。我觉得他们会杀了我。”

Cristina 走近麦克风,前面一系列的妇女向她扔鸡蛋。有一个鸡蛋砸中她的肩膀,粘着头发。她继续演讲,骄傲地在舞台上说:“不管怎么说,鸡蛋对头发还是有滋养作用的。”



## 15 从“第一夫人”到“女总统”的华丽转身 218

在墨西哥与墨西哥总统的午宴

与世界首富的晚餐

“当然了，阿根廷政客的一个特质就是不懂经济，你看 Duhalde。Anibal Fernandez 告诉我，Duhalde 曾经对他说经济会让他感觉无聊。”

## 16 总统夫妇在政治上分歧争论 230

“Néstor 在睡觉前，说了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我说：‘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了。’因为他这一生跟我在一起所有时光，都是在努力地保护我。有时候这让我很恼怒，因为我感觉他对待我就好像我是块水晶一样。”

## 17 愿天堂是你想要的模样 261

当我醒来，而你已不在身旁。

“他死的时候就在这里，在床上，和我在一起。我很安慰他是这里去世的，而不是在 Olivos 总统府。他非常热爱这个地方。”

## 后记 277

# 译者的话

## 第1话：话玫瑰

香港作家亦舒写过很多小说，很多故事男主角统统叫家明，取意能给家里带来光明的男子。而女主角统统叫玫瑰，无一例外的美丽，独立。很冷艳又不柔弱，像玫瑰一样还带着刺，并不好惹。

所以，当我第一次看见Crisitna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了玫瑰。可能是她最后入主玫瑰宫的联想，也可能是她喜爱玫瑰的联想，更应该说她像那些故事里的女主角一样，美丽盛开，让你赏心悦目，但是，别忘了，有时候，也扎人。

于是，一支玫瑰，插画首页。

你是你的传奇。

我是我的归宿。

人即境遇。

## 第2话：话翻译

小时候，吃饭时筷子拿到末尾，父亲说：“那是要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呢，那可得好好学外语。语言是与世界沟通的工具。”

很多年后的某个午后，在美国Florida实习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这句话，不禁莞尔。那天等了好久终于搭到了一辆Bus，吹着晚风，疲惫了一天的脚终于可以休息了。看着这个白人的世界，车上讲西班牙语的人要比讲英语的人多。这一年我19岁，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这个新鲜的国度让我欢喜，好奇，留恋。我很想跨越时间对那个拿着筷子的小女孩讲：“外语不止是一个工具。”

我们看见很多人会电脑，会制造，会驾驶，会滑雪，会厨艺，会修车，等等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技能，都是工具。但是语言作为工具的奇特之处在于，它能影响或者改变使用者。

比如之前一位女同学学习阿拉伯语，毕业后被外交部派去那边工作了2年，回来后由一个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姑娘变得内向了很多。她说“作为女性在那里太压抑了，再也不想去了，感觉身体里的一个自己被扼杀了。”

很多读外语的或者出国工作的人可能会有类似的体会。

要想了解当地的文学，要先了解其文化。要想了解对话的语境，要先了解其历史。要想了解当地人的行为，不妨先理解其价值观。

所以当我们学习语言,我们仅仅是学习语言吗?我们去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三观,意识形态,处事哲学,待人接物,然后我们不自觉地被潜移默化,有接受,有排斥,有认同,有鄙弃。那是“润物细无声”般的神奇呀。不知不觉,人改变于无形。

于是我们使用着这个工具,却改变了我们自己。我们是工具的主人,工具却以一种意识的方式控制着大脑。

多么奇特。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幻觉,不同的语言则给这场幻觉增添了色彩,使它有了异国情调的光芒。

这是一场经历。

这是一场冒险。

这是一次邂逅。

这是跟自己的不断告别。

于是有一天你发现,我们都变了,从身体到灵魂。

脚底走出的老茧,装进大脑里,变成了文化烙下的痂。

### 第3话：话女性的活法

小学时，最开心的时候是学期末，放学路上，手里摇晃着“三好学生”的奖状，恨不能顶到头上，一路小伙伴们“前呼后拥”，还要唱着大歌，张扬极了。然后回到家，手一甩，叫一声：“爸，你看。”老吕总是喜笑颜开：“咱给贴客厅的墙上，就摆电视机那面墙，那个显眼。”厨房里老妈传来的一句：“老小一德行”。我和老吕对视一番，捧腹大笑。

老吕有次语重心长地对那个上小学的女孩讲：“人生的旅途就像爬山。年轻时，我在山脚，你妈在山脚。后来，我爬到了山腰，你妈还在山脚。在后来，我都快爬到山顶了，你妈还留在山脚。这一路的风景要同行的人才能体会。爬高些，看看高处的风景。”

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些话。Cristina从中产阶级的普通律师，到国家议员，从“第一夫人”到女总统，这一路来，完全做了那个“一起爬山”的女人。

同样拥有巨大野心与欲望的女人，比如邓文迪。忽然在想，如果邓文迪出生在阿根廷，会有怎样的际遇？

只是不同的活法吧。

有人活成了饭粘子。

有人活成了朱砂痣。

有人活成了妖孽。

而她活成了女王。



科尔多瓦省长先生访华





科尔多瓦省环境与能源局局长访华



科尔多瓦市市长访华



## 第4话：话诗和远方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  
如今已四海为家

有难过也有精彩

每一刻难过的时候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  
从多少正在醒来

让我们干了这杯酒  
好男儿胸怀象大海

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

这笑容温暖纯真

节选许巍《曾经的你》

## 第5话：话“而立”

多年之前，网络上流传一位销售女神一篇写在三十岁来临这天的感言。当时也告诉自己，等我到而立之年时，也该有一段文字来留作纪念。

也就是这一年，刚好机缘巧合，坚持下来，终于有了这本译作。刚好定稿于11月20日，所以也权当是送给自己“而立之年”的礼物。

我们在不同的年龄会有不同的感悟。不同的境遇，练就了不同的我们。所以，大概没有感言一说，因为感言并无太多借鉴意义。所寻不同，所求不一，行路自异。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我写作，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特定的读者，我写作是为了光阴流逝使我心安。”

我想以之结尾，这本书的翻译是一直想做的事情，完成它让我心安。

所以不管以后还是“知天命”，还是“古来稀”，都愿时光与你我，从容相处，梦暖心安。

# 1

## 童年

我想找到73年的那个大学女生，问问她过去是什么样的生活。

她的所思所想是否还在如今的女总统身上呈现。

1955年政变的恐怖回忆

原生家庭父母关系不和

## 政变时期与裁缝

2010年9月初，我有了第一个与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关于编写此书的约见。地点是她在玫瑰宫的办公室。我永远也忘不了走向她时那漫长看似走不完的路。她站在办公室的那头等我，穿着带领口的主教红的西服外套。

在这里，我想把焦点转向一张Cristina 20来岁时在拉普拉塔市<sup>①</sup>动物园门口栅栏对面拍的照片，这也是一张在博客里流传很广的照片。她看向下方，长头发，一绺松散的头发用发卡卡着，露出了额头。她在抽烟，瘦瘦的身体藏在紧身裤里，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衬衫。

那个晚上，我跟她的谈话就围绕着这张照片。我提出的是：这个照片上的女孩，这个1973年的大学生，“过去是什么样的生活”。

虽然在大选的时候，我投票给Néstor，但说实话，并没有对他抱太大的信心。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不应该轻易去相信，应该谨慎，因为权力会使人堕落。就像阿根廷，在权力里，除了思想不断堕落，并

---

<sup>①</sup>拉普拉塔市：La Plata，位于阿根廷东部大西洋沿岸，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首府，2001年人口统计为57.4万。

没有其他经验。但是当看见 Néstor 政治上出现了一些大体轮廓后，当 Néstor 撤下 Videla(魏地拉)和 Bignone(比尼奥内)的画像时，当他在联合国会议说自己是“五月广场的那些母亲与外婆”的一个儿子时，当他讲起“肮脏战争”<sup>①</sup>中失踪的人，称呼他们为“我的同伴们”时，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虽然前方道路不知会如何继续，但它必将与过去的经历完全不同。因为从来也没有任何一个民主总统称呼“肮脏战争”中失踪的人为“我的同伴们”。

后来在采访中，听了有关他们青年时期的讲述，我了解到，当他说“我的同伴们”时，不是一个比喻，也并非一时的冲动。他们身上依旧带着73年拉普拉塔的激情，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党，虽然不赞成后来党的武装斗争，但是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梦想，梦想着拥有一个祖国而不是殖民地。

我相信那些包含着想法的诺言，这个诺言里还包含着那些死去的人们。我能感觉到他将会为那些失踪的人们寻回尊严，讨回公道。这是第一次，我去聆听那一代人的召唤，我感觉这也是在邀请我们去思考，邀请我们跨越个体的浮沉命运去思考。每次当他说到“集体的”，其实想到的不应该单单是现在。这个“集体”，这个“我们”，这些单词，还承载着那个年代的重量。

所以当我第一次构思这本书时，我想转向Cristina的这张照片。

---

①“肮脏战争”：在1976至1983年，当时阿根廷军事政府支持暴力抵制持不同政见的人民。超过2万阿根廷人被秘密拘留、折磨和杀害，这些人永远地消失了。他们成为了“失踪的人”。

我想恢复那个女青年的乌托邦，与她聊聊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想知道那个小女孩身上有多少东西依旧在这个女总统身上呈现，哪些想法她还依然保留，而哪些想法随着时光流转已悄然改变。

但在2010年的10月27日，Néstor 逝世。所有关于这本书的构思全都得改动了，而这还是最次要的。后来我提议放弃此书写作，或者往后延期，因为我觉得在Cristina失去了伴侣之后，去靠近她是不可能的。那边的回复是让我等，让我继续自己的工作，然后等一段时间，说她在处理她的痛苦。他们对我说，虽然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她在很多公众场合发表讲话，身着一身黑色，马不停蹄地工作，包括她成为寡妇的第二天。但是其实很多次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独自一个人哭泣，或者每天的某个时刻，当痛苦突然来袭，就躲在任何一个可以当避难所的地方。

也许应该说我也了解遗孀的生活，也知道她的负担，也正是因为深刻地理解和感同身受，我再次提议放弃本书的写作。而我总是收到来自总统的秘书长Oscar Parrilli 每次同样的回复，他总是说：“她能做到的，但就是需要给她一点时间，等她准备好了就会通知你的”。

虽然我也不全信，但还是与记者Werner Pertor忙乱地工作了几个月，与那些跟他们两人最亲近的目击者一起，重建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从政岁月。单独谈Cristina可以谈到1974年，但这之后就复杂了。因为Néstor与Cristina之间有一种很紧密又罕见的亲密关系。自从他们认识后，彼此的生活就交错重叠，你中有我，所以很难拆开，单独聚焦在某个个体上。

最后，我把所有能做的工作都做完，截稿再次逾期，我又一次想

把这本书推到另外的时间去写，来缓解我等待的压力与焦虑。就在这个时候 Parrilli 打来电话，对我说：“总统女士说这个周六，可以在卡拉法特(Calafate：总统南部的家)进行采访。”三天以后，我见到了她。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告诉过我，如果我要写关于她的生活，我们的谈话应该是在卡拉法特，这样就能去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白与绿。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她，也才能体会她刚来到这里时的感受。她说我应该去见见她的玫瑰花圃，那是她亲手带着手套养护的，说在卡拉法特的家里谈话要比 Olivos(总统住宅)要好，因为她在家的时候会更加放松，而她的家在卡拉法特，在南部。

在那第一次的访问中，我也保存了一段私人回忆，那是留给我自己的记忆。那天，我们在她的办公室聊到很晚，她的秘书递给她手机，是 Néstor 的电话。我刚好有机会听到了他们如何对话，目击了那些无比频繁的通话中的一个。她在后来的交谈中某个忧伤的时刻也向我提起过他们之间的通话。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晚上说了什么，但我记得他们说话时的语调。那是嘲弄的，戏谑的，随便的，放肆的，还夹杂着几句粗话。在一个时刻，Cristina 对他说：“我跟一个你喜欢的女记者在一起”，他应该在那边猜了一会，她沉默地听着，然后提出异议，笑着说“得了吧，亲爱的，你可没有喜欢这么多的女记者。”之后她挂了电话，对我说：“Néstor 让我替他向你问好。”

我见过 Néstor 两三次，但从来都不是单独见面，在这里我想回忆一下我接到的唯一一次他的电话。那是2004年的5月。我当时在日报 Pagina 12(《十二版》)的编辑部工作，是文化与演出节目板块的编



辑,但是也时不时地写一些政治专栏。那天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在5月25这天,成百上千的出租车,被广播10套鼓动,插着阿根廷国旗到大街上游行。而就在那前一天,Néstor还接受了这个广播电台的一个访谈,那是他任职总统最初接受采访中的一个。我当时写到“Néstor给了右派一块糖,然后可以预见的是,右派还会继续吸舔它”。这是那篇报道里放在中间的两行话,也没有特别突出。那个下午,报社转进来一个电话。他们对我说“主席<sup>①</sup>先生要跟你通话”,然后我等着看是什么组织的主席,没想到是国家总统。电话那端Néstor的声音响起,他问:“是Sandra吗?”我条件反射地回答:“是Néstor吗?”然后我为自己不合礼仪的话暗骂了一下自己。他没有计较,笑了。我不记得他一整句原话是什么样了,但最后部分是:“我习惯了和聪明的女性打交道。你可以想像,有个Cristina在我身边……”然后他对我说:“我打电话来,就是想告诉你,我看了你的文章,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是我搞错了。”而我就完完全全地仓皇失措了。

那个上午抵达卡拉法特,有人来接我,把我送到了酒店。Pablo Barreiro(巴勃罗·巴雷罗),总统女士的私人秘书之一,是个当地人。一个小时后他打电话给我,跟我确认说中午的时候他会回来接我,然后陪我到女博士<sup>②</sup>家。那个上午剩下的时间我就坐在酒店的画廊里,看着雪山覆盖的山顶,冰川散发出的云雾和阳光射线碰撞,光芒万丈。我也看见了卡拉法特的绿色。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随Pablo一起走过巨大的花园,在石头环

---

①西班牙语中,主席与总统同一个单词。

②女博士:对总统女士的尊称,有时人们也叫她女博士。

绕的围栅里，能看见那茂盛的健康成长的玫瑰花。呼吸着巴塔哥尼亚的空气，这片很多被访者多次提到过的土地，“那些企鹅”<sup>①</sup>提到过的地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强烈，也很厚重，有骨架。

Kirchner 夫妇的别墅特别大，是遵循在南部那种“有历史感”的建筑风格盖建而成的。黑色的金属材质顶部，砖头石块砌成的墙，窗台上的花。我们抵达后，上了几步台阶，门是开着的。Cristina 出来在前厅迎接我，穿着黑色的运动衫与裤子，脸庞干净。

地方很大，一个空间连着另外的空间，沙发的褥垫放在各个角落。一切都很舒适。除了视野很棒，其实没有很奢侈的东西。别墅坐落的地方能看到东达湾(Bahia Redonda)，还有雪山的峰顶。所有一切都很完美，所有东西都井井有条，各归各位。

一片安谧。

我们去离厨房最近的那个客厅，我猜应该是最常用的那个。她走在前面，指给我皮质沙发上的一个座位，我就在那坐了下来。她坐在另外一个沙发上。两个沙发之间有一个暗色木制圆桌，我在上面摆放了3个录音器，一个数码的，两个普通的。“这么多？”她问我。我告诉她，在那些等待采访的几个月里，我有两三次在凌晨惊醒，就因为梦见录音笔坏了，我们都笑了，然后她也懂得如何用了。当一盘磁带录完后，我拿出来翻个面或者换个新带子时，她说：“那个数码的还在录，是吗？”然后继续她的讲述。

我请她从最早期的记忆开始讲。公众所熟知的是，她的父亲反贝

---

<sup>①</sup>企鹅是南部特征，在此特指那些他们的信徒，拥护者。

隆主义，而她的母亲是贝隆党员。我也已经了解她与妹妹吉泽尔([人名] Gisele)亲密的关系，因为在第一次采访中，她曾经说过：“我甚至可以说，你知道吗？”好像被自己的话语吓到，“我妹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在她的讲话中有很多这种口头禅，比如说“你知道吗”，“看你说的”，“我从来没想过”，“你看我突然想到这或那”。我想她所说的很多事情，从来都没有一次性地放在一起说，如今跟着指引的线索脉络，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把她生命中所有的时刻都结合在一起。

关于她的童年与少年，在托洛萨(地名, Tolosa)与拉普拉塔市的经历，我知道的并不多，但有件事引起我的注意。在所有我找到的材料中，都把Cristina的家庭描述为核心人员家庭，即是父亲、母亲、加两个女儿，从来没有提过事实上是一个大家庭，有外公与对她们两姐妹影响很大的小姨。实际上，我让她从最起初的地方开始讲述，从最早期最古老的记忆开始。

她的思绪飘向过去。这时侍从在录音笔之间放了用白瓷盛着的带气泡的牛奶咖啡，还有一盘巧克力糖果，让我目不转睛。那是新鲜的闪闪发光的巧克力，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馅，在盘子的四个角上，摆放着树叶形状的巧克力。我一个也不敢去拿来品尝。



这幢建筑呈粉红色，庄重美观，通称“玫瑰宫”，是总统及政府总理的办公之地。玫瑰宫是标准的十九世纪意大利风格建筑。整个建筑楼高三层，但东楼加上地下一层为四层。1850年，根据时任总统多明戈·萨尔缅多(DOMINGO F. SARMIENTO)的建议，外墙涂成了粉红色。据说选择粉色是为了调和当时两大党派的纷争，此言真实性不定。但一百多年来，各届政府一直沿用该色，因此总统府被称为玫瑰宫。另据传说，当时特地在涂料中混合加入了牛血、猪油以保证外墙不易褪色。



玫瑰宫楼梯走道







Cristina 大学时摄于拉普拉塔市动物园门口



Néstor Kirchner (内斯托尔·基什内尔):

1950年2月25日于圣达克鲁斯省的Rio Gallego市出生，2010年10月27日因心脏病于圣达克鲁斯省Calafate卡拉法特市逝世，享年60岁。为他举行了国葬。

伴侣: Cristina Fernandez

子女: 儿子马西莫 Maximoo Kirchener

女儿花儿 Florencia Kirchenr

学历: 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法学学士

政治生涯履历:

1987年12月10日至1991年12月10日: Rio Gallegos市市长。

1991年12月10日至2003年5月25日: 圣达克鲁斯省省长。

2003年5月25日至2007年12月10日: 阿根廷国家总统。

2007年12月10日至——: 其妻Cristina任职女总统, 他作为“第一丈夫”。





图为 Néstor 下令取下 Bignone 的画像。

Videla: 全名 Jorge Rafael Videla: 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 1925年8月2日-2013年5月17日, 阿根廷政治家, 军人独裁者。

在胡安·贝隆逝世后, 其第三位夫人伊沙贝尔·贝隆上台。由于伊沙贝尔政治经验不多, 政局不稳, 游行抗议遍及全国, 恐怖主义肆虐。

1976年, 魏地拉以阿根廷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组织右翼军人发动政变, 推翻由伊莎贝尔·贝隆领导的政府, 建立军政府, 自封总统, 成为阿根廷现代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军政府领导人之一。魏地拉对阿根廷实施严酷的军事管制, 迫害左翼人士。他的总统任期以残酷镇压异见而恶名昭著。1985年, 魏地拉以反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1990年, 获得了时任阿根廷总统梅内姆的特赦。2007年, 阿根廷当局剥夺了对魏地拉的特赦, 旋即对魏地拉进行重审。2010年, 再度被判处终身监禁, 送往监狱服刑。2013年5月17日魏地拉在狱中病亡, 终年87岁。

Bignone: 全名雷纳尔多·贝尼托·安东尼奥·比尼奥内·拉马永, 前阿根廷将军。1982年7月1日—1983年12月10日任阿根廷总统。1982年马岛战争失败后, 阿根廷加尔铁里军政府辞职下台, 将权力交给由退休将军比尼奥内组成的过渡政府。1983年大选后, 比尼奥内政府将权力移交给民选总统阿方辛, 结束了阿根廷的军政府统治。比尼奥内是军事独裁期的最后一任总统, 曾被指控窃取失踪人犯的儿子, 被关七年, 2007年3月被通缉, 指控他在独裁时期非法军事逮捕人犯、在Campo de Mayo黑牢中侵犯基本人权及谋杀。2010年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



Oscar Parrilli: 内务肯人, 1951年8月13日出生, 已婚, 生有四子。1976年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律学位。曾任职阿根廷国家总统秘书长(2003年5月25日—2014年12月16日, 即为Néstor和Cristina两届政府服务), 阿根廷联邦智能局局长。主要功绩: 2010年组织举办“阿根廷5月革命200周年”纪念庆典, Tecnópolis科技工业艺术大型展会。



Cristina 和 Parrilli

女总统



记者 Werner Pertor



本书作者：Sandra Russo，  
报纸《第12版》主编





El Calafate: 埃尔卡拉法特, 是阿根廷圣克鲁斯省的一个镇, 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阿根廷湖畔, 邻近智利与阿根廷边境, 距离州首府里奥加耶戈斯约 320 公里。





El calafate: 卡拉法特风景胜地





Calafate: 卡拉法特的绿色与白色



Olivos: 阿根廷历届总统官邸



图为 Pablo 陪同 Cristina 的一些瞬间





Eduardo Fernandez: Cristina 的父亲, 公交3号线



母亲以及两位女儿：吉泽尔，Cristina。拍摄于Olivos总统府邸



1955年，阿根廷军政府发生政变







## 1955年

那是Cristina Fernandez记忆里能想起来的最早画面。一个同时是家庭的又是政治的画面。她那时才2岁半，而那个画面随着时间的发展被填充了语言。那两个抚养她长大的女人，她的母亲和小姨，站在那个4号街和32号街交叉口租来的房子的门口，那个房子现在已经重新装修了。奥费利娅([人名]: Ofelia)和诺埃米([人名], Noemi Wilhem)站在门口，看向电车站的方向。她的外公卡洛斯那时在里奥圣地亚哥(地名, Rio Santiago)的海关工作，每天会从那里下车，然后走回家。

小女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那天是政变的日子，那是在1955年。她的母亲和小姨很焦虑不安。她们把她抱起来又把她放在地上，她们走了几步路，又退了回来。她们在谈论外公。

“爸爸会回来吗？”

“爸爸还好吗？”

“爸爸什么时候能到呢？”

“那个不是爸爸吗？”

她们看向有轨电车站的方向，那也是和里奥圣地亚哥同个方向。背景远处是发红的天空，矗立着几根大柱子，挨着YPF的油罐，旁边就是海关了。Carlos Wilhem(外公)过去一直都信奉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保守党，但那时已经是多年的贝隆主义党员。在那天，贝隆被推翻，海军司令Rojas曾威胁要炸掉里奥圣地亚哥的蒸馏室。这个威胁在炮轰五月广场后成真了，使得贝隆无力反击，没有交战。

“这个画面是无声的，但是后来被重建了。”Cristina说。听她那些演讲中有些沙哑的声音，再和现在这个开始讲述那个小女孩的声音联系起来，会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妈和诺埃米姨就在家门口哭，握着手，看向那个方向。后来外公被扣留了几天。我们那时候都住在一起。我很爱外公和小姨，我的贝隆主义思想就来源这里。就是和他，就是和我的外公，我成为了贝隆党人。”

Carlos Wilhem外公曾经是保守派人，在那些激进党人开群众集会时，他曾带着两位男子去把他们汽车轮胎的气给放了。当Cristina还很小的时候，外公带她去海关。她对这些散步记得非常清楚。他们乘坐有轨电车到拉普拉塔车站，然后从那里乘火车。当Cristina开始叙述的时候，她打断了一下思路，因为她脑海里浮现出那个时期的另外一个画面。她记起了那些车站里海军里塞奥(Liceo)军校的学员，所有人都穿着白色制服和黑色的披风。

她说每次外公带她去工作的地方都像在是一个节日里。外公有个办公室，地板是发亮的木板。几年后，他找到那个入党证，是个褐色硬皮盖子的证，上面还有艾娃和贝隆的照片。当她给我讲述童年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次插入了政治理解。她对我说，如果想要更多地了解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就应该了解人民保守党，Solano Lima(索拉诺·利马)就从属于那个党派。贝隆党先期从人民保守党的信念中吸取了很多养分。她说，这不是像北部省份保守主义的那种代表了寡头统治的党派。

“我的外公是个穷人，从年轻时候起就一直在冷冻车间工作，若说保守，他有什么可守的？当贝隆出现时，出台了节日发礼钱、工人享有带薪假期的政策，你想像一下。他以前是米格斯(时任副省长：

Miguez)的人。我妈妈记得外公带她去副省长的办公室，米格斯问他：‘黑鬼，你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因为我外公是棕色的，而我妈妈皮肤很白，遗传了我外婆。外婆是一个西班牙美女，有着紫罗兰色的眼睛。在这些参观中，妈妈戴着红色的贝雷帽，很漂亮。外公和激进党人对立，你也知道在那个时期，都是革命者。”她笑着说。

人民保守主义思想讲的是，阿根廷应该有基础设施工程，有完善的道路交通，有政府的出面参与，但是认为阶级已经固化。而当贝隆出现的时候，很多人立刻出来拥护他，尤其是因为他主张的阶级间的移动和给劳动者提供的新前景。突然，这个政治的注解又和个人情感的回忆关联在一起了。

“55年的政变后，这些都结束了。因为我们立刻就被轰走了。”她说。

55之后，很多贝隆党法律都被废除了，其中一条是房屋租赁法。那个在4街和32街交叉口的房子是租来的。这引发了第一个社会震动：上千份租赁合同一夜之间都作废了。因为那些房主都要出租给新的房客来收取更高的租金。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至少对于还是小女孩的Cristina而言是这样的，生活开始变得艰难，四处漂泊。

她在这些担惊受怕随时会被赶走的长辈们中长大。经常搬家。他们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得把家具先寄放到一户人家。即便如此，伴随着贝隆党员的流放和自由的缺失，国家已是另外一番景象，和之后开拓的非常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家买了一块土地，后来盖建了自己的房子。那些贝隆党关于社会福利的法律已经被推翻，但是有工作机会，贫困指数也非常低。他们的房子是在7街和8街之间的比斯(街名，bis)522号盖建的，至今，Cristina的母亲还住在那里。

也就是在那里，外公把小孙女抬到自己的膝盖上，不是给她读连环画，而是给她看《我活着的意义》。尽管在那个时期，贝隆主义已经被禁止。那个小女孩还不会认字，但是也很专注地看着艾娃的服装。

那时候的裙子占据了她的童年时间一段很特别的记忆，这也说明了，虽然她没有刻意指出，当时的社会面貌：劳动者阶层有经济能力接触到棉缎、丝绒和纱。裙子、玩偶和书籍形成了Cristina童年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妈妈对我和妹妹吉泽尔总是关怀备至，有求必应。她自己的童年应该是更加艰难的，肯定没有那么多的玩具，因为她什么都给我买。Pierangeli玩偶，Viviana娃娃，还有很多很漂亮的玩具。有一整套的玩具，带餐桌和床，有厨房和衣柜。那时也把我打扮成一个洋娃娃。还有那些她亲手制作的裙子…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你知道吗，那些小女孩的裙子。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条我妈的黑色褶裙，非常精美，是碟形的，我经常在过家家时穿着来扮演她。很多年之后，我在“巧克力”（著名服装品牌）牌的服装店看见了一条一模一样的裙子，我当时就买下来了。我现在还在穿，对这条裙子有一种特殊的喜爱，大概是一种特别的情感记忆。我下次穿的时候，我通知你，让你看看。对于这些裙子，我还能记得几条，都是非常精工细作的，真的很精致。有一条刺绣的裙子是为我的生日做的，有着珊瑚色的丝绒腰带，非常精致。我还记得一条也是褶子裙，天蓝色的薄纱，背部镶着闪闪的假钻，娃娃领，闪亮的深蓝腰带。大概是因为这些记忆我特别钟爱腰带和皮带吗？是因为这些妈妈给我做的裙子吗？这样去回忆这些事情真是奇妙呀。

我的小姨诺埃米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死于癌症。但是当我还是小



孩的时候，我就看她化妆，非常喜欢。我妈和我姨都很会打扮自己，但我姨比较会化妆，我妈不怎么化。我姨还特别喜欢包包…对的，那些女士包。她是那种很冷艳的女性，非常妩媚。我还记得她的手，指甲总是修饰得很精致，经常会去修手，记忆中那些美丽的红指甲。我就是被这两位很有女人味的女性抚养大的，她们从来都没背弃自己身为女性的性别特征。相反，她们会不断地去强化女性气质，施展女性魅力。

我还记得另外的一条裙子，是蓝色的，那布料真是太精致了…这些布料妈妈都是去哪里淘来的呢？在拉普拉塔市有一个丝绸店，叫“表兄弟俩”，当时很出名，因为他们店里很多布料在其他店是没有的。和妈妈去他们家的丝绸店是我们出门的一个节目。”

Fernandez家人都和外公住在一起，当时外婆去世了，外公是一个人，还有小姨诺埃米，是个单身。这位小姨的生日是2月18日，和她妈妈因为Cristina生日日期的事情吵了一辈子的架，因为Cristina是在2月19日出生，而小姨让她妈妈去登记时提前一天，这样就能和Cristina一起过生日了。Cristina说她妈妈就喊到：“但是她就是在19号出生的，我怎么可能登18号？”后来就为这个事情争论了很久。她们也争吵，但是相处得非常好。

妈妈，小姨和外公都给她们姐妹俩买很多的书。那时候，那些书都是挨家挨户来出售的。百科全书、很多册的字典、整套的收藏、艺术历史、那些《十万个为什么》、那些辅导书。他们自己不看，都买来给Cristina和吉泽尔。但是他们鼓励要有上进心，这是他们对孩子们希冀。Cristina开始读所有到家的书籍，所有，连字典都看。这种习惯也保持到了今天。

书籍是一个避难所，一种娱乐消遣，一种暂停的状态，一种与世隔绝，同时也是新想法和论据的源泉。

她说她母亲不看书，除了其他各种原因外还主要是因为她一整天都在工作。她是税务局的员工，有一段时间当任过上司，从Cristina记事起，还是AERI(税收与不动产员工协会)行会的总秘书。Cristina说她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工会成员，“特别”两个字用了很突出的语调来表示强调，就像是印刷术里的表突出。20多年来，她母亲从来都没有请假。Cristina加重的语气里还包含了自豪。AERI(税收与不动产员工协会)是个省里的行会，和UPCN(国家公民联合会)的关系很差，就像和ATE(国家工人联合会)的关系一样。她妈妈曾说请假就会和劳动者有距离。

“在整个领导团队里，所有人都有请假，而只有她这位总秘书没有。看起来很怪异，对不对？”她笑着说。“也因为此，她很少在家。毕竟这是一个很牵扯她个人时间和家庭时间的决定。因为她除了自己的工作，还额外增加了工会里很繁重的工作。”

按Crisitna的描述，当她谈到她的童年，这幅家庭图景和后来她与Néstor Kirchner组建的家庭非常相似。至少在这个方面：都是在大家庭生活，这样有条件让女性出去工作、从政，因为孩子们是在大家庭的庇护下成长的。

我们在卡拉法特家的客厅里谈话时，手机响了，她亲自去接，这点挺引人注意的，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谈话，却没有秘书靠近来接电话。她听着电话，笑得很畅快，干净的脸庞散发着光芒，因为在电

话那端有个人在逗她。

“不，我没有对 Sandra Russo(本书作者)撒谎。嗯。所以说你本来是不想过来的，而现在要过来就是为了让她的不要听我的一面之词？哈哈。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嗯，好的，但是你要在球赛开始前赶到哦。”

当她挂了电话，她又笑了。

“玛西莫说让我不要对你撒谎，他会负责让你不听我一面之词的。你发觉了吗，这就是他的儿子？完全一致的DNA！他说，让我别对你撒谎，哈哈，这个厚脸皮的小兔崽子。”

这个电话让她很开心，也改变了她的脸上的气色。玛西莫占据了她的生命里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不仅仅因为是她的儿子，还是因为他的性格。他对她毫不让步，真不像是妈妈的儿子。玛西莫消遣她，刺激她，调侃她，会让她笑。他身上带着 Néstor 的那种幽默感，但是也有他自身独有的特质，就像他父亲一样。辛辣的、尖酸的、聪慧的。我已经看见她是如何回复这种亲昵的刺激，我想这会让她减轻内心深处的悲伤。后来，她对我说：

“我不知道 Néstor 是否有欺骗过我，即使他骗过我，我也无从得知了。但是我能确定的是他从来没有使我无聊。他也这样对我说过，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让他感觉到无趣的人就是我。从我一开始认识他直到后来他去世，Néstor 都会让我笑。”

## 父亲

可能编写脉络不是按时间顺序来，现在我们要去接近一位Cristina童年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她的父亲。她说过她的父亲是“反贝隆主义”，而为了彰显他的反贝隆思想，他是激进主义的或是军国主义的，这两者没什么区别。这是一种很辛辣的说法，Eduardo Fernandez(父亲名)看到这肯定会理解的，还会笑出来。但其实她和父亲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这是一段很艰难的关系，因为我父亲是在我出生后才和我母亲结婚的。也就是说，我是单身母亲的女儿。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无意间看见我父母的结婚证，然后再比对我的生日而知。他们是在我出生后，我妹妹出生前结婚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的外公、小姨和他相处得不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是反贝隆主义的。他不喜欢黑人”她说，虽然语调显示出她很费劲这么生硬地说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有些移民后代的文化吧。我的爷爷奶奶是西班牙人。他们两手空空地来到这片土地，但是非常勤劳，非常肯吃苦，直到拥有了一家客栈，后来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经济状况。我的爸爸凌晨起来去挤奶，这个他之前对我讲过。但是他不喜欢在农场工作，因为他说地广人稀，地与地之间隔着太远，还得弯着腰劳作。总之，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爷爷奶奶也卖牛，后来转行做了花匠。我还记得当我是小女孩的时候，去公牛市(西文城市名，Bell)看望他们，那时那里还是农村，看着那些他们叫的“玻璃屋”，其实就是花圃温室。我是被喂牛奶长大的，我的妹妹也是。妈妈没有足够的奶水，爷爷奶奶就每天把农

场里新鲜的牛奶带回，然后在家加热溶解。他们日子过得很好，开始买土地，买了很多土地，是那种移民对于砖砖瓦瓦不动产的狂热。父亲这边是5个兄弟姐妹，然后每人分到了一些。我爸爸不喜欢在农场工作，所以我的祖父母就给他买了一辆公交车，3号线的。他是这辆车的司机，后来又买了几辆，他就做上了公司的股东。”

这个父亲是不一样的。当Cristina谈起他时，这种距离感又回来了。现在她的脸没有像玛西莫给她打电话时那样发着亮光，也不像她回忆起母亲给她做裙子的细节那么甜蜜。她与这个父亲不是很亲密。

这个男人，当她出生的时候，还没跟她母亲结婚，后来在婚后，虽然搬过来和女方家人一起住，也与她母亲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也影响了她的一些性格特征。就像后来多年后，吸引着她的另外一个男人身上的特质也是：幽默感。

“我遗传了我爸爸的很多东西。”Cristina说，“我有爸爸的那种辛辣。我妈妈不是幽默的人。她甚至不喜欢笑话，有时还让她很厌烦。而爸爸是尖刻的，是一位观察者，非常聪明。我从来也不会忘记当我告诉他我即将嫁给Néstor那一幕。

当时我在他的小车上，因为小学时他总是带我去上学，后来也经常带我去上学的其他地方。那天我对他说：“我要结婚了”。他几乎还不认识Néstor。他对我说：“你要结婚了？你看哈，婚姻可不像是你衣柜里的衣服，不是说你可以穿上试试看是否合身，如果不合适还能换一件的。你确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吗？”我回答说：“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对话。后来他就不再说话了。

Néstor第一次来家里时，戴着方框眼镜，穿着绿色大衣，爸爸轻

蔑地对我说：“这家伙看起来就像是从小山上下来的”。

我认为他看Néstor就像看到JTP(贝隆主义劳动青年联盟)的人,因为那个时候UTA(阿根廷公车工人联合会)是受JTP(贝隆主义劳动青年联盟)管理,而当时他已经是公司的股东了,他是以企业主的身份和这个协会的人做斗争。可以说,他憎恨他们。

这就是当她还是小女孩时的家庭组成。一位是工会成员却不请假的母亲,把行动都体现在工会工作上。一位是企业主的父亲,不能忍受时常得和工会谈判工人的工作条件。

还有外公和小姨,他们接受他,但是并没有忘记,就是他,让Cristina母亲在生育她时还是单身,这是尊严上的伤害。那个伤痛在他们的关系中是不能修复的,尽管当她的妹妹吉泽尔出生后,家庭的氛围有所变暖。

“爸爸很喜爱吉泽尔,她也很爱爸爸。面对吉泽尔的时候,他变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父亲。最终爸爸和妈妈分开时,吉泽尔非常生气,还离家出走。因为不得不说的是:爸爸是很花心的。”

爸爸和妈妈一直都相处得不好。他们就是那种不能互相理解的夫妻中的一对。他们没有丝毫的相同点。“我从来也没有过多地去分析”,Cristina说,当她这么讲述时,我就联想起后来,她说的对心理学的困难。

说到妹妹,她确定地说,妹妹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我总是和妈妈抱怨,她爱妹妹多于爱我,对于这点,她自己也不能否认。因为这是完全真实的。”她脱口而出。所有人都很喜欢吉泽尔,她和Néstor也一样。吉泽尔当了医生,她一生都在公立医院工作,从来也

没想过去私立医院。她后来因为肿瘤疾病不得不退休。几年前，还受精神分裂的折磨，后来治愈了。

“媒体说是我得了精神分裂。大概对他们来说都一样，把所有事情混在一起。把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搞混。对一个家庭来说这是最紧要的事情，看着这么年轻的人这么痛苦。她生病的时候真是太可怕了。吉泽尔非常聪明，而且很敏感，可以说是极度敏感。有些人得这种疾病，会对事物有一种尖锐的透视能力，你能感觉到她几乎能猜透你，几乎能读到你的思想。她接受治疗后，恢复得很好。问题一直持续到她接受治疗，因为之前吉泽尔不想用药物。

对我来说，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疾病，非常顽固。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比一般的姐妹关系更加的亲密。她依赖我比我依赖她要多，因为我妈妈总是把她推向我。“和你妹玩去”，“不，妈妈，我不想跟我妹妹玩”。但是我就得承担责任，这让我头都炸了。她很崇拜我，我是她的偶像。Néstor也很喜爱她，他对他的感情也是。

当Néstor和Cristina结婚之后，他们背弃了贝隆主义革命思想，因为他们反对武装斗争。吉泽尔那时每天都去公牛市的家里去看他们，那里还住着Chiche Labolita和Gladis Dalessandra。有一个周日，Lopez Rega被推翻，CGT(劳动者工工会)组织了一场游行。Néstor和Cristina都没有去。

“那个周日，我们在家组织了烤肉。来了Kuto Moreno(库托·莫雷诺)、Hernan Fuentes，也就是现任参议员Marcelo Fuentes的兄弟，那时他已经毕业，还有Cachito Caballero，一个内务肯人，以及Carlos Negri(卡洛斯)，曾经是贝隆正义党的议员。

当吉泽尔从游行中回来时候我们都在家。我开始检查她的活页



夹，找到了一张艾娃的宣传单。我立即就炸了，对她尖叫：“你到底在做什么？”我一直训斥她。Néstor从房间的走道上也大喊大叫地过来。我们对这件事情看得很明白，也很反对。这是赤裸裸的政治里的军国主义。这只有在流放，专政时期才有意义，但是在民主社会是不可以的。在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里，即使我们不喜歡，也不可以这么做。而且我们这些青年组织的人，我们去那些郊区，人们出来欢迎我们，是因为我们是贝隆主义思想的人，而他们也是。你可以和贝隆吵架，持异议，但是，“和那些跟随贝隆主义的民众，你又能做什么呢？他们是不会与你辩论讲道理的”。那个周日，我们都对着吉泽尔发飙，我最后说：“他们会杀死你的，蠢货”，我和Néstor抓着她，然后说服她。

“我们救了她的命。”她点头肯定地说，目光看向空无处，“我们救了她的命，我确定。我们救了她的命。”





《我活着的意义》：贝隆夫人的著作。



女总统



## 2

# 一段痛苦的记忆

“我们会事情有着不同的看法,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世界观”

一颗照明弹落家里了  
叔叔被枪杀了  
童年里书籍的陪伴

## 为何杀害 Pilín 叔叔

当我终于在她的面前，她独自讲述，有时候都不看我，坐在这黄褐色的沙发上，一杯杯地喝水，那些关于童年和青春期的回忆再次浮现。有些记忆并非人为意志所能控制。她谈到了以那个大时代为背景的重要政治事件里的个人生活。

她也意识到政治背景与个体生活紧密相连。她成长在一个政治化的家庭，但是有些事情跟这无关。比如，她10岁的时候，科罗拉多军队(Colorado)和蓝卫队发生交战，地点就在离她托洛萨(地名，Tolosa)家的几百米外。

她突然记起，叫了一声：“对！科罗拉多队和蓝卫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晚上，他们那个区的所有街道一片昏暗。广播里一直在持续播放，让大家把所有灯都熄灭，避免和军队搞混，炮兵中队就在13街和22街的交叉处。科罗拉多队和蓝卫队是两个武装力量的叛乱帮派，他们用炮轰来解决政治上的分歧：反贝隆主义者在处理贝隆以及贝隆党员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这些对抗斗争最终导致了25人死亡和成百人受伤。

科罗拉多队统治Magdalena的坦克8团和Punta Indio的空军基地。1963年的4月2日，在这两片区域投下了上百的炸弹。

“我们是多么地恐惧…太折磨人了，所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暴力。

记忆里那些昏暗的夜晚。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记得家里弥漫着忧心忡忡的气氛。有个晚上，他们从飞机上扔下来一个照明弹。诺埃米小姨都疯了，去拿扫帚，她想把照明弹扫出去。我就那么看着她，你知道吗？她是被吓昏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妈妈对她喊：‘快过来，傻瓜，那个弹比房顶还高！’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

当我听她讲70年的暴力，我不否认，其实暴力一直都存在。当然，从我记事开始算起。我记忆里的政治，都和暴力有关。在这最后30年来，从民主回归以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暴力才成为了例外。“然后就进入70年代，好吧，在1971年，我的叔叔Pilín被杀害了。这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是个意外的打击，对我个人也是。”

## 父亲的弟弟

Cristina的父亲有个小他很多的弟弟，名叫Osvaldo，人们都叫他叫Pilín。当Fernandez兄弟们快20岁时，他们的母亲，当时都过45岁了，宣布她有孕了。那些孩子们都无法相信，也不愿意知道。对于莎拉姑姑，对别人要知道她将要有个小这么多的弟弟都感到羞愧。

可是，当Pilín出生后，就都变了。他是一个被所有人一起带大的孩子。出生时他是红头发的，一看就是Fernandez家的。人们都很喜爱他，尤其是莎拉姑姑，她以前是学文学的，但是她与Pilín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致于当Pilín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注册了牙科学后，她提出要帮助他，也去登记学牙科，最后跟他一起拿到学位。这种不同学科的跨越只能用“爱”一个字才能解释。



Cristina的爷爷奶奶是西班牙移民，经过勤奋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地位。他们不愿意自己最宠爱的幼子，交了土耳其的女朋友。但是Pilín就是爱上了她，最后还是结婚了。

婚后第15天，他开着雪佛兰400到拉普拉塔市，去那边的朋友家与几个朋友吃晚饭，然后回首都。他对路不熟，市中心的好几个街角都在修路。他看见一条街道被封路，但还是开了过去。那是一条双行道，只切断了道路的一边，另外一边是畅通的。他的车一开过大门，他就被人们从背后射死了。

Cristina还记得那个晚上的尖叫。凌晨时分，家里的电话响了。她父亲的哭嚎叫人心碎。“Pilín被杀死了！ Pilín被杀死了！”他这样对妻子说。他抱着头，一边说一边摇头，“Pilín被杀死了！”，仿佛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们俩立即上车，去了警察局。Eduardo得在那个晚上去指认他弟弟。他就是在警察局被杀死的。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震惊中，在这无法想像的打击击中这个家庭的时候，父亲Fernandez家与母亲Wilhem家对此事的反应还是不一样的。再一次的，Cristina父亲与母亲的感受发生分歧，因为他们理解的方式与角度不一样，对这个发生的事情持有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

尸检结果出来后，他们才知道叔叔是被人从背后射击而亡。Fernandez家把政府告上了法庭，官司打赢了。因为在审判中两名警员的证词相互矛盾，被抓了个现行。但是虽然案情明朗了，每个人对事件的不同反应还是把这些人的心搅乱了。

“我爸爸归罪于那个游击队。如果截断道路归罪于游击队员的话，他们把叔叔杀死了就是因为他穿过了截断的路。他对警察没有怨恨，

虽然在审判中已经很清晰，事情始末是我叔叔没有听见高处让他停步的声音，当车一开过去，就被他们开枪射中了。总之，就是一个人的所行和他的整体态度有关，与他的世界观有关。”

## 那些书

她自己的世界观是从很多阅读中建立的。在2010年3月，Cristina给新版的蒙特罗·洛巴托(巴西作家, Monteiro Lobato)著的《小鼻子淘气事》写了序言。序言里描述了她与这位影响了几代人的巴西作家的3个交集。

第一次是书商上门来推销。“在那个时期，买东西都是分期付款的”，她说，然后讲述了她母亲与外公喜欢买书来充满托洛萨的家，供Cristina与吉泽尔阅读。“我的记忆非常清晰，那些到家的完整选集，我记得比如《小鼻子和贝陆琼的淘气事》，是蒙特罗·洛巴托的作品。那本书的封皮是硬的，彩色的，Naricita和Perucho脸庞的轮廓是用的金色线条，这些给我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视觉记忆。”Cristina在那篇序言里写到。

自然，那些是儿童读物，但是后来，当她已经是年轻的党员时，历史与政治再一次重现在眼前。第一次与蒙特罗·洛巴托重逢是在1976年。Cristina已经不住在母亲家，因为她那时已经结婚了。但是那个图书馆还留在那里，那是家庭的精神遗产，是家庭对她们两个女孩知识的捐赠，而她们也根据自己筛选的作者不断地充实自己。

在那本《小鼻子和贝陆琼的淘气事》的序言里，Cristina引用了一些融合到她个人世界的一些人：Hernandez Arregui, Rodolfo



Puiggros, Arturo Jauretche, Cook, Franz Fanon, Walsh, Peron, Galeano, Benedetti, Darcy Ribeiro, Paulo Freire, Sartre, 还有其他人。“那些虚构与幻想给乌托邦提供了空间。”她说。

1976年2月的一个下午,“憋得喘不过气”,Cristina回到母亲家,发现妹妹在包书皮。吉泽尔在手工劳作来拯救她图书馆的财产。不仅包书皮,还把蒙特罗·洛巴托书的前几页撕下来,盖在那些禁书上面,地上一片狼藉,她想把这装扮成巨大的儿童图书馆。“你在做什么呀,姑娘?”Cristina问吉泽尔,看着她被一堆书本,剪刀,塑料刀包围。“妈妈疯了,她要把所有书都烧掉,她已经把杂志《穷人》和《党员》(备注:贝隆党的两本重要期刊)扔了,她妹妹边回答,边继续她的书本拯救工作。所幸那个房子从来没有被搜查过。直到今天,那些Walsh, Cooke, Marechal和其他作者的书上还是可以看见首页是用《小鼻子和贝陆琼的淘气事》的儿童书页来做伪装的。

2008年,她那时已经是总统了,有了第二次与Monteiro Lobato的重逢。Cristina在巴西,和时任巴西总统卢拉与他的首相Celso Amorin共享一桌。

突然,在谈话中,有人提起了小鼻子的名字。Amorin的童年也是由蒙特罗·洛巴托的书本人物陪伴度过的。她们还能记起其中的某些片段,在饭后的茶点时间她们愉快地交流着。卢拉在一旁聆听着。也就是在那里,诞生了给这位巴西作家的经典书籍再版的想法,而且由Cristina来写序言,她在最后写到“献给小鼻子和贝陆琼,献给Emilia和Vizconde,献给Anastasia与Benita夫人以及所有在为滋养我的梦想与构建我的乌托邦而添砖加瓦的人们。”

关于这些“世界观”，早期让她的母亲对父亲有隔阂，后来也导致了她自己与父亲的疏离。Cristina在这么说的时侯，既没有愤怒也没有遗憾。

所有这些都己经抛在历史的尘埃里，被后面的一些重大事件掩盖，也因了她不为过去无法改变的事情，不可逆转的历史而分心的性情。

但是她提起父亲时所用的语调与之前提到她母亲给她亲手制作的耀眼闪亮的裙子，与她家庭想给她们姐妹俩最好的接受文化的机会的渴望是完全不一样的。

她声音里的热情与响亮都熄灭了。她尝试着公平些，去感激他们所给予的，去最小化她所没得到的。

但有些伤害是无法掩饰的，而她的声音就从这些疤痕里盛开。

可是，她很坚强。她已经习惯了去淡化，而不让情感流露出来。

在她的讲述中，那些毫不吝啬的，那些毫不避讳的，那些强烈的与感情化的瞬间，都经常转移到政治上的分析。比如当她总结一个人对自己兄弟死亡的领会与理解时，她说父亲对Pilín叔叔做的事情是“与他的世界观相吻合的”。

Cristina的世界观渗透在她所讲述的经历里，也渗透在她岁月里的每个篇章。这不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但是在她的身上，某些时刻我能察觉到其实那些所谓的解释，那些所谓的合理化说明，其实是她

最好的防御工具。Cristina是一位有她自己的方式来同时融合激情与理智的女性。

当Cristina碰见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时，政治分析是她采用的防御城墙，是建立在她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堤坝，是她与其他人之间的防护墙，那也是她的氧气储备。

包括即使在谈到她父母的对立时，她也政治化地分析。说她来自于农场与牧场的爷爷奶奶，把他们的偏见灌输给了父亲。他们从来没有承认，他们的繁荣与富足的确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勤奋工作，但也和这个国家提供了他们这样的条件是分不开的。“如果也像西班牙一样破坏田垄，他们什么也不会得到。而正是因为在这里，他们的努力才有了意义。是有了这客观的条件与环境，努力付出才有会结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去思考”，她说。

今天，这位女性代表了各行各业，但是首要代表与捍卫的是那些劳动人民。在她自己的家庭环境里，从小是听着这些话长大的：阿根廷人都是懒汉，不工作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工作。这是那些反贝隆主义者的口头语。

她的分析基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家庭环境，和她童年时对世界的预想。她从来没有用精神分析法。虽然她的确曾经修了一年的心理学专业。那个经历，在她的回忆里是“无法忍受的”。

Cristina高中学会计，当她去大学注册法律系的时候，遇到了行政手续上的障碍。法律系不接受会计文凭，后来她必须通过17门同等资格考试。

“就好像我们学会计的就是带着文凭的仓库管理员似的，多可笑

呀。我们学会计的，修过的课程与法学的相关性其实比任何一个其他专业的都高。我修过民法、行政法、政治经济学。但是我那年什么也做不了，于是就注册了心理学专业，这个专业不在人文学科院授课，而是在一个离得很远的学院，还得每天一大早就过去。

上帝呀，当我早上到那里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你来这里干什么，来听这些东西。’专业里我最喜欢的一门课程是人类文化学，当时授课的是Mario Margulis教授，但是他有个助手……在一大早的时候听这些东西……”她抓了下头，然后笑了，“这个不适合我。我喜欢争论，喜欢对具体事情的辩论，我讨厌去谈那些没有方向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我就是受不了。我喜欢能有结果的讨论。我们理论，好，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那么我们都退一步，结束。但是我不能忍受那些不确定性。”她说。

她还在解释她在上心理学课程时的无聊，但是又转向了政治，“你看那些失踪的人们。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那种失踪了的迷雾般的状态。阿根廷的历史长河上一直经受着死亡与折磨。而军阀专政独裁政府的狠毒与新奇之处就在于他们引进了一种‘模糊、无从得知’的状态。这是人们难以想像也未曾预料的。每一次我们仔细地去思考时候，还是会觉得不可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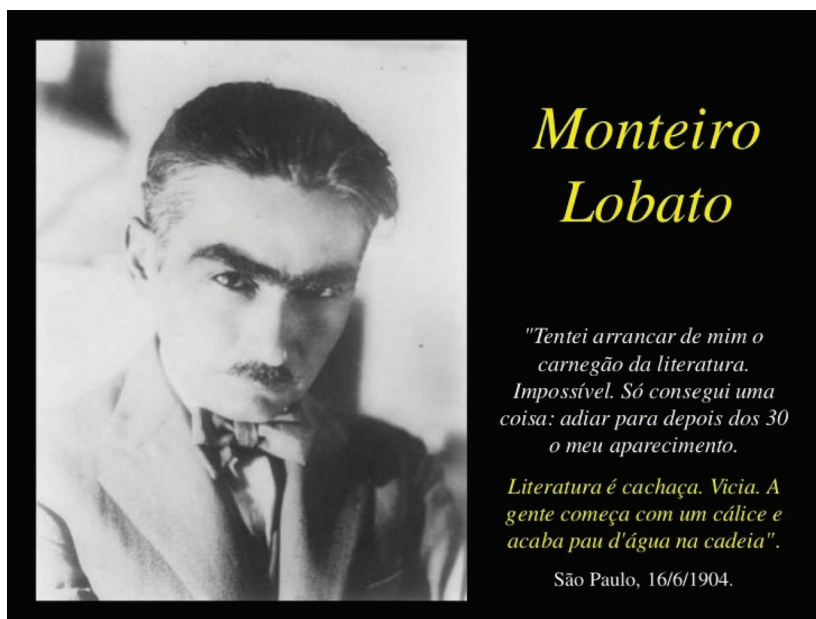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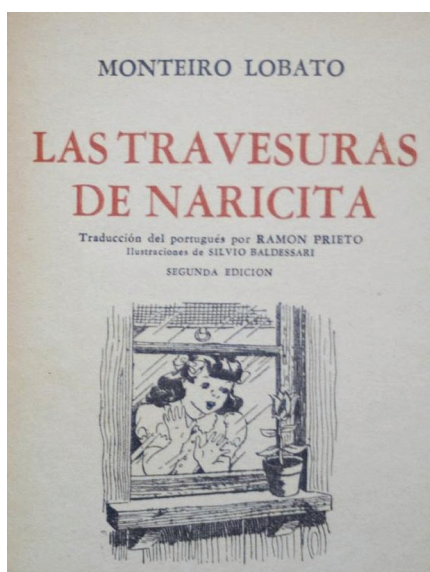
卢拉,巴西左翼政治家,巴西总统(2003-2010),他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巴西历史上第二位通过直接选举获得连任的总统。他发展了经济,减少了贫富差距,将巴西带到金砖四国的行列,他离职时支持率依然高达87%,给国家还留下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无限的希望。

1945年10月27日出生于巴西贫困农民家庭,家中8个孩子,排老二。读到小学五年级,因为贫困辍学,开始打工。14岁由于工厂事故,左手小指缺失。25岁,怀孕8个月的妻子去世。信奉天主教。





儿童读物作家：Monteiro Lobato



《小鼻子历险记》



《小鼻子和贝陆琼的淘气事》再版，由Cristina作序



3

## 女院高中生涯

美丽是女人的责任。

## 修道院女子学院

我一边让自己表现得不那么失礼，一边又尽情地欣赏着她的素颜。我知道能这样地看她，是破例的。

我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在她卡拉法特的家里进行从容而放松的对话。准备期间我和那些来过这里的同事聊天，当时是为了2007年大选前的采访，他们对我说：“她不化妆的时候，也同样美丽。”

她说话的时候，聚精会神，看向我，而我看着她。她的长发没有过分的修饰，只是梳理整齐，很有垂感地落在肩膀上。我不想去问她长度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有些傻。虽然在她是第一夫人还是女总统的时候，头发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

不久前，我收到一个邮件，内容是语言学家发来的抗议，说Cristina坚持要用一个单词：Presidenta(女总统)。(备注：西班牙语中以a结尾代表阴性女性，以e结尾代表阳性男性。总统的西班牙语是presidente，不分男女)那个语言学家解释说，在西班牙语里，用“e”结尾的单词适用于男性女性，说“Presidenta”是不正确的说法，就好像是说“gerenta”(意为“女总经理”，该西文单词不存在，正确说法是“gerente”通指男女)和“intendenta”(意为“女市长”，该西文单词不存在，正确说法

是“intendente”通指男女)一样。但是在这个解释中我还解读到了“男性称谓里包含了女性称谓”，从这我觉得应该称呼“Presidenta”（女总统），应该打破这个把女性附属于男性的语法规定，这个规则在语言学上让我们女性又成为了男性的肋骨<sup>①</sup>。所以，从政治上讲，我觉得称呼“Presidenta”（女总统）是合理的。

她的皮肤很滋润，有一种柔和的光亮，这是那些高品质面霜的结果。当她化浓妆的时候，她的眼睛很夺人眼球。现在没有化妆，所以并没有很突出。那些睫毛少了睫毛膏，就少了些浓墨重彩，却突出了那栗色的眼珠。

卸下妆容的Cristina的脸是一张中年女人的脸，有着岁月流转的痕迹。但是，看起来一切都和谐、美丽。就像人们说的，大小比例都刚刚好。她的鼻子很是小巧，经常会在她的表情动作中出现。她生气的时候，就会皱起鼻子，或者两边的鼻翼会扩张开。她的嘴唇很有光泽，哈哈大笑的时候，不会吝啬露出她的牙齿。当你一直看她的脸，想看看缺了点什么的时候，看一会你就会发现，是她的眉毛。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她的眉毛是被深深描过的，但是现在很细，几乎看不见。

关于她青少年时期的冶艳，拉普拉塔市修女学院的玛丽亚(女子

---

①《圣经·旧约·创世纪》二章21-23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名：Maria Rosita Blanco)和玛撒(女子名：Martha Ravino)两位修女跟我谈过很多，她们也是她的老师。Cristina在那里就读中学四年级与五年级。当她15岁的时候，进入这个学校，那时候就已经对政治感兴趣，但还不是贝隆主义党员。

## 贝隆主义思想的女青年

当Cristina回忆起那个修女院的老师们，她温暖地笑了。在2009年，因Néstor Kirchner搭桥，玛利亚和玛撒得以去玫瑰宫看望Cristina。她在那里向她们问起马格达莱纳(Magdalena)，她记得她们三个总是一起。

“她结婚了”，她们对我说，就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似的。马格达莱纳妹妹放下法衣，尔后嫁人了！而且是与一个乌拉圭左翼政党执政联盟的人，因为她是乌拉圭人。

玛利亚和玛撒，她们俩就好像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跟她们在一起，完全可以拍一部情景喜剧。她们两个都是修女，现都在花城区的Nuestra Señora(院名：我们女性)修女院工作。但1974年，她们在拉普拉塔的修道院时，一位是办公室的职员，另一位是问答训练的老师，她们在那里呆了18年，Cristina也就是在那里完成了中学学业。

她们之间的关系近乎友情，又似乎母女。可能是姐妹，应该是这样的。她们一起度过那么多时光岁月，现在又共享回忆。虽然当玛利亚有些单词说不出来的时候，或者当时间上有跳跃的时候，玛撒得帮着她回忆。当自己在回想一些细节而被玛撒打断时，玛利亚一直微笑着。当玛撒的声音盖过自己声音时，她也不会生气，神态依然，

就好像她们俩是一个个体，虽然拥有着两个思想与两个记忆。她们身上穿的灰色袈裟，很简朴，已经用了35年。

玛利亚走路时有些困难，玛撒一只手扶着她，另外一只手从口袋里取出黑莓手机接电话。

她们与时光握手，和睦相处，荣辱不惊。

她们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谈论其他事情的时候，都既无成见也无偏见。

“玛利亚姐姐是我小时候的老师，我这么说可不是为了告诉你她的年龄哦。”玛撒笑着说。

“是呀！她可不是为了告诉你，我已经89岁了这个事情的。”玛利亚喊道。

“可是看她现在状态多好呀。”玛撒抢过话说，“真是一个美人。今天她转了两趟公交车来这里。她平时还照顾她的哥哥，她哥哥更年长，都已经93岁啦。”

“你怎么不说你已经71岁了！”玛利亚发话。

“哎呀，玛利亚！她曾是我的老师，后来上帝把我们送到了拉普拉塔。”

“是呀，我们是一起去的。”

在Cristina从修女院中学毕业，拿了会计学文凭的很多年后，玛撒和玛利亚通过她的公众生活得知了她，她们根据她的妆容立刻就认出了她。那张熟悉的脸，那种浓妆艳抹的脸，毫无疑问就

是她们以前的学生。就这样，绝无成见地，她们俩做了第一个关于Cristina Fernandez在化妆问题上的政治上的解释。

“她以前来上学的时候总是化着妆！那时她才15岁！是吧？”玛利亚说。

“总是浓妆艳抹的！”玛撒说。

“她很爱美，非常爱美。而玛撒妹妹就是那个侏子手。因为我总是对她说：‘玛撒，在让她进教室之前，带这个女孩子去把脸洗干净。’”

“我带她去洗脸因为她来的时候……”玛撒指着那个睫毛，然后模仿着刷睫毛的动作，噘着嘴然后用手比划着涂口红。玛利亚捧腹大笑。

“因为她有……”玛利亚做了一个首饰盒的动作，又做了个打开的动作，“她的盒子里面装着满满的化妆品！”

“但是她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孩子，所以每次我把她带去洗手间洗脸的时候，她一句怨言也没有，也没有甩任何脸色。她背过身，然后就照做了。”玛撒说。

“但是你知道她后面做了什么吗？她一出校门，还在学校大门口，就把首饰盒拿出来，又把所有妆给化上了。我是从窗户里往外看见的。我当时就在想，到底有什么需要让这样小的女孩如此浓妆艳抹呢。”玛利亚笑着说。

“多爱美呀！”

“非常爱美！”

Cristina爱化妆这个事情，是她们俩看见这个女孩在后来成为众议员、参议员，以及总统女士后回忆起的的第一件事情。但是她们说

Cristina是爱美的姑娘里很特别的人，不是那种常见的妖媚的人，至少在她们这么多年的女院生涯里，都没有再碰见过另外一个像她这样的姑娘。

“她是我们所有老师每天都要谈到的一个学生。她非常优秀，但优秀得让人吃惊。”玛撒说。

“她不懂的事情她就编。好吧，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她经常思考。她读很多书而且去论证推理，这其实是对一个学生能有的最大期待。不是吗？那些老师对我们说他们都累烦了，因为Cristina不停地管他们要更多又更多的阅读材料。他们所提供的阅读资料根本就不够她读的。可以说，她就像是一个研究员。”玛利亚说。

“她那时很瘦，非常漂亮，总是化妆，但是那些老师有时候都快疯了，因为她懂的东西比他们预料的要多得多。我还记得Delfor Munoz，一个经济学老师，有天他打电话来让我过去。”

“你看她总是充满温情地记得所有老师的名字。”玛利亚说。

“是的，玛利亚，但你先等我说完这件事情。Delfor Munoz让我过去看一个图表，是Cristina与她的学习小组做的。图表上面展示了所有不同的资本主义体系，和针对每一种体系不同方式的解读，最后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这个是他从来没教过的。”

当回到对Cristina的记忆，她们指出在那个时候就引起了她们注意的这位女生，这位在大学门口就开始重新化妆的爱美的女生，并没有走上人们所想像的那种妩媚女性该走的路线。

“她从来也不去那些派对，也不去做那些通常意义上年轻人做的事情。15岁成人礼她没有举办活动，这个党组织里的女孩都不会去庆祝这些事情的。”玛利亚说。

“她也不去Bariloche(阿根廷著名风景区，巴里洛切)。我那时候不



得不陪那么多一群群的学生到 Bariloche，每年我都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年了’，因为每次回来都是精疲力竭的。但是那些父母们总是一再坚持让我陪着去。但是 Cristina 没有去。

“她专注于其他的事情，她不迷茫。可以说，她会经常找人咨询，向那些长辈。他们当时在组织一个群体，那些长辈让他们相信自己将会拯救这个国家。”玛利亚说，玛撒笑了。

“我跟你讲，那时有个组织，是学哲学的四年级五年级学生。得到校方允许，可以提前几个小时离校。那时的哲学课我记得好像是 Frondizi 的兄弟教的，是个叫 Risieri 的家伙。他们在组织一个群……”

“叫：思考者。”玛撒补充。

“对，都很会思考。”玛利亚补充。

“Cristina 来上学之前都先经过那里。在她那个年代，还没有那么多的党员。但是这些女孩身上背负着对这个国家的一种责任感，而这一点，在其他的女孩身上，在她的同学身上，都是看不到的。那些女孩大多数就像一直以来的青春期少女一样，游转于那些派对之间，时不时地换男朋友。但是其他另外一些女孩……就在 Cristina 入校之前，我们在西班牙做了一个个性化教育的课程。”玛撒说。

“这在那个年代是创新之举。”玛利亚解释说。

“以前都是填鸭式的教学法，不停地重复。但这是不一样的。”

“以人为本，学生高于书本。”

“但是我们那时候很注重校服。”玛撒打断说。

“哦，这个是的，校服都是统一的。她们都会把裙子提起来一些，因为那是一个流行迷你裙的年代。但是在学校大家都是一样的，蓝色裙子、白色衬衫、褐色袜子、黑色鞋子。”

“还有不化妆的脸。”玛撒笑着说。“对于这条，那个女孩可从来

都不遵守。”

“Cristina真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子呀。”玛利亚说。

“她与她的同学们互动很多，但是在课外就看不起在一起。我记得有天看见她的同伴们在一起，一片混乱。我走近去问发生了什么，他们说‘是因为Cristina不在’。Cristina不在那怎么了？我无法理解。他们说有个数学考试，Cristina会把考题答案都在考试前给他们。这女孩！”

“后来，在那段时期，对于我们来说，维持校园的平衡是很困难的。因为有党员的孩子，也有军人的孩子。虽然她们之间从来没有正面冲突，但是…在我们校园的大堂里，站满了那些军人孩子们的保镖。站满了人，你想像一下。”玛撒解释说。

“而那些在学校里有子女的邻居也时刻关注这些保镖的动态，如果有保镖把孩子接回去了，他们也跑来接他们的子女，因为肯定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你还记得那个住在学校对面的邻居吗？”

“是的，她现在还活着，已经是个老太太了。”玛撒对她说。

“她冲进学校大声对她的女儿喊着‘快跑！快跑！那些军人的孩子都被接回去了！’”

“那时每天问题不断。”玛撒申明说。

“游行示威，射击枪声。”玛利亚具体说。

“情况每况愈下，越来越糟。”

“Cristina毕业后，那时的形势更糟糕了。在政变后的一天，从一面玻璃墙扫射进来很多子弹。那些子弹都射在大黑板上。那是一个下午，教室刚好空着。但是，我的上帝呀，当我看见那个场景，是那么

恐惧。我做什么了呢？我就把所有子弹都收起来，然后去看望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Ricardo Balbin。”玛利亚说。

“她有这种朋友，看见没？”玛撒说。

玛利亚有这类朋友，是因为她的弟弟 Ruben Blanco 是个激进党党员，曾经当任过众议员与参议员，于1976年至1980年任驻梵蒂冈的阿根廷大使。

“我去看 Balbin，对他说‘我非常害怕’。他说‘你不要怕。’‘但是，博士呀，我怎么可能不害怕？’我回答道。然后我就把两手张开，给他看这所有我从教室里捡起来的子弹。‘如果当时上课的话，我的3、4个学生可能已经被害了。’我对他说。

那段日子太难熬了。时不时就有人给我电话通知，说在学校里安置了炸弹。当时有个做保洁的同志，Marcoff先生。我抓着他的胳膊，对他说：‘Marcoff，你过来，不要说话，我们去逛一圈，检查一下看是否有炸弹。’”

“我们经历了很多恐怖的事情，比如发生在 Ganuzza 太太身上的事情，”玛撒讲述说，“有一天有个人给 Ganuzza 打电话，问她女儿是不是有需要他们来帮忙解决的问题。她说是的，因为她看见女儿拿着一些宣传单子。就这样，他们就去了她家，把她女儿杀害了。”

一直到2009年，她们都没再见到过 Cristina。之前，在 Gabildo 有关 AMIA 活动的大会堂，她们认识了 Néstor Kirchner。

“Néstor 非常搞笑。”

“是的。”玛撒说。在那次活动中，首先进来的是 Scioli，她们姐妹给了他一本书作为礼物。他都没打开，但是说了谢谢。然后是 Néstor 进来，也给了他的那份。他打开了，把书皮包装纸撕掉扔在地上，看

见没，他对把纸扔在地上这个事情一点也不在意，重要的是他打开看了我们送给他的东西，而这个举动会让你感觉很舒服。因为是一本关于修道院的书，他说：“这本书我会送给我妈妈，因为她最爱阅读有关宗教的东西。她甚至让我在吃早饭的时候都要祈祷！”在场的大家都笑了。然后有人告诉他，玛利亚和我以前是Cristina的老师。

“他立刻就过来问我们Cristina在学校时是什么样子的。这让他非常感兴趣，我们所说的任何事情他都会笑。当然也送到了她有多爱美。”

“我们跟他说，她非常的聪明，好钻研，还很漂亮。”

“‘我要跟她说你们说她又蠢又丑。’他这么回答着。”玛利亚笑着说。

“多喜剧的人呀。”

“然后我对他说‘请代玛撒与玛利亚向Cristina问好’，但是当然我也没有抱太大期望他会真的去转达。然后活动就开始了，人群汹涌，人山人海，但是就在他离开之前，在那一片纷乱里，他向我们喊到：‘代玛撒与玛利亚问好，是吗？’他就是这样。Néstor在我生日的那天离世，那个10月27日。”

“那一年前她还给你送了礼物，你记得吗？因为我们在2009年的10月26号见到他，然后我说第二天就是玛利亚的生日。她送来了精致可口的巧克力，还有鲜花。她身上就有这种特质，还能记得我们这些修女…当我们在总统府见到她时，我们拥抱在一起拍照了。”玛撒说。

“她还是那样妩媚。”玛利亚说。

“她一直都是这样，从15岁开始就是这样。只是现在会说话了，

会捍卫她自己化妆的权利了。”

“当我重新审视那个在街上重新化妆的女孩，我想了很多事情。比如，她总是服从我们，一声不吭地去洗手间把妆洗干净。这其实是尊重组织，不是吗？但是同时我又想到别的方面，那就是，这个女孩在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当我从窗户上看见，她还没离开学校就已经重新把妆化上，我有一种感觉，她在对自己说‘现在是在街上了，我自由了’。我觉得她是这样对自己说的。”

## 4

# 优雅与权力可否兼得？

女人们总是会对那些看起来或我们认为比自己优秀的其他女性产生嫉妒。这说出来并不光彩，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我们自己的小曲肚肠里，依旧是像先前的黑猩猩一样，渴望着雄性首领把目光停留在发情期的我们身上。当看见另外一个女性展示出如烟花般绚烂的光芒，而我们自身只是微弱的星星之火时，就形成了嫉妒肆意滋长的基础：即有些女人做到了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于是只能被那可怜的小火苗所牵引，这就是嫉妒。当然在当今社会，“雄性领袖”是一个开放性的比喻，可以指向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权力。



## 精致与吸引力

在2007年大选落幕之际,《十二版》日报请我写一篇关于Cristina这个人物的简介,在周日刊的一个双版面。

那个双版是我自己撰写与编辑的,标题为《涂上睫毛膏来阅读的几个小故事》,仿照的是那本Poldy Bird著的一本70年代的畅销书——《不涂睫毛膏来阅读的几个小故事》,我曾与作者本人在Atlantida出版社的杂志上合作过。但是我们题目的寓意是不一样的。Poldy Bird保证说,之所以用这个题目,是因为里面的故事会让你掉眼泪,因此建议读者们最好不要涂着睫毛膏去阅读。而在我的标题里,睫毛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视觉性标识,也是Cristina妆容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性:鲜明的70年代人风格。

下眼线和眼影用黑色勾画,用深厚的连续的暗色调,用褐色来做主色调,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隐秘的诉求,通过这种内心深处的密码来表达。通过化妆的方式,她把那个经历了70年代的人,继续在2007年的这个人生活中呈现。

如今,在卡拉法特,我吃惊地听她讲那些爱美的根源,是起源于那个时代,也是直接受到了那两位抚养她长大的女人影响,她的妈妈和小姨诺埃米。在后来我从她的故事里了解到的是,她的小姨诺埃

米就是那个让她产生这种性别差异定位的人。“在我生长的环境里，这两个女人都没有背弃自己的女性身份，相反的，她们都加固自己的女性色彩。”她对我说。

在与Cristina交谈前，我曾经猜想她那么爱美是想与她那位工会的，喜爱足球的母亲区别开，但是这个访谈打破了我的猜测。她的母亲不怎么化妆，但是非常注重自己的个人形象，而且精工细作给Cristina做了很多精致裙子，打造女性气质。她妈妈除了所有其他角色外，还是一位女装设计师。

她的化妆风格是她的公众形象里最先引起我注意的一个方面。尤其在2008年还成为了被诸多媒体攻击的一个焦点：当她刚从由主要媒体所推动的反对浪潮中解脱，她的过度化妆成为了批判中加剧反对她的方面。这种批判是给女性听的，这就是一块专门为女性设置的批判的土壤：比如化妆太多，有很多的包包，乱花钱，太贝隆主义，等等。

重新审视她的过去，她和她丈夫的生活交错叠盖，共同构建了一个允许她自由发挥其政治天赋的家庭，而同时她不需要放弃其他东西，那些永远属于女性的特质：母亲身份、她的风情、她的吸引力。

有一种女人，很奇怪，会乱咬所有其他女人。因为在内心深处，没有人想放弃任何东西，我们都希望自己既美丽、聪明又成功，但是我们自己做不到同时拥有这一切。

于是就在那些假想的母猩猩黑暗深处激起对Cristina的抗拒，从2008年起，这些情绪被利用和推动。当那些女性支持“农业阵营”的运动，所含的那种嫉恨其实是由艾娃时期转嫁到Cristina身上的。那

些她所收到的性别上的批判,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来自男性的,对女性的轻蔑。另一类来自于女性,是由嫉妒心发展而来的。

女人们总是会对那些看起来或我们认为比自己优秀的其他女性产生嫉妒。这说出来并不光彩,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我们自己的小曲肚肠里,依旧是像先前的黑猩猩一样,渴望着雄性首领把目光停留在发情期的我们身上。当看见另外一个女性展示出如烟花般绚烂的光芒,而我们自身只是微弱的星星之火时,就形成了嫉妒肆意滋长的基础:即有些女人做到了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于是只能被那可怜的小火苗所牵引,这就是嫉妒。当然在当今社会,“雄性领袖”是一个开放性的比喻,可以指向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权力。

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处理这些感觉,我们也不懂得如何内在地去化解。它从我们的不安全感里盛开,在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未察觉的角落里生长。我们并没有这么称呼它“嫉妒”。这也解释了,即使有些愚蠢,但依旧会和女伴们在饭后茶余闲谈。

Cristina Fernandez 身上有一种“过分优秀”让其他女人们觉得是一种羞辱。她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你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不喜欢时,像那些女人表达出来的那样,这种不喜欢的表达很多时候是言过其实,无节制的。在2008年,有封电子邮件被广泛传播,里面写道:“我们要对这个女人说明,她并没有她自认为的那么好,她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而署名处正是另一位女性。

在我们的潜意识里,人生的成功应该是适度中庸的。我们也一

直被教导着，必须在事业成就和家庭成功中做出选择。当一个女人在公众领域取得成就时，就会有人带着自我安慰的情绪去解读，认为她私生活中就一定是坏母亲，或者是个让人讨厌的女人。总之不是跟孩子们有问题，就是跟老公有问题，肯定的。

另一方面，家庭是一种异常珍贵与脆弱的存在，它会吸取很多的关注和呵护。上百万的女性就会为自己开脱，说是正因为如此，她们才没法像她们的丈夫那样投入一样多的时间与专注到她们的事业上去。而她，拥有一个成功的事业，同时又是个让人满意的妻子，一位性感的女人，同时又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这不是说看起来太“过分”了，是事实上太“过分”了。

当我们把焦点落到Cristina这个人物内心深处，或者靠近任何一位“有故事的女同学”，就一定会看见精神创伤、痛苦，和死区。因为人本身都是这样的。只不过真相是，这些她虽然都有，但还依然有勇气去面对与化解。她会找人聚集，抱团取暖。她也懂得选择一位同样喜欢以这样的方式面对人生这盘大棋的男子共度一生。

她与Néstor婚姻的意义已经远远高于婚姻本身，也意味着一个持续了30年忠诚不变的政治联盟成立。可能也正因如此，Cristina从来没有把夫姓当成是服从的标识，虽然说夫姓代表了一种归属。但也不是说，归属于一个男人，而是代表着归属于她自己，然后和这位男子一起去创造。在经历这么多年之后，Cristina与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或者Cristina Kirchner是没有区别的，而不仅仅是Cristina Fernandez了。她从来就没有要求恢复单身时的姓名，就好像她的政治身份是在她结婚时就完成了锻造。

对于一位女性而言，做性感的女子还是承担母亲的角色是个两难的选择，这存在于每个女性内心深处的思想斗争。虽然说，每天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她们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社会角色，这也是她们的权利，但这种变化不是白白送来的，这是经过多年的斗争与工作争取而来的。一方面，母性代表了保护欲、奉献、自我牺牲，另一方面，女人也渴望爱自己，完善自己，而这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在过去的50年，我们已经进步很多了，但是当孩子发烧的时候，一般从工作中撤离的都不会是男性。那些请假的，受不了担心的，都是母亲。这是哺乳类的天性，但是也是社会文化烙下的痂。

如果我们纵览世界上的政治女性，我们会发现那些拥有母性色彩、主妇形象的女性，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比如Dilma Rousseff(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或者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德国总理，Angela Merkel)，但都是没有保持性别差异的女性，也就是没有女人味。而Cristina却富有吸引力。她做到了，但是同时也激起了嫉妒。然后她的寡妇身份缓和、平息了这些嫉妒，因为她此后只穿着黑色，那个代表着追思和痛失的颜色，心里有座坟，藏着未亡人。

在2010年的9月，Cristina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会晤。在那几个月前，另一个上流社会的女玩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表达了对Fernandez领导的政府在经济上取得成果的“赞赏”。在一个几乎非公开的媒体发布会上，美国前第一夫人说道，“我们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但确实是做到了。”当时几乎没有很多大媒体的参与。而在柏林，默克尔说“我们知道您的政府总是兑现你们

的承诺。”虽然她也没有掩饰不得不听她长篇大论的恼火，因Cristina在这简短的会议中表示不再增加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

她们在德国的外交部共进午餐，菜谱为阿根廷烤肉与土豆泥，这是个闭门宴请。在媒体聚光灯下，阿根廷《国家报》上发布了一张她们鞋子的照片。默克尔穿着一双有些磨损的平底鞋，Cristina穿着一双漆皮的高跟鞋。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我就问自己他们想表达些什么呢？我猜又在映射他们一直说的那个观点：女总统放太多的心思在鞋子、包包上面了，这足以让我们怀疑，她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在国家事务上。这分明就是一个性别歧视者的写照。

不管怎么说，这两双鞋展示的就是女性的差异。我们知道有穿高跟鞋的女人，也有穿平底鞋的女人，而且其实根据不同的情景与环境，对所有女性来说，都有不同的选择可能。

默克尔个强硬的政治女性形象，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性。在那些国际会晤的照片中，能看出她的风格融合了母性，有着主妇的胸部，同时在政治中表现出的中性。权力不是雄性的时候，是雌雄共体的。这些羚羊毛的平底鞋子也可以是男性的。默克尔用的那些西服套装让人联想到智利女性Michelle Bachelet(智利政治家，外交官，南美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维罗妮卡·米歇尔·巴切莱特·赫里亚)的服饰。女性穿这种西装其实是处理权力关系的一种策略，向她们所代表的民众传递呵护与安全感的诺言。那些女性所采用的西装外套都不是紧身的，或者说都是不合身的，就像是一块罩布来盖住曲线。

在这个女性可以接近行政权力的世界，也还是有数以百万计的青春期或者成年女性为了保持身材忍受着饮食的紊乱，就像是一场时代病。关于女性身体和权力执行的关系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深思



的。在Cristina Fernandez的政治形象中，有着在执政中很罕见的女性色彩。这让我想到她眼睛轮廓勾画的浓重色彩，似乎还在突出、彰显、倾诉着另外的东西。

在她的政治形象里面，有些东西应该是被抹去的，但是被特意强调了。她不穿大V领，也从来不露出她的臂膀，但是都很合身，这是有曲线的公众形象。她那散开的长发，也是不符合上流社会标准的，这更像是一个升起的中产阶级公众形象，这在高层政治中并不常见。希拉里·克林顿波士顿式尊贵的优雅是决不允许自己的长发散落在后颈的。默克尔所代表的中性公众形象，也叫嚷着只能留短发。

但是当我有天看见默克尔一张照片时，我吃惊了，因为照片上她穿着大V领。那是在一场华丽的晚宴，穿着黑色的礼服，首相丰腴的胸部几乎不知廉耻地大尺度露出。那些德国媒体没有因此而攻击她。如果有天Cristina Fernandez穿着这样的一件大V领衣服出现在阿根廷，最好不要去想会怎么样。但是这幅画面也代表了另外一种场景：在这种政治的社会场合中，默克尔一点也不是中性的。只是说，她在工作的时候，她会穿工作的装束。但是也表明了默克尔不把自己当成一位“斗士”，因为也有很多时刻，她抹去了政体上庄重的角色，而展示了自己的另外一面。

那么Cristina Fernandez工作的服饰是另外一种风格。自从她任职总统后，虽然鞋跟的高度一直在降低，但高跟鞋已经组成了她在公众场合出现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忍受这些高跟鞋的，但是她做到了。

她政权上的魅力，她的公众形象，都在她那另种感觉的女性气质

中渗透进去，是一种和她的个人喜好相关联的女性属性，而那些属性能给她安全感。此外，那些高跟鞋看起来丝毫不影响她的才能，虽然在版面上那张默克尔和Fernandez的鞋子的特写照片里，很容易被植入高跟鞋的意义是：包含了肤浅。虽然说如果穿着平底破旧鞋子的是她的话，那张照片就会判她的罪为懒惰松垮，不修饰。

但是除了鞋跟上的高度以外，在默克尔和Fernandezde差异上我们能看见女人在权力面前的两种版本。这也让我们去反思，女性与公众权力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我们女性其实一直是按“管家婆”，“持家女性”来培养的。公众权力本身对女性而言依旧是一种奢求。

“女性主义”所属的范畴在Cristina生长、求学、从政年代与现在生活的年代是不一样的。她刚开始的政府行为是“两百周年女性纪念画廊”，在那里的画像里，那些看着我们的都是坚强女性，像Evita(艾娃)，Victoria Ocampo(维多利亚·奥坎波)、Tita Merello和Juana Azurduy(胡安娜·阿苏杜伊)，这是事实。她在表达所用句式，“所有男人们和女人们”，“阿根廷男同胞们和女同胞们”，“男同伴们和女同伴们”，开创了她特有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女性话语权与地位。她坚持人们叫她“女总统”，意味着我们语言里的一个门阀在这个语言里有深处的斗争。但是Cristina Fernandez本人从来不是，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这也在她的时代中重现。

她党员时的老同伴，在讲述她们自己经历的时候也确认了这一点。Pipa Cedola，就像1973年时在拉普拉塔的Crisitna一样的小女孩，当问及她女权主义时，摇着头说：

“这并不是一个话题。男人和女人是同僚，履行的责任义务都是

同等的。我们学会了互相看对方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关系，这才是那个视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社会都是这种看法，也不意味着大男子主义不存在。但是这是我那么多年来所能看到的。如果我回头看，当然啦，最终会发现贝隆主义组织比左翼组织更加的大男子主义。但是当时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Pipa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70年代的女同伴们都没有互见，但是在Néstor Kirchner任职总统后有了一次重逢。在她们开始的几次交谈中，几乎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性别的话题。这个论题以前是“女权主义”，而现在有了更宽广的意义。从政治上讲，对所有她们而言都是一个新话题。这个话题以前被她们看待自己的方式给掩盖了，因为她们以前的看法一直都是：女人和男人是同伴。

“这个讨论激起了一阵混乱，有很多人的反应就像73年那样。这个话题几乎就是一个丑闻，就好像是一个禁忌，或者讨论一件愚蠢的事情。希望不是这样的，希望我们就是同僚，我们就是同伴……我们觉得完全是很自然的，重温起所有我们在这些年学会的。”我当时想：她们不能从过去中走出来。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你要向谁去说所有人都是同伴呢？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战争。在不久后，很多像她们那样反应的人，开始从事于跟性别有关的工作，比如反对家庭暴力。我觉得Cristina一直是享受自己是平等的，她也是这么感受的。自从她和Néstor结婚后，她从来也没有进入到传统女性的角色。但是和那些取得公众后变为中性的女性们不一样，她没有因此改变。

Cristina的才能从来都没有与她的“精致”相碰撞。但是也有另外一些意想不到的方面。修女玛利亚，修道院的姐妹，除了在上一章

节中描述她早期的爱美经历外，她停顿了一会，转到那个女孩个性上的另一面：

“她对自己个人的事情是非常不外露的。在学校唯一表现出来的是：她是一个铁杆球迷。”

“球迷？”

“她是‘拉普拉塔体操和击剑’（一个球队名称）的粉丝，像她母亲一样。有时候她很生气，因为其他学生都是pincharratas（另外一个球队的球迷）。那是一个光辉时代，学生队每年都参加美洲冠军杯，学院也会参与。每年，当学生队赢得比赛的时候，那些女同学们都给我们施压，要到7街去庆祝。我们之前的女学生里面，其中有很多嫁给了学生队的球员，就是那种感觉。而这个女孩，相反的，和她母亲一起，都站在Gimnasia（体操球队）队这边，她们俩都是这支球队的粉丝。她，就是冶艳的球迷。”

在女院时，我看着15岁的Cristina在洗手间把妆洗掉，然后又看见她在这个纷乱城市的法学院的走廊上化着浓妆走过。我知道她生活在一个充满恐惧的年代，那些不确定感与背井离乡的乡愁都让她从不停止化妆。

有次她撞车了，那时她已经是Rio Gallegos市长办公室的法务技术秘书，当她躺在被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时，她大叫着要镜子。还有当她生完花儿，她的朋友们去看望她时候，她已经化好了精致的妆容，还在头上带了一个白色的发髻。她与小姑子艾丽西娅是很铁的朋友，但艾丽西娅不怎么化妆，当她形容Cristina化妆时，她说那是一种“自律”。

妆容一直伴随着她，就像那头精致雕琢的长发，就像那烫得平整，干净整洁的衣服，像那些包包，像那些高跟鞋、那些耳环、手镯、外套大衣，和脸上的润肤霜。就如Pipa所言，她身上的女性气质并不是被女权思想渗透的，因为她属于那个“男女是伙伴同志”的时代。

Cristina并不因此生歉。她的女性气质也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权利，可能也因为她展示的是一个对自己所有属性都很自信的女人。她自我接受、自我夸张地透露说：“我总是喜欢像刷门似地刷自己。”这里谈到的不仅仅是女性气质，也谈到中产阶层，更准确地说，这是中产阶层的审美。

瓦莱里娅(Valeria Loira)是一个律师，她曾经是Cristina在参议院那十年的左右手，负责在Cristina主持宪法事务委员会时，协调她的团队工作。她也提出了Cristina魅力的特点，那是作为女上司的人格魅力，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因为放大了那个范畴，从中发现，她不愿意只让人喜欢，她更愿意人们信服她。

Cristina在办公室洗手间用完后留下的香水痕迹，每次在下去开议员大会前都会整理的头发，瓦莱里娅还加入了另外一些劲爆的八卦。在那个时期，很多女性都在Cupo法律(配额法案：规定女性从政人员占一定比例)实施后成为了立法委员，而Cristina在这条法律出现的很多年前就已经是了。但是，在法律刚开始贯彻的时期，出现了一些非常可耻的情况。为了合乎那条法律，很多女性在选票箱上先霸占着位置，然后在即将上任的时候就宣布放弃，把位置留给排在她们后面的男性。Cristina把这些人称为“占坑的女议员”。最先发生在宪

法事务委员会的事件主角为参议员 Isabel Viudez(伊莎贝尔·比乌德斯), 由 Corrientes(科连特斯)省任命, 她一被选上就宣布辞退来把位置留给 Raul Romero Feris(劳尔·罗梅罗·费里斯)。

不管怎么说, 瓦莱里娅记得 Cristina 经常重复说“对于女性来说是更难的”。当发生一些典型的问题, 阻碍女性全身心集中精力在工作任务上的时候, 她就会对团队里的女同胞们这么说。瓦莱里娅说: “所以说, 我很喜欢她的爱美。因为我深知保持完美是很难的, 至少我就不是。可能是我们自己不太在意, 但是谁会不喜欢呢? 在我看过她在 Uruguay(街名, 乌拉圭)和 Juncal(街名, 洪卡尔)的公寓后, 我再看她, 我就都理解了, 她是个细节主义者, 任何细节都逃不出她的法眼。当她去 Olivos(历届总统府邸)住时, 虽然刚开始有些抵触, 但是她连修复一张地毯的事情都亲自过问, 那是 Ines Pertine(管家)本要丢弃的地毯。当然不是说她去洗或者去烫, 就差这点了, 但是不管是在 Olivos(总统府邸)还是在之前的公寓里, 所有的一切都尽在掌控, 而这恰恰说明了她在用心打理。这个我们所有女人都知道, 如果你不去打理, 没有事情是会自然发生的。在一个紧张繁忙, 充满压力、催促的工作日之中, 我们听见她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打电话, 给南部的家打电话: 安排饭宴, 询问考试的情况, 和某个孩子嬉笑。不是说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不去管南部家里的情况, 也不是说因为她有无可挑剔的形象就不用去学习专研那些课题, 她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面面俱到。”

有件趣闻轶事深深地刻在瓦莱里娅脑海里, 而这件事, 对她来说, 概括了 Cristina 执行领导力时的吸引力, 至少对于他们这些最亲近的



同事们而言是这样的。这几个月中，我也和她的其他共事者交谈过，现在他们已经是省里的一线官员，也吻合了瓦莱里娅的说法：Cristina是个很严格的女上司，她对人对己，同样严格。但是她不是像很多人记得的Néstor那种命令的方式，而是通过吸引力。也不是那种陈词滥调的吸引，不是抛媚眼那种，Cristina的吸引是通过去说服，把其他人说服到自己的信仰里。

“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上司在一直激发你工作的热情，你是无法一整天连续工作18个小时的。”瓦莱里娅接着说，“在她身上能感受到非常强大的魅力气场，是知性的，政治的。她能勾住你，让你很容易就有意愿废寝忘食地留下来工作，让你为了做好手头工作而很晚回家。如果不是有这种神秘力量，是做不到的。”

瓦莱里娅的轶事可以追溯到的那个时期是，参议院在受理针对梅内姆(前阿根廷总统)派的法院法官的政治审判。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因为那些法官不仅在法院而且在国会都有其捍卫者。在一个时刻，在Boggiano(人名，博西阿诺)被停职后，Cristina把那个团队的所有成员叫到她办公室，说：“孩子们，我被孤立了”。他们茫然地对视，瓦莱里娅代表所有人说“不会的，Cristina，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直到结束这个案子。我们会做所有记录，会让那些目击证人签字的……”。Cristina对她说：“是，是，这个我知道，从技术上和行政工作上我都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党派里的人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立场。”这是事实，因为团队内部对程序步骤问题还有疑虑，而几天前他们刚和Cristina争论过。

“那个争论事实上并不重要，可Cristina觉得还没有结束，最后我们给出了原因。但就在那时，我听到她说的一些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想。”瓦莱里娅讲述说，“她说‘我喜欢吸引。我不喜欢别人服从

我只是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我喜欢去说服他人。’从那里我们理解到，当她展开一场讨论的时候，是为了切入深处，让所有人真实地呈现，因为相比于言不由衷的‘遵命，Cristina’，她更愿意忍受有理有据的反对。这是我觉察到她身上非常女性化的部分。她的吸引力比肉眼能看到的还更深远，还更强烈。”

瓦莱里娅记得在Juncal和Uruguay的公寓里，当Néstor获得了总统竞选，而她是新上任的第一夫人。她邀请了所有团队成员到她家，有糖果与咖啡。那个下午，Cristina展示给瓦莱里娅一个非常精美的钢笔，是很昂贵的名牌，她送给Néstor，作为一只总统用笔。就在那里，还在礼盒里，光芒四射。

“你能相信吗？我送给他这么个尤物，而这厮天天用那个Bic(廉价品牌)笔签字？”Cristina笑着说。Néstor在他整个执政过程中都使用那支Bic笔。

Cristina的精致与Néstor的邋遢总是很奇特地互补。Estela De Carlotto(埃斯特拉·德·卡洛特)讲述过在那个时期，她和她的子孙们也被邀请去那个公寓做客，那时她还不认识Néstor，有次他从客厅里突然出现，然后打个招呼要出门。

“我要去买鞋子了。”Estela讲述Néstor这样对Cristina说。我们都理解为是登基用的鞋子。

“Néstor，可别是皮便鞋。”Cristina要求说。

“Cristina！”他堵住她要说的话，然后走了。

“但至少不要有卡扣那种！”在门关上之前，Cristina赶上去对他喊了一句。



4 优雅与权力可否兼得？





Bariloche: 阿根廷著名风景区, 巴里洛切



Dilma Rousseff(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迪尔玛·罗塞夫)



Michelle Bachelet(智利政治家, 外交官, 南美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维罗妮卡·米歇尔·巴切莱特·赫里亚)





Angela Merkel(德国总理, 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



4 优雅与权力可否兼得？



**ANGELA MERKEL**  
**(CANCILLER DE ALEMANIA)**



Cristina 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媒体报道的两双鞋子



Cristina 和美国第 67 任国务卿希拉里



(Salon de las mujeres: 女性纪念画廊)

# 5

## 活跃的党员

我对她说“妈妈，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

然后，突然各个角落都出现了枪炮声。

有从看台那边过来的，也有从后面过来的。

我拉扯着妈妈，在争吵。

她喊叫着“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从这里拉走”。

一个恐怖场景下的一场荒唐的争论。

## 拉普拉塔市, 1973年

1973年,那个在修道院学习的女孩觉得心理学很无聊,最终进入了法学系。专业第一年,她和本书中采访过的其他人物形容的一样,形容那些日子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当他们这么说的时侯,当然不是指后来出现的暴力。这些讲述者都是幸存者,在他们身上还带着因恐惧与痛失而留下的精神创伤。

Cristina讲了她因为会计学位进入法学系所遭遇的问题,以及最后终于念上了这个她“从很小很小”时就选择的专业。1973年突然来临了,这一年贝隆意外回归,而她的记忆直接跳到了Néstor。他的突然缺席给这个家带来了沉重的氛围,也就是在这里,在这个卡拉法特南部的家里,他逝世了。

当他们初次见面的时侯,她20岁,他23岁。他们在认识了6个月之后就结婚了,这个她没对我讲。她喝了一口端上来的lagrima(一种牛奶咖啡)。谈起他的时侯,努力地让声音体会不到一丝颤抖。而最先讲到是他们的争吵,“我们曾经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争吵”,她说,笑了。好像有关他的回忆能给她带去安慰与鼓励。“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一直争吵。我们会为所有的事情而争论,为那些看起来重要的事情,或者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总是争吵,从我们认识的第

一天到最后一天。”这些争吵会被他们中的任何一人终止，“会被那个觉得自己要赢的人终止。”她声明道。

Cristina又展开了那个关于争吵的话题。我以为是单纯的对过去的回忆，但是随着她的讲述，会明显感到这其实是她最怀念的事情：与Néstor吵架。这是他们互相陪伴的一种方式，他们共同发展了一种吵架的艺术。

“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就不跟他说话。”她说的的时候用一种新的语调，辛辣的，游戏的，“这是我能对他做的最大惩罚，就是不跟他说话。我知道只要我坚持就会胜利，但是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曾经有一次一整天都不跟他说话。”她点点头说道，就像在承认一件功勋。

“一天？一天算不了什么呀！”我对她说。

“但是对我们来说一天就像是永恒那么漫长了。如果不对话，我们就不能活。他有时候在沉思，挂着一张脸，你会知道他是在生气。我当时就爆发了，因为我不能对着一张臭脸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了？’我问他，‘没什么。’他没好气地回答。可能是因为我或者别的什么情况感到烦恼，但是我不能容忍他说‘没什么’。”

他们早就习惯了所有时间都在一起。当Néstor还是Rio Gallegos市长的时候，还有后来在他任职圣达克鲁斯省长12年的时间里，Cristina的办公室一直都在他的旁边。包括即使是Cristina成为国家议员，每个礼拜有好几个工作日都需要在首都办公，她的办公室也保留着，就在省长办公室的旁边。但是也就是在那段时期，Cristina从周一到周四安扎在Jucal与Uruguay交界的公寓里的那段时间，他们开始了那些电话。

那是重复的，着魔似的，坚持不懈的通话。那些在不同阶段认识



他们的人，在他是市长，而她是竞选团队领导的时候；在他是省长，而她是法律技术秘书或者是国家议员的时候；在他是总统，而她是“第一夫人”同时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在她是总统，而他是她的首要跟随者的时候，在不同时候认识他们的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会提起他们之间的通话。是那种持续不断的，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发生的通话。早上、下午、晚上、凌晨，为了政事或者为了家事。

Cristina 沉默了一会。她在谈话过程经常停顿，我想是为了整理纷乱的思绪和情感。现在，她咳嗽了一会，喝完 lagrima(牛奶咖啡)，几乎赞赏地说：

“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当我想他的时候，这个家伙就会打电话过来。我们有很多心灵感应的时刻。我们通电话时候讲的话题也刚好是另外一个人准备要讲的话题。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甚至不用语言，光是对视彼此就心领神会了。这是非常神奇的，是的，这种连接非常不可思议。”

“有一个这样的对话者真是……”

“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任何其他一个词可以形容。我现在最亲密的人就是我的儿子，但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有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经历，我们是母子的关系，而我与 Néstor 的关系是不可思议的。你想我认识很多对夫妻，但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一样情况的。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但是都有责任感。好吧，一些人会比其他一些人更多一些。我从18岁就开始工作了，Néstor 从来没工作过。直到我们结婚时，我母亲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他父亲每个月都会给他汇生活费，即使后来也一直会汇给他，这些钱我们就存起来。Néstor 一直储蓄，总会有攒下来的钱。他曾经说过，这样会给他独立

性。”

“您们结婚时还非常年轻。”

“年轻吗？”她否定说，“不是的，我们是当时唯一还没有结婚的。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结婚得非常早。那个年代都那样。你看 Juan Cabandie 的父母，结婚时母亲才 16 岁，父亲 19 岁。我们不年轻了，那时候的人比现在更早地成家落地。Pipa 很晚才结婚，Pipa 是我记得的那时唯一没有结婚的，因为她跟奥马尔吵架了。”

Cristina 指的是 Pipa Cedola 和奥马尔。她就是在奥马尔的家里认识 Néstor 的，那个时候奥马尔还是 Pipa 的男朋友。多年后，Pipa 见证了他们之间频繁的电话往来。她形容他们俩为彼此的“咨询机”。

“我从来没见过一对伴侣，两个不同的个体能有这样的连接”，Pipa 说，“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能说这么多话。过去了这么多年，还是那么感兴趣跟对方对话。因为这不是形式性的通话，都是些长时间的通话，他们把彼此放优先，其他人不能去打断。他们想知道对方对所有事情的看法。你会发觉，当他给她打电话，她会就某个话题很细致地发表看法，因为是他问了她的意见。但是同样当你听见是她打电话询问他时，她会吧听筒放耳边静静倾听，专心致志。她会提出某个话题，问：‘你怎么看呢？’然后倾听。有时候会做些笔记，继续发问。而第二天呢，就可能是刚好反过来。但是也不只是他们之间问这个，‘你怎么看？’是 Cristina 的一个经典问句，不是说她就会采用你的看法，当然更不是说她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她总是问所有身边人的意见，然后倾听。我认为这是跟专制霸道相反的。他们从很年轻时开始就用这种态度去调查其他人的观点看法。”

## 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的孩子们

这对伴侣，Néstor 和 Cristina 结合时，Néstor 已经是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的活跃成员。在他《七十年代人：从拉普拉塔到总统府》那本书里，Fernando Amato 和 Christian Boyanovsky 非常详尽地重建了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的成立与发展。在这些团队组织的历史中，另外一个同时间成立的组织是 FAEP(艾娃贝隆团体阵营)，可以跟随着那个框架，看到拉普拉塔大学生与国家共命运的场景。

La FURN(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划出了一种风格。这些组织成员们不认为自己是贝隆主义思想的学生，而是在学习的贝隆主义者。这虽是个文字游戏，但有着不同意义。为了区分这两者差异，不得不回到那个从 1955 年之后开始的让人惊奇的年代关联，就是从那一年，那一天，Cristina 的最先记忆，画面里她的妈妈和小姨在门口等在里奥圣地亚哥上班的外公回家。

1956 年的 3 月 9 号，《官方通报》公布了 4161 法令，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合宣传、推广支持贝隆主义思想”；也禁止“使用贝隆党员或者贝隆亲属的任何照片，肖像与雕像；禁止使用贝隆党的盾牌、旗帜；禁止提起卸任总统(即贝隆)的名字、其亲属的名字；禁止言论中包含以下词汇，‘贝隆思想’、‘贝隆主义者’、‘正义党’、‘正义主义者’；禁止第三方立场，贝隆正义党缩写 PP，卸任政权的日期，音乐作品《贝隆青年进行曲》和《艾娃·卡皮塔娜》，和那些卸任总统及其夫人的演说，或者是演说的片段。”

如果不开启那段流放的历史，那段暗中秘密流放了整整一代贝

隆主义领导人与组织成员的历史，那么对于70年代在拉普拉塔市的场景的理解就会是不完整的。那些来自于全国各地，来拉普拉塔读大学读书的年轻人，也是“抵抗运动”那一代人的孩子们。

从这道光里，能看到那些党员们前期的动作：闪电似的行动，不是那些很集中的大型行动。在60年代中期，那些在拉普拉塔的贝隆主义党员，刚开始在公众场合出现时，还只是局限于突然地闯入某个地方，发宣传册子，喊“贝隆万岁”，然后就匆匆逃跑，以免被抓。他们组织起来就是为了喊一声领导人的名字，就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

1970年，那些16岁、17岁的男孩女孩们来到拉普拉塔，其中的有些人对贝隆主义思想有着很模糊但很重要的经验，比如，Néstor Kirchner。Pepe Salvini是Néstor在Rio Gallegos的危地马拉中学时的同桌。

当他们上四年级时候，独裁者Juan Carlos Onganía(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过来举办机场跑道的落成典礼仪式。而这次访问与教育部新颁布的通令在时间上刚好吻合，新通令规定所有中学校长的大学专业必须为教育学方向。这个通令一出，就把国内很多校长排出系统，这里面包括了Anita Flores de Lopez，而她已经在这个Kirchner和Salvini上的中学任职了15个年头。

那些中学生们集合开了一个大会来讨论这个问题，推断出的结论是Anita Flores de Lopez的被迫离职是为了给那些在当地显赫军人们的妻子们腾出位置，她们中有好几个候补者是符合这个文凭条件的。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学生中心，这学生中心的第一任主席就是Néstor，

当时他16岁。

在1968年,这个危地马拉中学的学生中心主导了一场反常的动员,反常之处在于这个运动是由学生家长支持的。Néstor的想法是扩散校园冲突,遍及整个城市地发宣传单。这个运动持续了一个礼拜,学校也停课了,出了两封由六名学生签字的信,一封是写给Juan Carlos Onganía(独裁者),另外一封是给他妻子的。这是政治姿态,他们想要感化这位“第一夫人”,告诉她这位女校长赢得的喜爱。这六位学生中,其中两位是:Kirchner和Salvini。通过那些宣传册子和捍卫这位所有人都喜爱的邻居(特指Anita校长)的计划,Néstor唤起了那些移民的骄傲、当地人的精神,最后转化为从政中对领土的热爱。而这,正是他日后从政动力的雏形。

那一天,数百群众去机场迎接那个自封的“阿根廷革命总统”。换个方式说,是很多人利用这次访问的时机。人太多,以致于保安不想让他们过。在这之前,Onganía(独裁者)的任何一次访问都没有聚集过这么多人,从来没有。有些人是去看机场跑道落成典礼的,但是更多的人是去请求保留Anita Flores de Lopez 的职位。不同的群体都混杂在一起。那些学生们组成一条很长很宽的队伍,这样开路的时候,就能直通“自称总统”的包厢。Kirchner和Salvini走在队伍前面,Onganía怀有恶意地看向他们。一位副官走近他们,他们把信交给了他,然后离开了。没有人唱任何东西,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一片沉默中。过了几天,传来了消息:危地马拉中学的校长维持不变。

## 年代间的连续

连接1956年到1976年20年的历史，就能很清晰地看见，反动派是如何企图把贝隆党从政治版图里抹去的。在1966年有个武装力量的重组，还有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加诸于下一代人身上，创造了像大学生革命联盟这样的组织，也重建了政治文化关系。比如在1976年又发动了政变，再次试图扫除那些不是保守党的公务员中贝隆党员的残留痕迹，就像现在，再一次，新一代又接过了岗哨。

Horacio Chaves老人，是军队的前士官，曾参加过Juan Jose Valle将军的起义，也曾在Oscar Lorenzo Cogorno中校的指挥下为反对55年的政变作战，他提议让他才20岁的儿子Gonzalo去古巴找John William Cooke谈话。Gonzalo是拉普拉塔贝隆主义党的成员，他答应了，然后就和里奥圣地亚哥海军代表Néstor “Pichila” Fonseca(人名)一起前往。在古巴，他们碰见了Cooke以及周围不同政治方向的党派人士。在这次碰面后，他们带回来了重组大学生斗争策略的动力。

在65、66年间诞生了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开始了不仅仅是在大学里的关于贝隆主义的政治辩论，还开始了那些早期的闪电行动。在那些年，这个组织的成员不超过三四十人，他们在公众活动中扔爆竹，高喊“贝隆万岁”。与此同时，Cristina开始在托洛萨(Tolosa)上中学，Néstor Kirchner在Rio Gallegos即将中学毕业。他是在1969的夏天到达拉普拉塔市的，进入法学系上课。他住在一个1街与46街交叉的寄宿公寓里。随他而来的还有他的绰号，Lupin，人们给他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很像连环画里的那个人物，他就是这么自我介绍的。



在拉普拉塔，Néstor 碰见了这些几年前开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建设。Lupin 加入了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作为一个基层的成员，在这个组织里，他一直都停留在基层。他从来也没有担任过任何重要的职位，既没有降临给他，他也没有刻意寻求。没有人记得 Lupin 在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期间做过什么英雄事迹。

卡洛斯·昆克，如今是国家议员，Néstor Kirchner，还有如今是内河省参议员的 Pemo Guastavino，在不同时期，都是紫色队营(Banda Rurpura)的成员。昆克和 Kirchner 差 5 岁，Kirchner 又比 Guastavino 年长 5 岁。而他们三人都曾是拉普拉塔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Néstor 和那些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的成员一样，对游击队刚崛起的阶段是有好感的，但是随着组织越来越军国主义化，原本的一致出现了裂缝，到最后演变为了分歧与不和。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党员不同意武装斗争，但是他们从来也没远离过这种政治传统、历史传统、经济传统。这种传统来源于贝隆和库克，它渗入到修正主义，提出了一些公众人物形象：Hernandez Arregui、Scalabrini Ortiz、Arturo Jauretche 和 Rodolfo Puiggros，还有其他人。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的轴心就依托于这种传统。Kirchner 并不是这段时期任何重要历史事件的主角，虽然说他确实是这些集体活动的积极分子，投入了坚定的意志、自豪感和归属感。现任的参议员 Marcelo Fuentes，当初的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的领导人，如今总结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成员或者政治军官是来自于其他党派的。”他想说的是：在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右派领导人。

在这大学基层成员的经验里，Néstor 通常是负责看管那些写满标语的建议书。这些文字都写在白色的卡片纸上，大学生民族革命联

盟里的人会贴在学校餐厅的墙上。重复使用次数最多的一句标语是那些冷库的工人选的，是在1959的大罢工中，来自艾娃一句话的灵感，那原话是“祖国不是殖民，不然国旗就会飘扬在废墟之上”。10年过去了，在新的历史推动下，大学生组织改写成了自己的标语“是祖国，不是殖民”。

## 读书的贝隆主义者

大学食堂在1街和5街的交叉处，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牙科学院。入口在1街，面对着一块大草坪，有花圃。每天中午，在1街上会排两条长队，队伍如此之长，有时候会排到拐角去。在1973年，他们就去那边排队，一个饭点，12000个学生。

那个食堂有3层楼，3个大厅。最大的大厅在115街上，是从小树林中升起的建筑，有着巨大的玻璃墙。那些桌子都是10人座的，两排各4人面对面坐，还有两边各一座。那些椅子是木头材质的，很牢固，有时候会在空中乱飞。拳打群架和大喊大叫都是很频繁的，成千上万的咽喉，吵吵嚷嚷，吵架音量都燃烧到最大。

桌子上有水壶。学生们拿着不锈钢托盘去餐台打菜，那些餐厅的工作人员给他们盛菜，这些人是ATULP(拉普拉塔国家大学工人协会)成员。食堂是政治讨论的战略性营地，虽然事实上真正战略性的是拉普拉塔大学，是这个学校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刚中学毕业，他们就离开了家乡，转眼间抛弃了故乡的家人与风土，来这边居住。在这里，汇集了操着不同口音，对国家有着不同看法，有着不同习惯的年轻人们。拉普拉塔不只是大学：它的影响区域

覆盖整个城市。

也有三两个人一起在外租公寓的，但是很少。大多数人都住在这个食宿公寓里。他们在不同的公寓间转动，互换，搬进搬出换房间住，结识了圣胡安的人，内务肯的人，科连特斯的人，还有那些潘帕斯的人。

除了那些区别之外，那个时代也统一了他们。男孩子穿着牛津裤子，留着长发，女孩子穿着迷你裙或者超短裤，尤其是那些读美术或者人文的学生，与那些学法律的男孩们同住，这些法律系的会抹着发蜡，戴着领带像个小男人。他们可能是在学院里认识，也可能是在班级里认识，但是所有人都会聚集在食堂里。

每个人打到菜，拿着托盘就开始找任意桌子上的空位。这样就方便不同系不同专业的学生互相结识。大学会民族革命联盟就充分利用到这点。1970年，Carlos Kunkel(卡洛斯·昆克)即将获得律师学位，也马上就要开始任职拉普拉塔市贝隆主义党的秘书长，但他依旧领导着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同时也是学校食堂的负责人。“完全就是大学生活”，他微笑着回忆说，“我们在6街上租了一个公寓，在斜街79街和53街之间。在天然气房，有很多的钥匙。从来都不缺意式肉肠，饼干。当食堂关门了，我们就吃炖菜，总会凑到8到10个人一起。”

他每天都发传单，从那门口的草坪开始发。当他们在排队去点菜的时候，就传播这些地下活动。有些是Arturo Jauretche(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的思考家，精神偶像)的演说，有时候是邀请放映电影《燃烧的时刻》。

“我们所提出的是，斗争或者工作的进程应该是与反对专政一致，不仅针对那些具体的问题，行会问题、学生问题、要求权利的问题。”Kunkel(昆克)说，他当时是Néstor大学时候政治上的领导，“不

仅在学生中，也要在工人队伍中宣传。这是基石，是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活动的ABC。在69年，又产生了更多的运动，有罗萨里奥人的，有科尔多瓦人的。

Néstor Kirchner和Pepe Salvini之前是Rio Gallego(里奥加耶戈斯)的少年活跃分子，成立了在拉普拉塔的圣达克鲁斯学生会。他们意识到个怪事情：这届他们省的大学学生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之前从圣达克鲁斯来拉普拉塔读书的学生都没有超过50人。他们是从父辈知道这个事情的。Néstor父亲是邮政的出纳，也是Felfort(公司名)和Terrabusi(公司名)的协调人，Salvini的父亲是宪兵。

他们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因为刚开始，他们在食宿公寓里组织聚会，晚上弹吉他和吃饺子，就开始来了很多人。然后Néstor组织了在绿草地组织运动，踢足球。来的人一次比一次多，所以Néstor和Salvini就决定成立圣达克鲁斯学生会。Salvini是主席，Néstor是副主席。当Cristina认识Néstor时，他就在做这些事情。

“多胡闹呀。”Cristina突然说，想起来就笑Néstor，说起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就不禁跳出这词。她觉得“胡闹”的是这个学生会对很多事情有严格要求，尤其有些还与私生活有关。她刚刚回想到的一件事情是：Néstor负责与Esteban沟通，因其一场“资产阶级”婚礼而遭到批判。

Cristina、Néstor和Esteban有着很亲密的友情，Esteban主持着学生会的新闻部，结婚对象麦特也来自内务肯省，是Pipa Cedola曾经的室友。而Pipa是Cristina的朋友，同时是奥马尔的女朋友，而Néstor又和奥马尔合住。这么说来，就像美剧里的《老友记》，有一点这种成分，但不尽相同。

这对年轻的党员举办了斯巴达式婚礼，有香肠肉饼，有红酒。麦特和 Esteban 去内务肯举办婚礼，然后麦特的母亲说服他们在小庄园里办一个派对。也没有很特殊，就是和家人亲属朋友们吃海鲜饭。当他们回到拉普拉塔市时，那个负责严肃指出 Esteban 品行不端的人就是 Néstor。

Cristina 回忆着，笑了：

“我想是因为那些关于这个婚礼的谣言，说婚礼上有华丽的四轮马车，就是那个风格，说听起来就是…财大气粗。多胡闹呀。”她又重复了这句，带着些许的温柔。

那些时期党员的同伴们回忆起 Néstor “模仿贝隆” 的场景。他抬起双臂，用沙哑的声音开玩笑。他那时很瘦，很高，戴着厚厚的眼镜。不像那些法学院的学生似的穿西服，他经常穿一件嫩绿色的大衣，在胳膊下总是掖着两本已经反复翻看的书：一本是 Antonio Cafiero 的《五年之后》，另外一本是凯恩斯的，关于理想国理想体系。

另一边，Cristina 已经开始了心理学的大学生涯，在那里，她立即感受到了贝隆主义与左派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她没有加入 JUP（贝隆青年大学生联盟）。她参加过学院里举办的国体建设大会，也在小区的贝隆主义党组织工作过。

## 1972年11月17号

这一天，是贝隆回到阿根廷的日子，是非常疯狂的一天。拉普拉塔的大学生们为了这一天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了。

整个11月16号的晚上，乌乌泱泱的人群从拉普拉塔市往阿根

廷国际机场方向走。那执拗的雨把道路都变为了泥潭。拉普拉塔这个队伍走的路线穿过Turdera(地名),是Néstor和他的同学Daniel Fernandez、Esteban合作设计的路线,目的就是在Alitalia飞机降落时要在现场。

拉普拉塔的这个队伍由卡洛斯·昆克,老Horacio Chavez和卡洛斯Negri负责。上万的学生和各个区党员在头一天就开始赶路了。在凌晨时,有数百人在纺织工人协会的健身房里睡了几个小时,还有数百人被铁路工人收留在他们的棚屋里。这个队伍太长了,很多人筋疲力竭,灰心气馁。医学院的队伍巡视着这些队伍来协助那些坚持不下去的人们。昆克回忆说:“给他们一剂药,然后回家”。当时都没有时间暂停。

天亮的时候,队伍从后门到了国际机场,但是在路面上有蓝色的小坦克在穿梭。一个瘦弱的人去简短的协商后取得的结果是:没有限制命令,但是他们必须得离开。那些坦克开向一边,然后这上万人开始动身往回走。那一刻,贝隆已经在阿根廷了,而他们的目标也完成了。

## 1973年的6月20日

这是国际机场大屠杀的日子。贝隆先生回阿根廷要留下来,Cristina的母亲Ofelia Wilhem执意要去机场迎接。她通知她大女儿想要一个人前往。Cristina决定陪她去,在那里她碰见了法学院的组织,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和FAEP(艾娃—贝隆团体战线)的队伍。她们俩就在枪淋弹雨中,虽然说方式有些奇特:是女儿一直拖着母亲离开



那里。

“我也犹豫过，因为我想和法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去，但是妈妈……”Cristina说，带着几许顺从的微笑。“妈妈要去，坚持要去，我曾劝她‘最好留在家里’，可是不听……好吧，好吧，我说，我跟你去。我们非常早就出发了，早上5点刚过。同行还有我妈妈工会里的一位同事。我们从‘艾娃城’下来，前方是一条横向车道。我们得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所以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大概是6点半，天刚破晓。那时天空是一片浓重的阴霾，就是电影画面一样。”

“就好像Solanos(阿根廷著名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电影。”我说。

“不，更有甚者。因为这还不象Solanos(索拉纳斯)是刻意布置的场景。那是一场政治建设，并非小说情节。我们走进机场，开始沿着Ricchieri(街道名)路行走，我从护栏上跨过去，看到这壮观的场景。真是太壮观了。人们就像蚂蚁一样，从各个地方涌来。有独自一人的，有成群结队的，有拿着国旗的，有举着广告牌的。我看见有一群人举着乌拉圭的国旗。我看见有一群印第安人，很高的个子。我看见一个“ERP—8月22日”(一个组织的名字)巨大的旗帜。而所有一切都包裹在这烟雾里。当我们在走了几个小时后到达时，已经10点多了。我走向那个我知道我们学校的同学们会走的方向，就是曾经站着艾娃的那边。在看台上，贝隆巨大的肖像放在中间，一边站着依莎贝尔，另外一边站着艾娃。我们是应该在那边碰头的。当我刚到，就感觉到一阵嘈杂。

“呼呼呼。”我问一个在卖香肠夹饼的家伙。

“是的，是子弹声。”他对我说。“但是从一早上开始就这样了”。青年工会成员开始围着看台组成一个圈子，我记得是绿色。大约下

午2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些时间记得那么清楚,但是我就是记住了。在这个时候,我看见“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白底加蓝字的旗帜,也看见了“艾娃—贝隆团体阵营”蓝底加白字的旗帜。他们都想走向看台,但是被拦住了。

在2点一刻,2点20分左右,我看见他们在用力地要进去。一群人组成经典楔形队形,冲破围栏,然后进去了。而突然,就响起了枪声。人们开始奔跑,向我们站的这边跑来,喊叫着“他们向我们开枪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钻到矮林里,因为我以为那些子弹只是从看台那边过来。我躲在一棵树的后面,我妈还在喊“我要留下来看贝隆,我要留下来看贝隆”。

简直不可思议。

我对她说“妈妈,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然后,突然各个角落都出现了枪炮声。有从看台那边过来的,也有从后面过来的。我拉扯着妈妈,在争吵。

她喊叫着“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从这里拉走”。一个恐怖场景下的一场荒唐的争论。

我们开始往回走,迎面而来成千上万的人群,一直往这边过来,还有大卡车上人们对他们喊:“同志们,不要后退”。那个场面非常混乱,像地狱般。我们一直逆着人群往回走,比来时走了更长的时间。晚上8点多了,我们才回到拉普拉塔。

# 6

## 闪婚了

他看见她非常漂亮,听见她一直笑,整个旅程都在笑,就决定留在前面的座位没过去打招呼,几乎是躲起来的。

就是在这个2月16号,在这辆公交车上,他发觉他们交往的时候,Cristina从来就没有如此开怀地笑过。

他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也正是这一天,他知道自己永远地失去了她。他放手了。

## 遇见他

在1974年，“Pipa”和奥马尔(Omar Busqueta)都是内务肯人，比Néstor和Cristina稍微年长，是拉普拉塔众多党员夫妇中的一对。他们在圣马丁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是四年级、五年级的同班同学。

奥马尔来自一个“亲贝隆”的家庭。Pipa说她的家庭是“非常反对贝隆主义”的。在1972年，他们来到拉普拉塔市时才17岁，他们的生活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政治重塑了他们的世界观，而参加政治组织是内地来的学生的通常做法。

但是命运女神给他们准备了很大的惊喜，在多年后慢慢打开。最不可思议的，就像他们笑过Néstor无数荒唐、夸张的笑话，是这个小伙曾经和Néstor是室友，而这位姑娘和Cristina是同班同学，他们不经意间靠近的这两个人，有一天会成为国家的总统，而且不是一位，是两位都成为了国家总统。

Pipa的室友名叫麦特(Maite Oliva)，也是内务肯人，她们合住的公寓对着圣马丁广场。麦特的男朋友，Esteban([人名]埃斯特班)，是La FURN(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的领导人，家里充满了政治味。这些内务肯人不再听摇滚，而转向听民族乐。他们也不再去夜店式酒吧，而是去慢摇吧听音乐。Esteban一谈起人民和国家就谈个没完，披着他的

红色雨披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自豪地说自己是萨尔塔人。

奥马尔和Pipa读法律，就在他们居住在拉普拉塔的第二年，Pipa《义务》课被分到的学习同伴是一位刚注册入学的女孩，她就是Cristina Fernandez。

她们两位都对书本如饥似渴，狼吞虎咽，对待学业很严肃，所以都不去夜店或者出去玩，而是呆在Pipa家的小客厅里，沉浸在堆满的课堂笔记里。

Cristina在跟一位前拉普拉塔橄榄球运动员交往，名叫劳尔（[人名] Raul Cafferata）。橄榄球这项运动意味着很多东西，但是对于这位贝隆主义思想的年轻女孩，这不是吸引她的理由。最基本的，它意味着阶层。

Cristina已经在学法律了，Alberto Spotta是一位出了名严格的老师，但是Cristina就在他的《合同》这门课里得了个满分10分。这个分数使她赢得了所有同学的尊重，也使她成为那一年的校园风云女郎，人们都称呼她为“那个Spotta的课里拿10分的女孩”。

Cristina和Pipa是同桌。有一天，Cristina向她倾诉她的情感危机。她说和劳尔在一起是很稳定的恋人关系，但是他们的兴趣爱好越来越分叉，她觉得他们的恋人关系无法再继续了。Pipa对她说：“你别担心，我们会给你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的。”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所有在这个时期认识Cristina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糖心。就是那张站在动物园铁栏前照片上的女孩，而如今是博客空间的大众偶像。

那张照片上的女孩，是一个1973年贝隆主义思想的女孩。当我们靠近仔细看，会发现是一个抽着烟，往下看的女孩，当别人给她拍

照时，她不喜欢笑。

眼睛上化了浓妆，非常性感，穿着很小女生式样的芒果图案的方格衬衣，非常合身。但同时，她又是方圆那一片最聪明的女孩。

关于这点，Pipa是在课堂上发现的。她发现到，Cristina不仅尽情地发挥她所知道的东西，还有她那种去辩护的方式：从那个时候起，就像一个行动派的女人。现在，当她重建在她自己青年时期所看见的Cristina人物形象，说其所认识她的那些时光，和现在做总统的样子其实是一样的。就比如她是如何去发挥她所了解的事情，以及她会捍卫的方式。

在1974年，科目自选，由那些班级抽签选定。对于这个政策，应该最大程度地利用它，并且谨慎地对待。但是让Pipa吃惊的是，在那年，在《义务》这门科目的口头考试中，Cristina突然选了一个人所众知的，她自己也知道，与教授所持观点相反的论点。

“有这个必要吗？”PiPa在座位上心想。但是当她看见场上的气氛越来越凝重，她在心里笑了。教授站起来，他和这位化着睫毛膏的女学生辩论，互不相让，唇枪舌剑。教授突然叫停了考试，Cristina非常严肃地从教室里出来，闭著嘴，头抬得高高的。教授们又给了她一个满分10分！Pipa说就是在这个时刻，Cristina如此严格要求自我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仅挑战其他人，更重要的是，她一直挑战自己。

在卡拉法特家里，在谈话的中间，Cristina问我这本书的框架，我从笔记本里拿出几张复印纸，心里暗骂自己。因为我早知道她会想看框架的，我本来是要打印出来，然后放在文件夹里的，像所有正常



人都会做的那样，但是，我的打印机没墨了！

墨迹不清，那几张纸读起来挺费劲的。就在那上面，我画了那本书的架构，把那些我想去交谈的话题，但还没有书写的章节另行处理。她戴上了眼镜来读，把目光停留在靠前的一个话题上：“她的严格自我要求”。

“她的严格自我要求”，她大声地读出来。她摘下眼镜把那些纸张放在圆桌上。“是的，是的，这可以是一个话题。我向来对自己非常严格，这也是与我的责任感和谐相处的一种方式，它们是密不可分的。”

Pipa说做为一个法学院的学生，Cristina总是会让她吃惊。她会很用心很固执地做准备，在她的论据中不会给对方留一缝隙的漏洞。这是她所需要的牢固，看起来来自于她性格的深处。

她在考试中，在大声地捍卫自己信条的过程中，她很享受这种危急时刻冒险，完全信任自己的感觉。学习得足够多，足够到很自信自己能完成。另外一种极端是其他人，一心投入到党员事业，比如Néstor，每次考试只求轻松过关就好。

另一边，Néstor从圣达克鲁斯省过来好几年了，换了好几个住址。1974这一年，在奥马尔的公寓里有空房间，因为他的姐姐们都要毕业了。因为他们在la FURN(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共事，所以Néstor就成为了这个坐落于40街与41街道之间6街上公寓的新房客。

当Pipa与Cristina同桌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Néstor，因为他是她男朋友的室友。在人群中，你可以一眼就辨认出Néstor，绿色大衣，聪明，爱开玩笑，但绝对不是一个美男子。所以说，当Pipa安慰

Cristina 承诺说要给她找一个男朋友的时候，考虑过好几个可能的人选，但从没包括过 Néstor。

当 Cristina 看着自己对于劳尔的求爱、热情一直下降时，去 Pipa 家里参加过几次聚会，奥马尔都会带着他的吉他和几个朋友过来。在这些朋友当中就有 Néstor。在这些先前的交集之中，没有任何预兆，他们之间会碰撞出如此大的火花。

从外形上讲，他们就像是两个极端。Cristina 美得无可挑剔，而 Néstor 就像是一场灾难，特别邋遢。

他们四个在一起学习的时候，Cristina 就像是一台阅读的机器，而 Néstor 连在桌子前坐下来都很困难。

他们是他们几个中最投入，最热衷于 la FURN(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的，但是并不耀眼。

那个 1974 年的学生日，他们擦出了火花。

“9月21日，圣达克鲁斯的学生中心在 Pereyra Iraola 公园庆祝这个学生日。Néstor 从那里过来。我当时在奥马尔家里读书，因为我们有一段民法第四章的小考。Pipa 过来了，对他说她的祖父去世了。奥马尔就陪她出去了，去守灵。Néstor 看见我在学习就提出要帮我。因为我们都是两人一组学习的，由一个人大声地朗读。因为奥马尔走了，他就对我说：‘我来帮你。’‘好吧，谢谢。’我对他说。他坐下来，然后就开始跟我争论了，争论所有的事情！”

Cristina 至今还感到气愤。“那些我知道的事情，我说一些，他就

打断我：‘不是这样的。’我对他说：‘怎么就不是这样的！’‘不，不是这样的。’直到我发现他是醉了。我对他说：‘亲，你在开什么玩笑，出去跟你的朋友们鬼混去吧，别烦我。’他笑了。我也没离开，好像，我记得我留下来了。”

在认识了Néstor之后，Cristina就果断地与劳尔分手了。“我坠入爱河了。”她对他说。而劳尔，一直深信，他们之间相处得很好，而这只是一场情感危机，所以就决定等她。但是他任何想重新挽回她的举动都没有成功。几个月之后，在从首都回拉普拉塔的公交车上，他看见末端坐着一群年轻人，而她也在其中。他看见她非常漂亮，听见她一直笑，整个旅程都在笑，就决定留在前面的座位没过去打招呼，几乎是躲起来的。

就是在这个2月16号，在这辆公交车上，他发觉他们交往的时候，Cristina从来就没有如此开怀地笑过。他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那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也正是这一天，他知道自己永远地失去了她，他放手了。

现在，当奥马尔回忆起那个生命里短暂的时期，那个包括了Cristina和Néstor的时期，说的跟Pipa一样，他们在学生日之后不久就分开了，很多年没有再见。

他说现在他能理解为什么Cristina研读所有领域知识，而Néstor会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来，不仅仅是为了法律系文凭。他们两个人都在做自我准备。

“Cristina不让我们虚度光阴”，他说。当她完成该做工作的情况下，她是个很有趣好玩的女孩。但是她比其他任何人都勤奋。当回忆起Néstor，他仿佛又能听见他是如何捍卫他们圣达克鲁斯的省长

Jorge Cepernic的。

Pipa对她所经历的事情,和她所听说的事情,或者读到的事情搅混了。她其实想忠实于记忆,但就像这个时期的其他主人公一样,很难做到。

有些记忆被堵塞,被那些紧迫的逃亡,那些被杀害的朋友们,那些持续多年的恐惧。那种记忆缺失,并不是主观筛选的。

那是精神创伤。在他们的那些讲述中就能发现这点。

全是片段,碎片,几乎只是些封存的,冷冻的图像。

那些趣闻轶事不是精确的,那些名字是搞混的,那些绰号与名字对不上。

不管怎么说,录完音后,那些有关拉普拉塔的地址,那些数字符号,就像是一种证据,证明着他们曾经确凿地居住在那里。

但是这些回忆终究是断断续续的,而我们的谈话总会引向那些在这段历史中无法规避的人们,那些最亲爱的人们的死亡。那些死亡并非是戏剧性的在谈话中出现的,而像是这条复杂道路上的一些路标。但是在讲述这些的时候,减弱了声音,克制着情感,放置了一个必要的距离来使自己能与这些痛苦的回忆共存。

73年的时代氛围,已经在他们意识观念上烙上了刻印,那个充满

诺言的年代。毫无例外，这个时期都被他们称为是“生命中最好的岁月”，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历史主角，也是因为他们那时都是年轻人，生活在都是年轻人的小气候里，还有那时的国家与民众也都很年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依萨贝尔政府期间，悲剧开始上演，而这些留在记忆里的恐惧依旧在伴随着他们，从来都没有消失过。这些往事因为经常被提起，被召唤，所以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Pipa也记得Néstor谈起Cepernic，原话说“那是我们最敬爱的省长先生”。所以，当Néstor定期地回到圣达克鲁斯，带回来关于南部的贝隆主义党员的消息，引起Pipa注意的是“他对这些事情都知道得那么清晰”。

Néstor和他们一起在拉普拉塔参加组织，但是他是那个头脑最清楚的人，他知道这里只是个中转站，而真正的政治活动应该是每个人转战到自己的家乡，回归到自己的母省去完成的。

她和Néstor一起念了其他的几个学科。而当时他的一个特点让她印象很深，是慢慢表现出来的。“他有一种把复杂的事情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能力，他懂得快速地抓取问题的核心。Néstor是做概括归纳，而Cristina是做分析。”

Cristina和Néstor都主张在民主社会应该抛弃武装斗争，而讨论争论才是政治。Pipa记得有次从五月广场回拉普拉塔的公交车上，贝隆忽视了他们。大学生民族主义大会(CNU)已经在行动，把他们的极右暴行和3A党派的联系起来，贝隆没有反对。自从流亡之后，他与两方的人都有联络。

Pipa回忆说，在那辆从五月广场回拉普拉塔的公车上，装满了悲伤而迷惑的组织成员们。Néstor在过道上走动，对所有人说话，他想当时当地就跟人们讨论对抗贝隆的问题。

关于这个时期，Cristina记得那是在5月1号，麦特、Pipa和她留在拉普拉塔，没有去广场，而Néstor、奥马尔和Esteban去了，但不是结对而去的。那时他们已经不再信奉Regionales。那些组织成员们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关于政治上不断升级的军国主义化和对贝隆的对抗。

Pipa记得虽然他们什么都讨论，但是终究，还是在小范围内，只是在那个能信任的小团体里。Néstor提议就在车上，紧急地，就要在那时那地展开辩论。有些人看他这么赶时间：“这家伙什么情况？他要在这里脱离组织吗？”一个人在底下说到。Néstor批判贝隆和左翼游击队的“垂直主义”（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Pipa说，从远处看，那个发音很糟糕的瘦子抬高音量来对抗其他人，使得他们都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她记得这些对抗有时候会碰撞。也看见了这个人后来当了10多年的行政领导，甚至抵达了总统宝座。她认为当他卸任而Cristina任职为总统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为她效力。

像奥马尔一样，Pipa也理解他们俩生活每个阶段的选择。共同前进达到刚开始的高度，然后也知道在光芒应该让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退隐。

奥马尔和Pipa虽然已经很多年没见，但是他们都各自说过，他们理解在那个1974年的让他们独自相处的下午之后，Néstor和Cristina之间萌生了持久的爱，这份爱是密封的，掩藏的。他们之间建立这种关系，是私下亲眼目睹的，也和后来他们在公众面前表现的关系相互呼应。他们在认识了6个月之后，结婚了。

“兄弟，你好吗，兄弟？”Cacho Vazquez时不时就拍着Cristina的



父亲问候道。Eduardo Fernandez是个激进派党员。Néstor和Cristina婚礼只邀请了9个朋友Cacho是其中之一。那天是1975年的5月9日。

婚礼是在公牛城Cristina的一个阿姨家里举办的。那天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这也是他们想要的婚礼,人很少,非常简单。Eduardo克制地忍受着Cacho不停的问候。Cacho是个圣达克鲁斯的党员,也是民事局的证人。

“一切都好吗,兄弟?”喝完红酒后,那拍打已经让人讨厌。而Fernandez一直忍耐着,毕竟妻子女儿都在场。Cristina那天穿着一条蓝色的乔其纱裙,而Néstor一如往常。因为当时社会在发生很多事情,死亡在周围环绕。一种沉重的氛围笼罩着这个有点非典型的婚礼,双方的父母以前都还不认识,还有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客人,婚礼最后的节目是唱歌,和新郎新娘一起,唱《贝隆进行曲》。

# 7

## 同是革命伴侣， 两种不同人生。

Cristina 被关在一个女子监狱。那个月被拘留的有 3 个女犯。有一个之前是女警，她因在马黛茶里放了老鼠药，试图杀害她丈夫而被捕。另外一个年轻女孩是被她继父强奸，被关起来是因为在公众场合扰乱治安。还有一个是刚向她的情人开了一枪。

在头晕脑胀的阵痛里，她认出了那件栗色的灯芯绒裤子，这一幕永远地刻在她的脑海里。这条栗色的灯芯绒裤子，能证明眼前这个小小的，饱受屈辱和折磨苦楚的男人就是 Chiche。他戴着兜帽，赤着脚，戴着手铐，指甲没有了，满是被折磨的流血的痕迹。

## Gladis 和 Chiche

从1975年的中期到1976年的3月，Gladis Dalessandro、Carlos Chiche Labolita 夫妇和 Néstor、Cristina 夫妇住在一起。刚好当我要开始写这一章节的时候，Gladis 从花城(Las Flores) 发来一条短信。她说她忘记申明了，Gladis 名字里 i 的拼写是 latina 的 i，而不是 y。当我读到这条信息时，我笑了。这个申明和这个事情对她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既是对她身份精确的要求，也是一种文化刻印，一种对语言严谨的态度。

Gladis 从懂事后就参加了贝隆党组织，她的丈夫 Chiche Labolita 在1976年被捕，此后再无踪迹，这种痛失深深地镌刻在她的过去里。

Cladis、Chiche 和 Néstor、Cristina 就是从1976年发生政变的那一天开始住在一起的。当我在《七十年代人》那本书上读到 Gladis 和 Chiche 的故事时，我被触动了。我用荧光笔把那几段章节标记了下来。我就想扩展那个焦距，停留在那个特别的时刻，那个对我来说具有揭露意义的时刻：在那个晚上，Cristina 去 Gladis 家告诉她，她和 Chiche 可以搬到公牛市住他们家，而在这之前她并不认识 Gladis。

我觉得这个场景包含了那个时代强烈的色彩，主演是这两个20多岁的女孩，她们在贝隆主义的信仰里汇合，但同时又代表了贝隆主义的多元性。我用了“多元性”这个形容词，但是其实也可以用“活

动分子”。

Gladis 和 Chiche 是同学，Chiche 之前退出了游击队。所以他们就不得不离开那个他们曾经居住的家，因为那个房子曾被用做为操作室。而游击队已经把这个家摧毁，不留一砖一瓦。Chiche 曾经是一位很重要的军官，在他 23 岁的时候，已经是 berisso 的贝隆正义党的先锋，他们俩人身处危险。另一边，Cristina 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反对武装斗争的政治党员。她刚结婚不久，站在 Gladis 隐秘的家门口，向她传递着她与丈夫的友善。

这是一个把操作室那时的危险转移到自己新婚房子的姿态，是共同承担利害关系的姿态。我想像过很多次那幅画面，想像着她们俩第一次见面，彼此看着对方的脸，所发生的那简短而又紧急的对白。

“你知道吗？我都已经把这段记忆抹掉了，”Cristina 对我说，奇怪于自己记忆的缺失，“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否认，说这个事情没发生过，不是这样的。我已经不记得 Gladis 和 Chiche 是如何到我家的。后来我就记起来了。是，当然确实有这么一段，我对自己说。我确实去过她家，是的，这是真的，是我去告诉 Gladis 让他们过来住。可能是因为后来发生的太多事情让我把最起初的部分反而忘记了。”

Gladis 向我讲述那之前之后发生的事情。在那个 1975 年的晚上，在 16 街和 48 街的日子里，她用一根烟的烟头点着了另外一根烟，抽的是 Colorados（一种香烟牌子）。那时已经很晚了，而 Chiche 还没回家。她绷紧着神经，但是她也已经习惯了这种紧张。她想不出来他们该何去何从。外面所有一切，一片纷乱。那是一个乱世。

Chiche 和她都来自于花城(Las Flores), 但是 Gladis 是在拉普拉塔市的时候爱上 Chiche 的, 那时他 16 岁, 她 19 岁。他来自于社会主义家庭, 他的父亲在花城(Las Flores)创办了 CTERA(阿根廷教职员工同盟)组织。她来自一个信仰人民党的家庭。

刚开始她没发觉 Chiche 那么小, “他看起来没那么幼稚, 跟现在的 16 岁的孩子完全不一样”, 她解释说。他们挨过一些取笑。但是在拉普拉塔, 情侣中女方年纪比男方长还是比较常见的。

当他们认识时, 都已经是贝隆主义党员了。她在一个卫生行会里工作, 而他是在 Berazategui(地名)的石油化工领域。一切都发生得特别快。在 75 年, 光辉已经褪去, 留下的只有恐惧和不信任。那些加入游击队的人们, 已经习惯了组织强加的安全条令。没有人对其他人了解很深, 都互相防范。所以他们, 虽然还如此年轻, 但都有些僵化了。

那个晚上 Gladis 觉得他们的生活真是糟糕透了。他们也讨论过是否回到花城, 但那时离政变还有半年的时间, 而且回去就意味着放弃了, 意味着放弃一切。也许再多坚持一下是有意义的。他们俩的生活中心都曾是非政治, 而在那个时代, 那个他们碰到的年代, 对于年轻人而言, 政治就是奋斗目标。所以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

这时门铃响了, Gladis 很不安。这个门铃从来都没有响过, 因为 Chiche 有钥匙。而且在这个紧闭的家门里, 从来也没接待过任何访客。她起身去开门。

“你好”, 那个女孩对她说, “我是 Cristina Fernandez, 是 Lupin 的同学。”

“你好。” Gladis 回答, 把门缝多打开了一点, 但还是没有让她进

来的意思。

“我和我丈夫刚结婚，我们住在公牛市。我过来找你们是想让你们搬过去跟我们一起住。”

“真好。但是 Chiche 不在家。”

“我把地址给你。”那个女孩给了她一张用圆珠笔写的小纸条，“当 Chiche 回来后告诉他然后你们一起过来。我们有地方给你们住。”

“谢谢，再见。”Gladis 说着关上了门。她站在那里试图搞清楚这个女孩是谁。

手里握着这张纸条，她想起了谁是 Lupin 了。Chiche 之前曾在 La FURN(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组织的成员中走动，寻找安身之所。

在刚才时间很紧迫的自我介绍中，Gladis 听见了她的名字还有姓氏。这引起她的注意，因为在游击队组织成员之间，人们是从来也不会提起自己姓氏的。Gladis 感觉好了一些，充满感激。她清楚地知道收容他们本身意味着分担着一个麻烦，不由夹紧了手指间的纸条。

过了一会，Chiche 回家了，Gladis 激动地跟他讲了这个事情，给他看那张纸条。他们没有犹豫，当天晚上就收拾了行李，整理好那些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家具，次日就搬到了公牛市。

与 Néstor 和 Cristina 共住的房子是个简单朴素的小别墅，就像那个区的其他房子一样，在入口处有个小花园。这是 Cristina 的父亲借给他们住的房子。

有一个厨房，一个客厅，还有一个 Lupin 和 Cristina 的卧室，上面有个整体小阁楼。

“你们可以住在这里。”Cristina 指着那个位置对他们说。他们同意了。



日子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黑暗，每天充斥着坏新闻。

但是这两对夫妻还是相处得很好的，虽然Lupin和Cristina是新婚夫妇，有很多政治的，家庭的争执，但是也是因为他们四个都是辩手。除开这点，他们合住得很和谐。

从一开始，他们就尝试着过正常的生活。Gladis、Cristina、Lupin每天早上都出去上班，Chiche有时没事情做，但是也一样出门，为了不引起邻居注意。

这个房子是Cristina家里的，有时会有她母亲来串门，在她面前，Gladis和Chiche就假装是访客。而同Cristina的妹妹吉泽尔，因为她天天过来，就产生了信任，Gladis很喜欢她。她还是个小女孩，在上中学，个性温和，对周边人都很友好。她平常话不多，也不怎么插话，但是她沉默时的宁静给Gladis带来一丝抚慰。Gladis总觉得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倒不是因为她说说话表现出来，而是因为她能保守秘密。Gladis很信任她。

他们的日常生活总是越简单越好。四个人聚在一起吃晚餐，一般是米饭、面条和炖菜。Cristina在那个时期被形容为是“非常好的厨师”，虽然留在记忆里有一次失败的大丸子。

“本来丸子做得很好，我甚至还准备了橄榄油碎，还过了下面粉，做了一种非常好吃的酱。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大丸子应该在放入酱之前在平锅密封一下，所以都作废了，根本没法吃。好吧，但是一样也都吃了。Néstor从来不做饭。在我们结婚前，在他住食宿公寓的时候，他们有各自分派的家务活。Néstor负责清洁打扫和整理，对这点他倒是很热衷的。我不记得是他们中的谁做饭，但是简直是一场灾难。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们在做一个炖锅。但是你知道那些佐料是应该分开放入的，而他们一次性就全都放进去了，而且我

也不知道他们放了什么，但是那口锅里，油脂都凝固了，还有个大勺子立在上面。”

在公牛市的家里，Lupin和Cristina接待很多贝隆党成员同志到家里，经常性的。Gladis和Chiche没有访客，也会凑过去。那些个周日，会有烤肉，吉他，和深聊。那是一周里最开心的时刻。

在那个时期，人们都宅在家里，住食宿公寓里，生活在旅舍里。他们没有多余的一分钱，除了Néstor和Cristina，他们会把他父母每个月寄来的生活费都存起来。其他人都没工作，生活非常拮据。

那是段粗糙、坎坷、简朴的岁月。如果他们出门，唯一可能的目的地就是组织的帮伙聚会。有肉包、饺子、红酒和民俗乐。那些参与者，都是纯粹的党员。

他们尽可能地获取所有信息，对所有时事新闻如饥似渴。在家里，Lupin总是拿着一个收音机放在耳边边走边听，听所有时事新闻和Racing球队的所有比赛。在开始同住后不久，作为一个职业辩手，Chiche把焦点放在Cristina身上，因为她总是辩驳他，与他争论那些观点和论据。他们经常讨论国际政治，关于二战和战后。

对于Gladis来说，Cristina有点怪异，虽然这个怪异并没有让她疏远。她们接受彼此为同伴，而这比任何差异都深刻。但是这个来自中产阶级的大学生，会着魔似的在某个时刻就大声朗读，在家里走来走去，重复着那些已经读过的笔记。对于Gladis来说，这位同伴从一大早眼睛就被书勾住了，既不在意穿的衣服，也不化妆，真是有些许的怪异。

Gladis看Cristina和Chiche辩论觉得很有趣。他们两个人看起来很像。在辩论中，Cristina会让Chiche赢，而Lupin则会让Cristina赢。

有时候，他们中突然谁讲了一个笑话，会很快地传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

但是Chiche和Cristina都不会妥协观点。有一次他们有个关于中国革命的长久而精疲力竭的争论。过几天刚好就是Cristina的生日，Chiche让Gladis陪他去买礼物，那个礼物他已经选好了：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命运》。Cristina在两天内就把这部作品狼吞虎咽地看完了，该书是基于毛泽东的外交特使周恩来领导的革命展开，书中展示了来自不同革命派别的碰撞与背叛。在中国上演着这场革命的同时，在苏联正在发生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分裂、流血。

在1975年的年末假期，Lupin和Cristina安排了去Rio Gallegos的旅行。距离很远，当时飞机的航班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频繁。Gladis和Chiche去Ezeiza机场给他们送行。在南部，他们被捕了。

那是1月6日，这对年轻的Kirchner夫妇出门吃饭，和另外一对夫妇，Cacho Vazquez和他的妻子Mabel。他们聊了几个小时后，Mabel得回到Borreli诊所，因为她的婆婆住院了。他们四个坐着Cacho的黄色雪铁龙。在诊所门口，他们被一辆绿色小炮车拦住了，里面有3个民警，还来了一个省派出所的巡警。其中一个警察指着雪铁龙的驾驶员：

“你是巴斯克斯(Vazquez)吗？”

“是的。”

“你被捕了。”

他们四个都被带走了。在第一派出所，Cacho和一个年轻的职员交谈了几句话，因为他刚好是中学同学。Cacho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一个命令逮捕第五军队的成员。”那个职员凶巴巴地说。

“那他们三个呢？”Cacho问，看向Néstor、Cristina和Mabel。

“他们是因为和你在一起。”这是回答。

他们四个一直被拘留到月底。他们的家人东奔西跑地找关系，就像这个国家的所有小城市一样。在政变之前，这些关系还是能起到作用的。

Cristina回忆起这段被拘留的日子时，睁大了眼睛。她点点头，然后停顿了一会才回答，就像是在恢复那个1976年的1月的画面。

“我当时被关在Rio Gallegos的第三警局，说来也怪，刚好是在我们以前住的房子的几百米处，现在那个房子是我的儿子在住。那是一个女子监狱。那个月被拘留的有3个女犯。有一个之前是女警，她因在马黛茶里放了老鼠药，试图杀害她丈夫而被捕。另外一个年轻女孩是被她继父强奸，被关起来是因为在公众场合扰乱治安。还有一个是刚向她的情人开了一枪。她们在警察局里随意走动。我无法联系外界。而Néstor被关在第一警局，那是在市中心，坐落的那条街，那时候的Julio Argentino Roca(阿根廷的一位前总统)。现在那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叫Néstor Carlos Kirchner总统大街。”

当他们被释放后，回到了拉普拉塔，大灾难的传言已经在蔓延滋长。在年轻的贝隆思想的大学生之间，两位la FURN(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组织的历史性领导人Turco Achem和Carlos Miguel被杀害，这种恐惧还在持续。这两个名字本来是他们的榜样与归属。是两辆没有牌照的车分别截获他们，并且放在一起给处决了。

月中的时候，吉泽尔告诉Chiche和Gladis，Néstor和Cristina被逮捕了。

“你们得离开这里。”她对他们说。

如果家里的某人落狱了，安全起见，其他人是应该马上离开的。他们打了一个包，然后去其他同伴家去住。在Lupin和Cristina无法回来的这个月，Gladis、Chiche和吉泽尔很多次到公牛市的家去烧书。那是整箱子整箱子的书呀。吉泽尔当时就在哭，既是为这些书而哭，也因了她姐姐的前途莫测。有很多杂志，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贝隆主义的，他们在别墅后院的烤肉架上把它们都烧了。

公牛市的家锁起来了，连衣物也锁到衣柜里去了。

回来后，Chiche、Gladis、Néstor和Cristina在10街上的食宿公寓里找了两个连在一起的房间。那是一栋阴暗的楼房，长长的走道，一连串的房间挨着房间。每个房间有一个洗手间，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厨房，一个古旧的壁柜。但是对他们来说已经够了，因为每个人也就带了一包的行李，其他什么也没有。

他们四个还是在上班的点就出门，过着或者假装过着正常的生活。在这个恐怖的月份，有预言要政变，他们活在痛苦的窒息里。他们每个晚上晚饭时都会见面，有时候整顿饭下来一句话也没说。每天都在上演着炮火、绑架、炸弹。

他们开始思考要离开，感觉到了放弃。现在也没有朋友之间串门了，一切都瘫痪了，解散了。Lupin和Cristina谈到要去Rio Gallegos。当时Kirchener家族没有搞政治，四代人都已经定居在圣达克鲁斯省，而在南部的狙击不像在北方那么激烈。Chiche和Gladis犹豫是否回到花城。那是一个小城市，他们会暴露的。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入党了，收留过很多有安全问题的同伴，甚至包括那些73年政变逃亡到阿根廷的智利党员。

在3月23号的晚上，他们早早就躺下了。当时局势的紧张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了。Lupin睡不着，他整个晚上都在听收音机，直到凌晨，他突然叫醒其他人。

“开始了。政变了。”他对他们说。

他们四个聚在Lupin和Cristina的房间，得马上离开这个房子，甚至得离开拉普拉塔。他们在两个房间，收拾了所有散落的行李，装到大袋子里。他们分别去各自的同伴那里待上几天。在凌晨的时候，赶在大街上出现运动之前，他们从那栋楼里出来，在门口拥抱告别，互相祝福对方好运。

几天后，Gladis用公用电话打到工作的地方辞职，也是这样，她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而这改变了他们的后来的命运：在花城，在政变的前一天晚上，Chiche的父亲被抓起来了。

Chiche毫不怀疑他们想抓的人其实是自己，他得回老家把他父亲换出来，他很确信最多就是在牢里被关上一段时间。但Gladis不这么认为，她想劝他改变主意，放弃这个打算。但是当时也没有很多的选择。自从父亲被抓后，Chiche的母亲就抑郁了，躺在病床上，因为父亲一直是整个家庭的支柱。Chiche还有几个年幼的妹妹，他决定回花城。

Lupin匆忙地完成最后几门科目，想着要越快拿到学位越好，然后跟Cristina逃到南部。在7月3日考完了最后一个科目，Chiche和Lupin碰头分析当时的形势，Lupin建议他不要回去。但是Chiche毫不动摇。



“这是我的责任，这样才能完结。大不了就蹲7年的牢。”他说。

他们在大街上拥抱告别。

而这就是永别。

在那一周，Chiche和Gladis分开回到花城。Gladis为了不牵扯到她的妈妈和姥姥，住在前几个同事的家里。刚过了几天，在这几个同事的家里，当他们和Chiche在喝马黛茶的时候，警察出现了。他们问谁是卡洛斯Labolita，“是我”，他说，他们就把他带走了。

刚开始的两天，是在花城的警察局合法拘留。但在4月27日，就和其他两个被扣的“光明和力量”组织的成员一起移到了“蓝色”监狱。在“蓝色”他们把Chiche扣留在看守所，而把其他行会里的人带到刑部。Gladis、卡洛斯的母亲和一个妹妹在第二天就去“蓝色监狱”看望。他们给他买了香烟和一条裤子，但是里面人说他现在不能与外界接触，他们不能探望他。

同一个晚上，Gladis去她婆婆家睡，两天了都没能合眼，只好吃了一些药片来镇定。在半睡半醒之间，她被几声尖叫声吵醒了。当她睁开眼睛，看见了8个士兵，其中有2个拿着枪对着她的脑袋。

他们揪住她的头发把她从床上拉下来，用力地推到厨房，在那里她看见了她的公公，那个先前在牢房的Chiche的父亲。他们把他从牢房里拉出来就是为了让看这个恐怖的场景。她的婆婆和姑姑们被关在一个房间。Chiche的爷爷奶奶，已经非常苍老了，在另外一个房间哭。Gladis和她公公被他们从大门口拉出来，在那里她看见了他。Chiche就在他们手里，戴着兜帽，赤着脚，戴着手铐，指甲没有了，满是被折磨的流血的痕迹。

Chiche请求他们不要对Gladis做任何事情。在头晕脑胀的阵痛里，她认出了那件栗色的灯芯绒裤子，这一幕永远地刻在她的脑海

里。这条栗色的灯芯绒裤子，能证明眼前这个小小的，饱受屈辱和折磨苦楚的男人就是Chiche。

他们来找一份根本就不存在的名单。他们把Chiche带上一辆车，把Gladis带上另外一辆。私闯了两处民宅，那两个地址应该是从他那里得到的：一处家里的人到欧洲了，另一处是空房子。

Gladis在车前排的地上，他们踩她，踢她，虐待她。他们带着Chiche在村里转了几圈，要他指认出人来，Chiche一个也没指认。在此同时，他们殴打Gladis，直到他们都累了，就把她推下去，转过身，让她背对着，假装要射击。她惊愕地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他们又带走了Chiche。而Gladis，此后至今再也没有见过他，再也没有。

在凌晨的时候，她的婆婆和姑姑找到了她，她们一直像两个幽灵一样在花城漫游，被昨晚发生的事情怔住了。就从那天，5月2日起，他们开始了持续多年又从未停止的搜索。

Chiche的父亲被关了5年。

Chiche还是失踪状态。

他的死亡从来没有被证实。

7年后，已经在民主社会。Lupin经过一条公路，在加油站询问Gladis的下落。他们给了他一个地址，他去了花城。

到她家，按门铃，留下来吃了顿午饭。Lupin和Cristina曾经在Gonnet(地名)租了一个乡间别墅，为了和家人共度一个月。Lupin邀请Gladis过来和他们一起呆一个礼拜。在那里，他们重逢了。

2003年，当Kirchner上任为总统后，Gladis接到Cristina的一个电话，邀请她到总统府(Olivos)就餐。

“到Olivos？我？”Gladis在电话里笑了，Cristina也笑了。

当她抵达时，Lupin对她说他考虑在花城做一个活动，纪念那个村子里失踪的5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Chiche。他们是在那一年聊到这个事情的。后来就在2004年的花城(Las Flores)，总统先生在Mitre广场举行了独石碑落成仪式，被一群支持人权的群众围绕着。在这个典礼中，他谈到了这位朋友的勇气。他说，如果卡洛斯Chiche当时把他供出来，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当上总统。

如今，Gladis是个发型师，住在花城里。在她家简朴的饭厅里，有一幅小小的毕加索的复制品《格尔尼卡》。她依旧是党员。

## 8

# 重返政治舞台，他实现了当省长的诺言

Néstor 曾说从一杯鸡尾酒到另一杯鸡尾酒是无法统治一个国家的。

当她听见 Néstor 当着梅内姆的面重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当她看着他孤身一人，高傲而果敢地站在人群中，她大声说：“这就是我嫁的男人！”

## 南部

Cristina 23岁的时候,刚结婚不久,为了逃离拉普拉塔恐怖的氛围,来到Rio Gallegos定居。对于Néstor来说,只是回到故土,这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一毕业就回来的地方。

而她还差3个科目,得和她母亲商量。以她的个性和求学表现来说,做这个决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得放弃未完成的科目,这些按计划应该是在1979年完成的科目。但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无法去判断到底会拖延多久。在那个1976年4月的一个下午,她母亲Ofelia的建议是,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生存。

“我想离开拉普拉塔,我想走得越早越好。”Cristina说,说得很快,就好像是回到了当时的紧急状态。“Néstor对我说他需要先毕业。我们站在我妈妈家的走廊上,我们三个。‘我需要当律师来赚钱,因为我想当圣达克鲁斯省的省长’,他对我说。我看向妈妈,‘你听见这家伙说什么了吗?他要当省长!什么的省长,哪里的省长!’我喊道。因此,他任职省长的那一天,对于我来说,是所有日子里最不可思议的一天。”

Cristina首先得习惯那里的大风,起初的那段时间非常困难。巴塔哥尼亚的风非常狂野,一种难以被驯服的凶猛。每次开门,都像被打了一个耳光,或者是被撕扯着头发。在Rio Gallegos的广场上,那

些树都是倾斜的，偏到地面上，那是因为海边刮来的风把它们吹弯了。

他们住在男方家的一个小别墅里，那是一个古老的建筑，就在5月25号街上。在这个客厅，他们创立了第一个律师事务所。接下来一切都发生得很快。第二年，已经做了玛西莫的父母，Chango Icazuriago从玛西莫一出生就认识他，称他是“73年的最后一名党员。”玛西莫出生在1977年，事实上，他的幼年时光，是在父母从政治舞台中收回，在家韬光养晦的环境中度过的。

当Néstor和Cristina刚在南部安顿下来，出乎预料的，传来了智利战争的威胁。Rio Gallegos被军队占领了。从未料想，这些居民当中塞进了很多军人。1978年，是一场噩梦。很多家庭都撤离了，原样抛下他们的房子，就像几年前他们俩抛弃公牛市的家一样。Rio Gallegos、Rio Grande、Ushuaia，这几个地方的人都开始打包行李，投奔各地的亲戚朋友，寻找临时的安身之所。直到1978年的圣诞节，教皇的调解取得成效，阿根廷和智利的政府军队决定撤退。在那里切身感受到的恐惧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觉察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可能会是一场赤膊肉战。而对于Néstor来说更是双重打击，因为他的母亲是智利人。

过了几年的寂静和与世隔绝，几年来都是关门小范围聚会，人们之间充满不信任。在1980年，有人在律所里放了一个炸弹，这时候的律所是和Chacho Ortiz de Zarate合伙经营的，他们又再次感觉到了一阵危险。

“他们让煤气跑出来，把律所变为一个巨型炸弹。那些炉具的管子也被切断了，也泄出煤气。那是在11月的一个周六，他们于凌晨闯



进来。在早上8点的时候，一个员工来上班，他是一路抽烟过来的，但还好在人行道过马路的时候掐灭了。他没有开灯，里面有一些荧光体的管子。后来我们了解，当时如果开灯的话，就爆炸了。煤气的气味大得可怕，这个员工走到厨房，看见了那个装置。他立刻飞奔到我婆婆家，Néstor在那边过夜。“Maria夫人，我有紧急事要跟博士(指Néstor)讲。”他对我婆婆说。当她弄醒Néstor后，他对Néstor说：“在律师所有个很奇怪的东西，在嘀哒嘀哒地响”。Néstor打电话给股东，Ortiz de Zarate，他们俩一起去了，都没意识到危险。他们先去看了那个装置，然后立马跑到第一警察局去报案。那个警卫职员对Néstor说：“别闹了，博士”，因为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会在Rio Gallegos发生。他们就派了一个家伙，那人一进去就跑了出来。他们通知了整个街区封路。那个装置被解除了。我拟了一个申请，跑了整个村，获得了意想不到多的签名，因为所有人都愤怒了。之后警长约见我，他是属于军队的，当时整个省由航空治理，而情报由军队管。

那位警长原来是陆军中尉。他非常恼怒，不是因为有人给我们放了一颗炸弹，而是人们没有得到他的授权。当让我做证词时，他们问我是否怀疑某人。我回答说，前天，接到一个电话，是基地的二把手Andres Antonietti旅长，他要我汇报一个官方赌场的公务员的账户余额。我们之前就和他有分歧，因为我们是巴达哥尼达银行的律师，我们有一起航空工程承包商的官司。在这个电话中，我说我不能提供这个信息，然后我就挂了。在警长召见我时，他对我说：“你是个非常勇敢的女人”。“为什么？”我问他。“因为你在为一份申请聚集签名”。“那又如何？”我说。“你还在你的证词中提到了一些官员”，他回答说。“学校的时候，老师们教育我要对警察说实话。”我说。然后我问他：“如果这些人跟这些事有关联，会怎么样？”而他是这么回

答我的：“肯定会有人员的调动。但是我不允许他们卷入到我的管辖区。”

在这同一年，Néstor 和 Cristina 决定，是时候回到政治舞台了。在那个时候，公开地，他们以一种胆怯的酝酿已久的方式重返政治。他们宣传的是“民主的出口”。但是这个出口要在1982年才能遥望到，在这之间还隔了个马岛战争。

当谈到马岛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个在《6, 7, 8》频道经常播放的光盘。2010年的秋天，在南部，Cristina 发表演说，听众是马岛战争中的士兵及其家属。她说，有个小女孩刚把她父亲的勋章给她，她的父亲在马岛战争中牺牲了。

Cristina 说：“她对我说，她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她的父亲是为了国家而牺牲的”，然后她的声音沙哑了，突然放声大哭。Néstor 逝世后，Cristina 在公众场合曾哭过很多次，但是，在这个秋天，人们还从没见过她如此这般强烈的情感流露。马岛是一个触动她内心深处的一个话题。当我开始更近距离地了解她的个人经历，她的过去，我非常能理解她。

这关系到重建那时的环境与氛围。所以人们可以体会到，她和 Néstor 在南部，生活在战争时期，他们的情感厚度。这样也更能理解阿根廷在联合国时，面对英国的姿态立场。而且，也可以也使“国家”这个单词更加的深刻和肉体化。“国家”一词，还是来自那个口号：

“国家，是的！殖民地，不是！”

## 那些不飞回来的飞机

Rio Gallego 是离那些岛屿最近的大陆点，距离有 700 公里。当战争开始时，飞机从那里起飞。飞行自主时长为 2 个小时。会有人到街上看它们起飞，然后数时间，2 个小时之后，同个人会出来看它们飞回来。日积月累，他们靠着自己的眼睛就知道还有多少辆飞机在路上。当时的媒体，和政府官方沟通后，都很高兴，都炫耀着“即将胜利”。

在 Rio Gallegos，那时人们已经知道，从智利飞来的英方的 Sea Harrier 是支持他们的舰队。在当地，没人觉得他们能战胜得到美国和智利支援的英方。在阿根廷的其他地方，西班牙的足球世界杯和大量虚假的新闻媒体报道，使民众转移注意力，公众报道像一种自我欺骗，但真相就在浮出水面的边缘。

我一刚跟她谈起马岛，Cristina 的语调就绷紧，变得有攻击性。她立马从沙发上欠起身体，因为有些咽在肚里的话不吐不快：

“当我听见说我们觊觎马岛……我们觊觎马岛？当在 1988 年，这家伙，”她指的是 Néstor，“当他是市长时，还没那么多人认识他，他立了这个国家最早期的纪念碑来缅怀那些在马岛中阵亡的战士。立碑的地方非常显眼，就在 Rio Gallegos 城市的入口处。当初那里是一片荒漠，只有那个纪念碑和那个城市。

“然后建立了 Cardenal Samore 圆形广场。这些都是为了透视这个话题的政治手势。因为没有人想要谈马岛，马岛被看成是一个坏话。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立纪念碑的这个决定。Norma Segovia 是《南方视角》报社老板的女儿，她是一个雕塑家。她摆出了一件作品，

是那些士兵用臂膀带回那些受伤或者牺牲的同伴。这个作品没有被当时的委员会批准，因为他们说这代表着溃败的形象。但是对我来说，这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我能记得很多细节。不久前，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Norma Segovia的雕塑碑现在被安置在Madryn(西文地名，马德林港)。20年过去了。终于！太好了。”

在1982年，Hector Chango Icazuriaga来Rio Gallegos服兵役。他是个25岁的新上任的律师，请求延长服兵役期限。

停留在步兵部队机械化24支团，位于市中心。军队的运动和战争的刺激，当局让这3位请求延长服兵役期的新兵住在军营外。

他们立即就服从了，在食宿公寓租了一个房间。每天晚上8点，他们就离开军队氛围，回到民众的世界，在这里人们毫不怀疑，大溃败迫在眉睫。

终于有一天，他们仨因痛苦与忧虑驱使，立正站在首长面前，请求批准问一个问题。

“我们只是想知道是否会派我们去马岛。我们会很骄傲地去，但是我们想提前知道以便可以通知我们的家人。”

在那时，还不存在手机和电子邮件，通知家人就是让他们做好任何可能的准备。首长带着轻蔑地盯着他们看。

“你们永远也不会去马岛的。”他们对他们说，他们面面相觑，“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首长。”他们三个回答。

“因为如果你们去了，当你们回来，你们会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你们会说话的。”

后来他们才知道为什么不能说话。那些滥用职权，那些虐待，那

些把人手脚绑在桩上的折磨,那些饥饿,那些滥用款项,转移资金,那些高层指挥官的可耻行径。

Icazuriaga来自Chivilvoy(地名)。以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修法律,曾经是JUP(贝隆主义青年大学生联盟)成员。在那时,Néstor Kirchner是当地贝隆党的年轻领导人,贝隆主义觉醒了,就像激进党和其他的政治力量一样,那一年诞生了多党派。

在《南方视角》报纸上有一张Kirchner夫妇的照片,引起了这位年轻律师的注意。报道的是两位曾经在拉普拉塔求学的贝隆党的年轻律师。而他一直在这个每天晚上回来睡觉的城市里,寻找政治上的借鉴。

在当地的 multipartite 的领导人们来岛步兵团,来支持Rio Gallegos旅长Guerrero(格雷罗)将军时候,他认出了Néstor。他们支持马岛案件,就像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多党派一样。在这个时期,有一张Kirchner访问那个旅长的照片。这张照片被媒体恶意使用,来猜测Kirchner和Guerrero可能存在的关系,而其实Kirchner除了那次接触后就没再联系。Guerrero在Rio Gallegos的军旅副手是Brinzoni将官,是军队的Videl翼下的人,在生活辗转多年后,为军队指挥。当Kirchner任职总统后,他就离职了,取代他的是Bendini(本迪尼)将军。

Icazuriaga并没有在那张1982年的多党派照片中出现,因为当时他还只是一个近侍,站在闪光灯的两米开外,穿着兵役的衣服,手上还拿着步枪,但他是那个时刻的目击者。那些领导人和组织成员那天宣读的内容,包括讲到马岛战争将会胜利,专政独裁这七年来第一次在政治里展露无疑。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奋斗的目标已经不是战争,而是寻找民主的出口。

## 胡安·多明哥·贝隆协会

胡安·多明哥·贝隆协会是Néstor和Cristina建立的回归政治的平台。Pepe Salvini,那个中学时和Néstor一起成立学生中心的同学,也在这里重逢。“我们当时大概30来岁,我们是专政前的那批人”,他具体地指出。在75年,Salvini嗅出了危险,离开了拉普拉塔,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居住了几年。“那个年代群体”指的就是他们,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被国人称为“那些企鹅”,或者是那些Néstor的“小圆桌”成员。

Cristina已经不仅仅被认为是律师,还是党员。她开始在协会的公开场合发表演讲。

从那里,涌现出了一批领导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把她的形象覆盖在整个城市。他们才15号人,但是Néstor的简图包括了Rio Gallegos所有街区,那是一份覆盖政治领土的简图。他们根据这份地图来扩张演说的范围。

通过那些住在不同区的朋友和熟人,协会的组织成员们给小众组织烤肉和社交聚会。很多时候,在场的是组织成员,房东,还有一些好奇的邻居们,就没有其他人了。但是他们所寻求的也就是这样。Néstor的脑子里有一种蚂蚁似的工作,缓慢而持续。

他们把协会变为为了一个文化政治中心。来讲话的人物比如Jose Maria Rosa和Sbarra Mitre。这些狂热的活动之后,他们去酒吧中继续,比如Nipur酒吧,在那里,在不同的桌子上,坐着贝隆主义不同流派的成员。

协会的成员有：Daniel Varizat、艾丽西娅、Chavez、Carlos Zannini 和 Cacho Vazquez，那个在1976年的“国王日”和 Néstor、Crisitna 一起入狱的朋友，也是他们在拉普拉塔婚礼的见证人，他后来在2008年去世，就在副总统 Cobos 投反对票同一天。

贝隆主义，对他们来说，是唯一能把有益于国家和民众的各力量整合起来的政治身份。政治是思考与行动：从一开始他们就对准权力建设。还差几年，但是他们取得了最先的政治成果：Néstor 获选 Rio Gallegos 市长。

作为参考的是先前的省长 Cepernic，曾经与 Lopez Rega(人名) 斗争，后来在 Magdalena(地名) 入狱结束。

他们开着 Néstor 的雪铁龙，走访了不同的社区，从一边到另一边，贴标语广告，组织周末烤肉。当民主回归时，他们推举 Néstor 为1983年的市长候选人，但在党内竞选失败了。他们没有灰心，初心未改。Néstor 一直在谈到的是政治空间的建设。

现任的国防部长 Arturo Puricelli 在民主回归后，被选为圣达克鲁斯的第一任省长。在这片土地，除了流放的那些年，一直都是贝隆党获得选举。在 Néstor 党内选举失败后，协会支持 Puricelli 做为候选人。

“当我们在第一次党内竞选失败后，所有同事都哭了”，Cristina 说，“我们当时在 Alcorta 街的小店。Néstor 说‘好了，现在我们应该去向获胜的人道贺了’。激起一阵喧嚷……没有人愿意去。我就看着 Néstor 拿起一面国旗，说：‘如果没有人一起来，我就一个人去，但应该向获胜的人道贺’。然后我们都去了，一边哭，一边带着国旗走向 Puricelli 团队向他们祝贺。我们进去时候唱着我们的口号，他们向我们鼓掌。所以说他是老大。他一直都是老大。不管是胜利的时候还



是失败的时候，他都是老大，但尤其是失败的时候。”

Salivni那时被任命为内务秘书，Néstor为财务司长。他在省内的14个村镇各开立了一个财务办事处，把这用为政治线的平台，还把协会的成员安置进去。Puricelli把他赶走了。

于是他们决定全身心致力于Néstor竞选市长工作，Salvini回忆说：“他们两个开始非常高强度的工作，走访了很多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从失败中而来。但Néstor和Cristina身上一直发散着一种能量。在那个竞选中，先是Néstor成功竞选为市长，然后他将我们几个和Cristina任命为省议员。我记得Néstor在竞选中没有用他的肖像做海报。那是个很不一样的竞选。”

“是个很棒的竞选团队”，Cristina说，“竞选工作持续了一年，没有Néstor的照片。我们做了干胶片，然后贴在家门口好像门牌号一样。上面写“Kirhner”，下面是“市长”。就这样，简洁。然后我们就去贴，我们所有成员，挨家挨户地去贴。”

在1988年，Cristina戒烟。艾丽西娅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Néstor每天抽3包烟，他已经手指发黄，嗓子嘶哑。后来，他曾经有次说过他一生中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抽了太多烟。Cristina记得在那些年，Domingo Cavallo(当时梅内姆时期的经济部长，多明哥·卡瓦诺)和所有团队人员到圣达克鲁斯，为了签订几个协议。那是在Obispado接待他们，那幅画面很清晰，麦克风里不时传来声音说“请大家熄灭所有的烟”。在那场景里，Néstor省长，被烟雾缭绕，在一根接一根地抽。

1987年的12月31日晚上12点，Julio De Vido决定戒烟，Cristina受此触动，她觉得这个主意很好，然后等到了第二年同一天的同一时间，成功了。

在1989年，她被选为省议员。关于这点，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她说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总统的连任大选，她说得更详尽些：“我从来也没想成为候选人，从来没有。既没有想过当总统，也没有想过当参议员、省众议员。他们总是得说服我。那时我们已经是圣达克鲁斯胜利阵线，我坚持加上“圣达克鲁斯”，我想要更具体一些。那次，我拒绝成为胜利阵线的省议员候选人。“不，不，他们会说我是市长的女人的”我反复地说。所有人都记得，那不久后有一部Isabel Sarli（阿根廷女演员，伊莎贝尔·莎露妮）演的电影叫《市长的女人》，你以为？看看人们是如何消遣我的……”

## 他是省长，她是议员

在1991年，竞选活动落幕，Néstor即将上任为省长。Salvini记得竞选离奇的落幕方式，两辆雷诺12迷失在荒漠里，被火山灰掩盖。

他们在Los Antiguos(地名)办完一个活动后，从那里出发，向下走70公里的断砖残瓦路去参加晚上8点在Perito Moreno(地名)的另一个活动。然后成行前往Pico Truncado，计划在那里过夜。但在路上，刚过Las Heras，他们被告知智利Hudson火山喷发。喷到Los Antiguos的高度，就是他们刚过来的地方。

那是个和煦阳光照耀的日子，两辆雷诺12上的随行人员继续前行去往Puerto Deseado。但是，当它们要进入3号高速公路，离目的地还有百来公里的时候，它们突然碰撞到了无法描述的景象。随着火山喷发而来的是闪电暴风雨，瓢泼大雨和大量火山喷发的物质喷向大气层。火山球升到8000米，在最高层被球形的巨大云块赶走，还

在放电。

大风席卷所有。

开向3号高速公路的两辆车上的人眼看着白天变成了黑夜，被困在这和着灰土的疾风里。这不到100公里的路，他们开了5个小时。当他们抵达 Puerto Deseado，天气变得更糟糕了。在那里，他们停留了2天，关在酒店的房间里，等着风变小一点。在同一个酒店，还入住了这次竞选中激进党的人，也和他们一样，成为了风的人质。

Salvini说：“我们和激进党的人打了两天的牌，打‘摸三张’。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也就只能为市政府成员和众议员们打‘摸三张’。过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我们看见了太阳。那些激进党的人比我们起得早，已经先行离开了。我们上路，看见这奇怪的景象，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刚走了几公里，火山风又回来了。在高速上看这种景象是你一辈子也抹不去的记忆。我们两辆车走丢了，分开了。我们往回走，但是车很难启动。我们就靠着地面上的交通符号和油漆来指路。7点我们才到了Caleta Olivia。那里Néstor和Varizat已经到了，他们用一架直升飞机和一架小飞机在找我们。后来我们听说，那辆先我们出发的激进党人在高速路上被一辆大卡车撞了。”

在1991年12月10日，Néstor Kirchner上任为圣达克鲁斯的省长。这一天，是Cristina生命里最激动的一天，因这取得的政治成果。他在1976年时就说过，当他们逃离拉普拉塔的时候，就说过他将会成为省长。当时就像是不可能的承诺。

Cristina那时是众议员，她的演说术引起很多的关注。她从来不读演讲稿，她把自己很多观点安置在那些信息里。Icazuriaga当时就坐在她的旁边，是那个集体的主席，他说Néstor和Cristina强加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那些会议在周四的14点，而在早上10点整就开始了小集体的会议。他们讨论所有的话题，那些最棘手的话题Cristina在休息室思考。他还说：“你把最烦人的事务扔给她，而她会用这个给你变魔术。”

他们两人的高强度工作，是生活中不同阶段靠近他们的人都记得的一个标识，就好像一种政治风格或者一个必备条件。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好牺牲自己私人时间的准备，是没法跟他们共事的，因为根本没有闲暇时间。

当时在国家上，梅内姆政府常去的地方是高尔夫球场或者网球场，当那些宫廷的侍从在玩任何体育项目都故意让他赢的时候，当政治视频涌现成为新自由主义沟通方式的时候，而在阿根廷南部的一个小岛上，在这里，贝隆主义从未被打败，在这里，多位领导人之间经常争辩，严谨工作。

这种政治态度触碰Néstor和Cristina的底线。他们自己每天晚上都学习。Néstor曾说从一杯鸡尾酒到另一杯鸡尾酒是无法统治一个国家的。作为省长，他开始学习经济学。他说有了贸易，财政盈余才是争夺实权的钥匙。他动员自己的组织成员在经济面前捍卫政治的角色。因此，只有当领导人去学习，只有当他们有能力去理解和控制他们自己经营内的经济景象时，一切才有可能。

Néstor反感很多的省长、市长和地方官员。从一个村镇到另外一个村镇的巡视，但是他不不确定这些人是否都理解那些他们应该理解的

东西。对于他想讨论的话题，他们都不在足够的高度上。因为这些讨论，只有在另一方交谈者也是充分准备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

关于各种问题，在每天早上的小圆桌会议上都会被热烈地讨论，无一例外。每天上午11点，省长先生从政府大楼准时出来，然后到圣达克鲁斯酒店，在那里会有 Zannini、Icazurriaga、Vazquez 在等他，有时候还包括 Cristina。Néstor 因为抽烟太多，手指已经变黄。他被给予一个昵称是“捣蛋鬼”，不仅仅是因为他经常在讨论时讲笑话打岔，也因为他每次都迫不及待地要解开任何疑问：会很频繁地在凌晨收到他的电话，然后当事情不像他预期的那样发展时，他们就领教了什么是“暴脾气”。

无论是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家，还是这些早咖啡会议时，他都用 Bic 笔在一个笔记本上做记录，筹划宪法的改革以便能再次获选。

Cristina，另一方面，深谙每一个她工作的主题。她不喜欢梗概，更确切地说，她厌恶。她曾说那些梗概会产生不恰当，总是会要求很多需要阅读的原材料，很多。顾问们准备的材料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嫌太贫瘠了。她喜欢在所有的辩论中，做最后的总结，也正因为此，她得比任何对手更消息灵通。他们俩的这种工作风格，在履行责任中不断地工作，使他们禁绝了家庭晚宴，空闲时间，周末。

Kirchner 上任省长之初，这个省是负债的。在这里，很多学校没有粉笔，很多医院都没有医用纱布。他上任后第一件事情是颁布了非常不受欢迎的 309 法令。内容是降低员工工资 10% 到 15%。这是第一个决定。“我们得真诚地向老百姓交代现在的情形，我们不能天天围绕着无法履行的事情而争论。要么人们理解我们，要么我们离开。”这就是 Néstor 的底线。6 个月后开始用 5 次分期付款归还之前

为了治理这个省抽取的部分，并且额外地加了一期做为利息，在这之后，人们对他的拥护提升了70%。

与此同时，阿根廷被另外一个贝隆党员统治，不得人心，政治上失去威望，最后人们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下台。

那时候Néstor用一本艺术笔记本记下那些数字，并在那里算账。他这一生都有这个习惯，在玫瑰宫时候也是如此。很多个笔记本都像这本一样，画满了数字和圆珠笔的箭头。在其中一本里，他用bic笔开始勾画一个方案，就是圣达克鲁斯如何才能做到像Salta(萨尔塔)省那样：向中央政府要求因为他们省的油气资源而对应应得的部分。他提起了诉讼官司，并且赢了。这个官司使9个省获利，都受到了政府的拨款，但Néstor是这些省长里唯一一个决定不花费这部分资金的，他储蓄用来作为对抗经济周期化的基金。在那些年，这圣达克鲁斯的6.3亿美金经常被谈到，因为他从来没有像其他省份那样，把这些钱用到经常性花销里。

在很多年后，在他进入玫瑰宫后，也是使用像这样的一个笔记本，他出示给Hugo Moyano(阿根廷工会头领)，向他解释消除债务的计划。Moyano描述他对Néstor说可以，似乎对他说“行，兄弟，去试试看吧，我们支持你”。但是谁又会想到，这个把国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摆脱债务的计划，不是由硕士学位的经济学家撰写于计划书里，而是由一位“企鹅”省长在一个美术笔记本上潦草地图画的呢。

当Néstor为省长，Cristina为他的法律及技术秘书，当那些孩子慢慢长大，当他们都到了30来岁时，他在圣达克鲁斯的威望越加稳固。不是没有强大的阻力，甚至在贝隆党内部也有，其中一个首要的



反对者是Rafael Flores，另外一个la FURN(大学生民族革命联盟)的前成员。在这个国家走向毁灭之际，那个多风的，家家户户分散开的小岛越来越边缘化，几乎隐形了。

那时已经有了革新的贝隆主义，带头的是Antonio Cafiero还有Néstor、Cristina也参加其中。Puricelli和Flores，还有其他贝隆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也在其中。唯一支持梅内姆(阿根廷前总统)的是Ricardo Del Val，Kirchner之前的一任省长。在89年前，他们和Cafiero(卡菲罗)一起反对梅内姆，但是失败了。

那些年对于是否停留在党内的问题再次成为话题。

一个由一些民族领导人组成的重要派别，Néstor和Cristina对其很多观点有共识，这个派别选择了抛弃党这条路。众所周知，Chacho Alvarez在初期运动中转向了其他分支。而Néstor和Cristina，和一个派别建立了卡拉法特集团，他们依旧和以往一样坚持认为争吵都只是党内的。“我是不会为了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而放弃我的党派的”。Cristina这么说。

“Néstor一直没有对Cavallo妥协。”Salvini说，“那些年的财政协定对那些省来说都太糟糕了。他们把学校、医院的费用都转嫁到省里来。而国家的资金永远不过来。Cavallo甚至说到“无法存活的省份”。YPF(阿根廷石油公司)的私有化使得成千的人失去工作，把属于我们的资源从我们手里夺走了。每个月看他们发工资都很艰难。Néstor推动的“保税区”引起巨大的讨论。他提议那些距离偏远的，自身条件不利的省份应该用比较性优势来补偿。试问如果没有赋税上的补偿，谁会到圣达克鲁斯来投资？但是出于梅内姆政府对Néstor的对抗的仇恨，法律条文就在口袋里，但是他们拒绝了，没有投票给“保税区”计划。这就好像是把我们将经济增长的唯一机会给扼杀了。



对梅内姆政府的对抗情绪持续升温。

在Parque Norte的国会议会上，有3千多人在场，Néstor请求发言。我们党派才7个人。他说了一段燃烧的演说，反对现有经济模型，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现场响起了雷鸣掌声。但是后来梅内姆到了，当时的国会总秘书Lorenzo Pepe说：“现在有请我们的总统先生来给这个活动致闭幕辞。”Néstor又要求发言，他们也不能拒绝他，他毕竟是个省长。他说：“总统先生，因为我不是一个虚伪的人。我想把在您到来10分钟之前的讲话再重申一遍，我想告诉您的真实想法。”然后又重新陈述了他对现有经济模型的反对。随后要对国家政府一次游行活动投赞成票，他们说：“为了一致性。”

Néstor举起手：“为了一致性那不是的，那我不投票”。

Cristina就在那些国会议员之间，她是在场陪着Néstor的那7个人中的一个。当她听见Néstor当着梅内姆的面重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当她看着他孤身一人，高傲而果敢地站在人群中，她大声说：

“这就是我嫁的男人！”

# 9

## 孩子，两段生产经历

1977年，Cristina说：“如果在我换尿布的时候，脐带掉下来了，我就去死算了。”

1984年，Cristina再次怀孕了，但是流产了。

1990年，Cristina当时是省议员，在预定剖腹产的前一天晚上12点她还在办公室里工作。之后和同事去一家餐厅吃饭，过了凌晨2点才躺下。几个小时之后，花儿就诞生了。

## 做母亲

在1977年的2月16号玛西莫出生了,再过3天就是Cristina24岁的生日。那一天,Néstor没有陪在身边。玛西莫是在拉普拉塔出生的,而他的父亲还在圣达克鲁斯。当我表现出惊讶时,因为从我读到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我告诉她我以为是两人一起过去的。Cristina打断我,另有所指地说:

“不,不,不。他怎么会在77年去拉普拉塔呢!77年?他当时名气比我大,会冒更大的风险,那时是不可能的。我的两次分娩的经历是非常不一样的。玛西莫的这次,是在拉普拉塔,非常害怕。因为我的医疗保险在那边,而Néstor不能过去陪我。当然不是因为他不想过来。这对两个人来说都很煎熬。”

那种害怕与没有丈夫陪伴的孤独应该在她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Cristina停止了讲述,呆了片刻,似乎在搜索记忆里的影像,当她回过来继续讲时,声音更柔和了。我向她靠近了一些,以便更清楚地看着她的脸。等了这么久,现在终于等到了这一刻,能如此近距离地看着她,真好。

有些许时刻,我知道她能讲给我这些事情,是因为她在这个南部的家里,就像她自己说的,这里是她在“世界上的归属”,也只有在这

里，她才能感到放松，她才能沉浸在那些艰难的回忆里，就如此时此刻，如此这般。她没有看我，而是看向一边，但是也没有聚焦在周遭任何地方。她开始描述玛西莫出生那段时期的场景。

“我是在那年的一月底来到拉普拉塔，离预产期非常接近了，我就是想等到最后的时刻。当我到那边的时候，就把自己锁在我妈妈的家里，也没有出门。我爸爸会来接我去看医生，然后再把我送回家。生玛西莫的那个晚上，整夜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使劲了3次，才出来。但是当时我好害怕呀，上帝呀，那样的害怕，双腿发抖。一直以来，我对身体上的疼痛都有着莫大的恐惧。然后就是产后恢复期。爸爸对我说：“Cristina，你只是生了一个孩子，并不是说一辆卡车从你身上压过。”

她也笑自己，笑自己的疑惧。而当她这么直接地跟我讲述玛西莫的分娩并不是很温馨的这一段时，我向Kirchner家的世界又靠近了一步，他们是那么喜欢拌嘴，相爱相杀，有些时刻又那么尖酸，那么直白。我听过无数的女性讲述自己分娩的过程，以及刚和宝贝在一起最初几天的时光，但是Cristina所讲都不是那种风格的。她的讲述带着一些幽默色彩，有时甚至是黑色幽默。

“我还记得那个脐带，太恶心了。当出院我们回到我妈妈家时，玛西莫的尿布都是我妹妹换的，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曾说：‘如果在我换尿布的时候，脐带掉下来了，我就去死算了。’因为得等它痊愈等等，很多枯燥的事情，但是我忍受不了。我对他有一种害怕，就是会害怕事情做不好。有一天下午，我妹妹去运动场，我一个人在家，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去换尿布的话，脐带一定会掉下来的。而当我不得不去换时，我的动作非常缓慢，非常慢，几乎一点也不碰到那个脐

带。而说什么来什么，当我妹妹回来后，我看着她换的时候脐带就掉了。吉泽尔至今还保留着。”

Daniel Filmus 曾经在做《南美洲的那些总统》专题系列时，采访过 Cristina，他曾对我说过在这个谈话的原始素材里面本来有个部分很有意思，但是他没有写出来，因为他觉得话题太私密了。“她对我谈到分娩时身体上的疼痛”，他说，吃惊于一个女性会去触碰这样的话题。而于我而言，这些边缘的女性话题非常吸引我。而现在，我就坐在 Cristina 的面前，她不但没有回避这个话题，反而把它打开，扩展。我理解这也是她对自己的一种探索。

她说，她对生理上痛苦的恐惧是“显著的”，“异常的”，“隔代遗传的”，她认为这是一种“平衡”。她说她可以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她个性坚强，也会在逆境中反击而且把困难化作动力，但却不能忍受生理上的痛苦。

她说在她这么多年的生命历程里，很多人都吃惊于她克服阻碍的能力，在国会里，她听了好多年人们针对她的辱骂、谎言、蠢话，但是她还能依旧出席各种公众场合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在她生命中的另外一些时刻，比如她的分娩，对这类生理疼痛的恐惧会让她跨不过去。

“我已经习惯了在极度压力的环境里却不失冷静。”她用一种克制的语调轻轻地说，慢慢地跳出每一个字眼，“我有很强的心理压力承受能力，但是很弱的忍受身体疼痛的能力。而现在面对着 Néstor 的离去，就更需要承压能力了。他是个暴脾气。从他去世起，就好像我又增强了这种对压力的承受能力。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从痛苦中走出来，但是谈何容易。现在我的平衡板上缺失了 Néstor，因为以前

总是可以像平衡木，一个人取，一个人充。但是现在都得我自己一个人去完成了。现在很多事情对我的影响是越来越小了，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大概我是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

她是在几天前发现这一点的，当时在Rio Gallegos(里奥加耶戈斯)，她在一个俱乐部参加落成典礼。她记起，几年前的同个位置，同个地方，在一个非常暴力的政治环境下，有几次她参与了，而如果是同样的情况放在现在她是不会卷入的。当时Néstor Kirchner和Arturo Puricelli在为贝隆正义党的不同思想潮流而起冲突，他们的妻子也一样。在这个俱乐部里有个大堂，Cristina就利用那个场地发表讲话。那时，她的头发很长，绑了一个马尾辫。Puricelli的跟随者，毫不夸张地讲，就去抓她的一绺头发，在场上制造了一片混乱，有尖叫，推搡，揪头发。另一边阵营的主要领队就是Puricelli的第一任妻子，Rita Molina，现在就是那起Noble Herrera案件的检察官。

在1984年，Cristina再次怀孕了，但是流产了，这件事情，在不久前的公开场合谈到过，当时在宣讲“禁烟法”。

“当我再次怀孕的时候，我就戒烟了，就像我在怀玛西莫期间做的一样。但是我开始大出血。他们让我静卧疗养，我也照做了。原因是胎位不正，我当时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意思。当Néstor得去出差的时候，他紧紧地抱着我。他经常出差，因为在各地开办了预备金的财务办事处。在孩子快6个月的时候，就发生了自然性流产，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那天，他留我一个人，我躺在床上，他向我告别。‘你还好吗？’他问我。‘是的，是的，我还好，你安心去工作吧。’我对他说。过了会，我就开始大出血。我起身去上洗手间，啊呀，太

可怕了，这种事情即使是对我最痛恨的敌人，我也不会诅咒发生在他身上。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感觉什么冻胶状的东西脱落了，全是血，我就开始尖叫。后来我住了3天院。他们给我打血清来保住孩子，但是一把血清撤走，就又开始大出血。而且身体上的疼痛是巨大的。在某个时刻，那些医生决定摘掉血清，因为不然会对我有生命危险。我终究没能保住孩子。

那是很困难的，也是因为我是高龄妊娠。如果发生在现在，或许就能做一些补救。前一段时间，我去 San Isidro 医院的新生儿室巡视，当我看见那些小小的宝贝，才600克的小孩，我就想起了我的宝贝。我对那位带我参观的医生说了我的这个事情，他说如果是在现在的话，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但当时非此时，当地非此地。

也许我的这个经历跟我对流产的态度有关，还与我是单身母亲未婚先孕的女儿这个身份有关。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跟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有关。这个失去了一个孩子的记忆对我的触动很大。但是我也不会给自己放上一个十字架，而应该尊重所有人的看法。

我不同意堕胎，但是我也不会说我就是对的。我只是说出了我的看法和感觉。我很反感在任何的讨论中，一方强制地把他的观点加诸在另一方的身上，尤其是那些跟道德观念相关的观点。

如果人们跑来跟我说地球是方的，那么，不对，很明显是不正确的。但是针对那些如此个人的话题……



我不认为应该给任何人打上烙印，因为烙印就是废止。

强加任何的唯一的准则都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态度。

所有倾向于禁绝不同观点的行为，我都会抵制。

因为如果这样，就不会留下讨论者。

不管对手有多凶残，也请他留下来，拜托。”

1990年7月6日，花儿出生在圣达克鲁斯。那时Néstor是市长，Cristina已经37岁了，还是像第一次那么的害怕。她为自己的年纪，也为小孩的健康而担心。但是这种担惊受怕并没有改变她疯狂工作的节奏。她当时是省议员，在预定剖腹产的前一天晚上12点她还在办公室里工作。之后和同事去一家餐厅吃饭，过了凌晨2点才躺下。几个小时之后，花儿就诞生了。

“我那时和另外一个议员特里萨(Teresa Soto)呆到很晚，”她说，“我们在凌晨的时候告别。而当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当她再来诊所看望我的时候，我至今还记得特里萨的表情。不仅因为我已经生下了花儿，而且我还化了精致的妆容，头上戴了一个白色的头髻。小孩完美地诞生。虽然那个晚上有些难忍的疼痛，而且在刚剖腹产之后是不该说话的，但是我对于这规定……反正我和Teresa两个人谈了一个下午。”

当花儿1岁半的时候，她的父母就搬到省长府邸去住。Cristina的妹妹吉泽尔曾说她的侄女是一个“幸福宝贝”。

“花儿真是一个公主。而相反玛西莫是个会给你很多压力的孩子，他以前还会呕吐。”她突然说。

“是故意吐的吗？”

“是的，先生。”她哈哈大笑着说道，“玛西莫是非常爱操纵的。你知道他干过什么吗？当他愤怒的时候，就用肚子使劲，从这往下，满脸通红，然后噗”她做了一个抛的姿势，“油条就像软水管一样吐出来了，非常恶心。”她继续说，我想她是知道我要写这一段，而且玛西莫将来也会读到，还会非常享受她的指责，这种坦白与口供不过是他们家庭玩笑的一部分，这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互相开涮。就在刚才玛西莫还给她打电话让她不要对我说谎，而现在她就在报复他了。“当他长大一点的时候，戴着斜视眼镜。他生气的时候，就会把眼镜扔到地上，然后踩。应该有踩坏了30、40副眼镜。”

“哎呀，真是难带的孩子呀。”

“非常难。如今当Racing队输球时，他还会非常生气，但是现在已经不会再摔遥控器了。”她又笑了，讲得津津有味，很高兴。

Cristina说和婆婆、艾丽西娅住在一起，那些孩子们都围绕在家人身边。他们俩除了政治之外的时间，都留给孩子们。但是对于自己的多次缺席，还是会感到内疚。

她谈到爱，谈到Néstor和花儿之间一直拥有的那种纽带：

“Néstor非常爱他们两个，非常浓烈的爱。玛西莫是他选择的一个谈话对象，也很尊重他。他很有兴趣去听取他的观点，会把他的意见放心上。和花儿呢…我曾想要女儿爱他更多一点。不对吗？我就

对他说，‘Néstor，让女儿爱你是很重要，但是让世人爱她也很重要。如果你这么娇惯地宠溺着她，那么将来这个世上就会只有我们两个人爱她，我们两个人而已。’但是对他来说…花儿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

Néstor最后一次见他女儿是在纽约。花儿在那边留学生活，专业是电影，就在这个时候曝光了很多他们的照片。花儿不得不在她父亲的执政期间，出面讲话，她博客被置顶，引起围观。后来她变得低调，就像她哥哥一样，还是选择住在南部，避开公众的曝光。

花儿是离开祖国去学习她所喜欢的东西，同时也是寻求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但是Cristina说在那次在纽约最后的会面中，Néstor“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后来我回过头想，可能是跟他的预感有关。

在纽约，Néstor组织了拍摄，这是很反常的。他安排了总统府的摄像师组，来拍他和花儿在纽约散步的场景。当时都没人敢相信，因为Néstor最讨厌摄像机拍他了。

“他很担心花儿。那一次我们两个人给她施加很多压力，坚持让她回来。Néstor对她说，‘回来跟我们在一起’，她说‘不’。然后他对我说，‘那我也照样要带她回来’，我们发生了很激烈的争执。如果她想留下来，这是她的决定。她最终还是留在那里了，但是状态很不好，他是对的，至今她依旧感觉很糟糕。花儿天天都跑去看他，他陪她出来一直到四季酒店的大门口，当她走远后，还在挥手告别。他对这个女儿很感性，做这么些奇怪的举动…

当她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保密工作，我们不希望她被打扰到。然后他做什么了？他带着随行人员带她去吃饭，这下好了，把一切都毁了。摄像机都围过来了，媒体上出来了一堆照片。我是

那么愤怒……我对着他大吼。通常情况下，他都会吵回来，而这次没有。他向我道歉，他很后悔让她曝光了，这可是他的女儿呀。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她。而她后来也告诉我从那之后她一直都感觉很糟糕，直到我打电话告诉她他去世的消息。”

花儿这几个月让她母亲很吃惊。她说了很多话，是从一个很多的观察者角度说的。“你知道你和爸爸之间的最大的差别吗？爸爸从来不允许分心”，她对她说，而这句话一直在Cristina大脑里回响，好像知道了一个从来没有总结过的真理。Néstor对所有问题都像着魔了一样，在没有找到解决方案前都不会扔下它。而Cristina是可以同时进行很多事情的。

“我可以在一个全体大会之后，去办公室，开几个会。回到家后，我可能会换一下家具的位置，还会注意下家里是不是缺鲜花了。我可以从政治上的事情一下子就跳跃到学校的事情上来。我们女人都是这样的，这些事总得有人去做。他是不管这些的。有几次我对他说，他让我想到了爱因斯坦，因为我曾经读到有篇文章上说，爱因斯坦有10条一模一样的领带，就是为了不用分心去想该戴哪一条。而Néstor就是这样的。所有会让他分心的，让他转移注意力的事情，都会让他厌烦。”她说，然后笑了，“而如果你烦到他了，他会没有顾虑地直截了当地告诉你。”

当谈到孩子们时候，Cristina不仅仅是一个寡妇，除了寡妇身份之外，在内心深处，她还是两个失去父亲了的孩子的母亲。这种痛苦转移而且叠加，像鞭打。她说得非常轻，非常慢。她说当孩子父亲去世后，花儿在她面前表现出了和Néstor以前一直看见的和描述的那

样,坚强而温暖。“他比我更了解她,他对她认识更深刻,在很多方面,我到现在才开始慢慢理解她。就好像是说,我现在也能像她父亲看她的那样去看她”。

# 10

## 家庭生活是一个避难所

Cristina 让自己适应家庭生活，甚至连她婆婆的炖菜她都照学得一模一样，这是她亲近婆婆的一种方式，去模仿她。

Cristina 在分娩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化妆。当她在圣马丁街上撞车时，她的右颧骨被折断了，而她大叫着要一面镜子来照。

## 姐姐与弟妹

Cristina 承认，也坚信，如果没有她的婆婆 Maria Ostotic 和她的艾丽西娅姐姐的帮助，她都没法抚养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女人，是她生活里的情感支柱。

艾丽西娅那边也肯定，她的母亲在那些年，为了让他们能专心投身政治事业，起到了关键作用。日常生活中很多安排都会求助于她。艾丽西娅的女儿 Romina 和 Natalia，她们和玛西莫就像是兄弟姐妹一起长大，一起吃，玩，睡在奶奶家。当这些孩子都长大了，花儿的到来，根据艾丽西娅回忆，是“一件莫大的幸福”。

艾丽西娅和 Cristina 在过去的 35 年时间里，无论是家庭还是政治都是相伴度过的。从 1980 年开始，在胡安·多明哥·贝隆协会，他们开始了从政，为了更好地工作，也为了把各自的家庭生活往前推进，她们用了氏族生活方式，而氏族的中心是 Néstor 和艾丽西娅的母亲。这对姑母和弟媳总是能互相理解。

在 Cristina 登基的时候，当她们这种紧密的纽带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时候，我以为她们只是姑母弟媳关系，但我不知道她们还同时是朋友，同事，在很多时候还是同伙。我没有遗漏那个画面，新上任的女总统在宣誓时给这位社会保障部部长的拥抱。

在这之前，Cristina 一直都对这关系很谨慎。她那天穿着带有花



边的白色裙子，容光焕发，总统的条带斜挂胸前。她来到国会做登基演讲。她像她以前所有的其他演讲一样，不读讲稿，目光从国会的一边看向另外一边。

当她来到玫瑰宫的白厅(SALON BLANCO)，在整个典礼中都保持着感动的眼神，眉心微皱像是在克制着哭泣，当Néstor开玩笑地将总统手杖交给他的妻子时，她也没笑。但是在这个典礼里，当她初次作为总统的身份登台时，当她这种坚定庄重的态度让人留下印象深刻时，她情绪的堤坝在拥抱艾丽西娅时突然崩塌了。

她们两个都不是会放任自己情感爆发的人。她们俩都没想过在公众场合释放自己最深处的情感。但是，在这个Cristina抱着艾丽西娅，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的时刻，也是她唯一大哭的时刻。

对于Cristina来说，在刚开始，艾丽西娅是她进入Néstor家族世界的门厅。在Néstor认识Cristina几个月之后，他给姐姐打电话。艾丽西娅那时住在Rio Gallegos，之前已经在拉普拉塔完成了社会保障专业，并且于1970年获得文凭。

那个电话里夹杂着紧张与快乐。Néstor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她，自己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在考虑跟她结婚。

艾丽西娅那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她的女儿Natalia还是一个婴儿。但是她一直跟这个弟弟有着非常紧密而深厚的感情。他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互相支持。在政治上，他们彼此理解，对于两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深厚的理解。但同样在家庭问题上也是，包括这些在时间长流中带有标志性的事情。在Néstor去世后，艾丽西娅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谈到Néstor，她说她看上的第一双高跟鞋，她很喜欢，觉得是成年的标志，而她的父母迟迟没给她买，Néstor就用自己的积

蓄买了送给她。

那个下午的这通拉普拉塔打来的电话，在艾丽西娅看来，是一份邀请，邀请她去认识这位让 Néstor 陷入爱河，并且这么快想要结婚的女孩。或者，更加具体地说，是一通“带丑媳妇见公婆”的电话。所以她就带她的幼女去了拉普拉塔。

Kirchner 家族一直是这种部落氏族的生活方式，后来也继续这样。“他把她带来介绍给我认识”，艾丽西娅说，用这个句法展示了他们之间关系的第一个镜头。她说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拉普拉塔餐馆，依旧还记得，那时 Cristina 穿着极美的修长女衫，两边袖子上有荷叶边饰。

她也记得那顿晚餐，她那还没学会走路的幼女，一直在哭。她和 Cristina 一直逗她开心，直到把她哄睡着了，才开始交谈，一直谈到了凌晨。

“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很瘦，很健谈，给我印象深刻，我们一见如故。”艾丽西娅喝着社会保障部送来的牛奶咖啡，微笑着说。她的这个部，从地理位置和建筑特点上可以看到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最显眼的建筑，就横置于七九大道。

在90年代，这个建筑差点就被摧毁了。这也是国家所有部里面最乱的一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带着急诊室的公立医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排队等在过道上，或者挡着门口。

当 Néstor 任命她这个职位时，立即激起了媒体企图，用了“裙带关系”，“任人唯亲”那个词，但是艾丽西娅过去的履历让这企图不攻而破。她不仅专业对口，而且在圣达克鲁斯省有多年的优秀工作表现。她除了是 Néstor 的姐姐和 Cristina 的姑母外，还是胡安·多明哥·贝隆协会的组织成员。

艾丽西娅有一些严厉呆板，她不会像很多政客那样，和形象顾问去练习如何给人留下敏捷利落的形象。她致力于其他的事情。她有的就是不停歇地勤勤恳恳地工作，在那些社会保障工作进行的每一步中积极参与。她在很多方面非常像Néstor，加之她的严格，不苟言笑，使得她与Cristina的女性气质形象相去甚远。但是其实她们俩经常有很多深厚的关联，还有就是她们共同深爱着Néstor。

艾丽西娅在讲述她如何认识她弟妹时所说的“缘分”其实是一种预感。艾丽西娅当时就很确信她的兄弟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女人，就好像是一见钟情。看着他们俩在一起，听着他们如何对话，如何插话，感受着他们之间的舒适状态，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相处之道。她觉得这个女孩是“很有教养”，她再看弟弟是陷入爱河了。

当她回到Rio Gallegos，她做了她知道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是Néstor让她去拉普拉塔的目的。她得把Cristina讲给父母知道，好让他们准备好闪婚的消息。所以，当她一回去，就去父母家看望，父母都在等她汇报。艾丽西娅选择了最确切的一个句式说：

“她是理想的女人。”她对他们说，他们也就都同意了。

在Néstor和Cristina的婚礼上，父母们都飞过去了。Néstor的父母去认识这位女朋友，马上就是儿媳妇了。

时间过得飞快，他们也没问很多的问题。1974年的5月9日，在公牛市Cristina小姨的家里，两对家长参加了，面对子女的匆忙决定还有些惊慌。艾丽西娅和Néstor的父母回到Rio Gallegos一直说一切都非常“美好”。他们为Néstor的选择感到高兴。

在1976年政变以后，这对小夫妻着陆南部。第一个住的地方是艾丽西娅和Néstor父母的家，这个家他们的母亲至今还住着。这是一

个简朴的大别墅，她最喜爱的是围着房子的花园，种满了红醋栗、白柳树和忍冬树。Néstor和艾丽西娅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向Kirchner奶奶讨要着忍冬树果。

住了不久后，Néstor和Cristina搬到了两条街以外5月25号街道156号一个带有“历史感”的小别墅，就是像那里人说的殖民时期用胶合板和金属盖的房子。这是Néstor父亲的房子，他们在那里住了很多年。在这个房子的前厅，他们开办了律师事务所。在这同一个房子，现在是艾丽西娅住在这里。

就好像一切都兜了个圈。

就好像一切都转了个弯。

在Cristina和Néstor在南部居住的最先几年里，艾丽西娅是看着他们俩家庭生活发展的目击证人，在那困难的时期，他们不久之后就做了玛西莫的父母。

家庭生活是一个避难所。Cristina让自己适应家庭生活，甚至连她婆婆的炖菜她都照学得一模一样，这是艾丽西娅一直学不会的菜，是用切得特别细的肉和蔬菜来做的。这是靠近她婆婆的一种方式：模仿她，从她身上学习东西。

另外一个风靡一时的菜是vitel tone，在所有的节日中都备受期待。毫无例外的，这些节日Kirchner姐弟也都一起度过。艾丽西娅在年末的时候干活比较多，当他们做烤肉的时候。在圣诞节，在这桌上，总是会有火鸡，沙拉，还有与之很相配的Cristina的vitel tone。在这

些节日里，总会有很多孩子、圣诞树、整理得井井有条的饭桌。玛西莫每次看见圣诞老人都会害怕地哭。圣诞老人是卡洛斯 Mayans 扮的，他是 Néstor 的表哥，在 Néstor 去世后的两个礼拜他也离世了。“我只要礼物！”玛西莫说，转着圈子，要求圣诞老人立刻离开。

在 Cristina 完成法律课程之前，当她不得不离开拉普拉塔的时候还差3门功课，她是她和 Néstor 合开的律师事务所的代诉人。她时不时地就得去离他们家几个街区的法院。艾丽西娅教她开她父亲的旧车雪铁龙，大家都用那辆车。过不久，Cristina 在倒车的时候把电线杆给撞了。Néstor 对艾丽西娅说：“你怎么会想到要去教她开这个？”

这么多年来，家庭生活成了政治生涯的支柱和栖息地。艾丽西娅对待政治的态度和 Néstor 和 Cristina 一样严肃。“这是我们之间的承诺，彼此许诺，所思所想”，她说。她这么说是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她理解当一个党员同时又是一个母亲的压力，她也知道他们是如何试图弥补那些投身政治而从家庭生活中抽掉的时间。艾丽西娅认为南部的生活习惯对此有帮助，因为在这么多年来，在她和 Cristina 抚养了他们的孩子的年份里，全家人都会聚在一起吃午餐。家庭生活是他们空闲时间里最喜爱的选择，他们把家庭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能有这种和谐也是因为 Néstor 和艾丽西娅的父母一直都陪伴他们身边。

就像他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何那么快结婚，也没有提过其他的问题，但是他们知道要怎么去做去保护这些年轻人。这个家被突袭搜查过两次，但是从来也没有被找到任何和政治有关的东西。这都是玛利亚(Maria Ostoic)的功劳。“妈妈总是会让我的书不翼而飞，因为她

不知道会受哪些书的牵连，于是就干脆把所有书都烧掉了”，她说。

艾丽西娅不记得起初 Cristina 很难适应南部气候的事情了。她摇头说。“不，她爱 Rio Gallegos，她在那里非常快乐”，她肯定地说。有几年，艾丽西娅住在离 Rio Gallegos 380 公里外的 Rio Turbio。律所所有些从那边来的案子，而艾丽西娅的家就是当时的基地。

在 1981 年，她决定回到 Rio Gallegos 生活，因为胡安·多明哥·贝隆协会正在创立，艾丽西娅想回去和 Néstor，和 Cristina 一起从事政治。Néstor 的母亲又变成了一个支柱。当艾丽西娅或者 Cristina 因为工作和政治上的事情而无法照顾家庭时，她就去接替。在这一年，Néstor 的父亲去世，而这个儿子承担了新的角色。

“我们总是在一起，去任何地方都一起去。”艾丽西娅说，“和孩子们一起，和妈妈一起。Néstor 也总会陪着我。对他来说，平衡家庭和事业不是很困难，他能做到，对他，对我们来说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喜欢分享所有事情。我们互相保护，互相支持。我们协会刚开始时候，我们开在 Alcorta 街。我们那时人很少，好像就是 15、16 人。我们带了很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同学去听讲座，来聊天。社会政治是协会里讨论的问题。当我们人满的时候，当来了 50、60 个人的时候，我们是那么的高兴。”她肯定地说，依旧这么节制有分寸，她使我思考激情的不同方式。艾丽西娅不符合那种我们常见的那种有激情的人士。在她身上，可能传达的是“企鹅”激情的独特方式：因其性格内向和小心谨慎，会看起来很冷，但其实不是。这份“企鹅”的激情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火红炽热，但是它在逆境里盛开，而在满负荷的工作中正常进行。



在这个时期，这些组织成员最常去的地方是El Palenque餐馆，Nipur咖啡厅。尤其是Caravelle酒吧，那是个二层的房子，协会里的人经常在楼上集合。当Néstor赢得市长竞选时候，就是在那里庆祝的。当时没有电脑，他们知道自己胜利了，是因为激进派的候选人Roberto Lopez去向Néstor打招呼。他们以111票险胜。

1987年的这一天，当看到Lopez过来，艾丽西娅不再紧张了。她本来那么紧张，在这个街区转悠，转来转去，因为如果她走进去，她怕自己被焦虑杀死。她钻进她的车里，然后带着一个邻居在这个街区开始打转，直到在一个圈时，看着Lopez走进去，她就明白了。

那样的不可思议，他们获胜了。这是所有人的一个胜利，是那最初15人的一个胜利。Cristina、艾丽西娅、卡洛斯Zannini，和Liti Mondelo策划了这个竞选。艾丽西娅和Cristina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而其他人在Rio Gallegos配合。“毫无疑问，所有工作都像手工艺一样。”艾丽西娅说。“手工艺”这个单词，就像立即被形容的那样，意味着除了他们和最亲近的那些党派成员外，没有其他人参与到这个竞选的内容上来。这么说是有很大的分量的。除了这些政客外没有任何人干预到整个内容上来。在本地，这意味着，他们不曾欣赏，未来也不赞同，国外通常雇佣的卖候选人就像卖酸奶一样的形象顾问。

当艾丽西娅谈到她的弟妹，对她来说，意味着生活中如此亲近的一个人，这让她难以聚焦。她们本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女人。可是，随着这么多年时间的推进，她们之间有了很多的共同之处。Néstor从



不干预她们的关系，她们总能彼此理解。

“当花儿出生时，带给这个家庭怎样的幸福呀。”艾丽西娅说，“在那么多年后一个宝贝的降临，真是一大幸事。几年后，当Cristina当上了众议员，得每个礼拜二到礼拜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差，我真是欣赏她……很多次她都带着花儿。你可以想像在这些旅途中她得照料多少事情，一个议员和一个小女孩。而当Cristina把孩子留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去那里照顾她。我看得出她内心在打架，你看我们女性都是纠结的。怎样的力量！只要是她自己能做的事情，她都不会委派出去。Cristina把她所剩的所有时间都给了她的孩子们，她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时间。我也是，有时候，也会有抱怨指责。当然，你也许不相信，但是，谁的孩子会从来不抱怨呢？我们习惯了氏族生活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女性有条件去投身于政治。”

在花儿出生那天，艾丽西娅记得的不仅仅是幸福喜悦。她还记得，Cristina在分娩后，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化妆。当她在圣马丁街上撞车时，她的右颞骨被折断了，而她大叫着要一面镜子来照。

“Cristina真的很会化妆”，艾丽西娅说，我看过她是怎么化的，很大的工作量，我就没有这份耐心。如果想要一直像她那样，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和自律的。我就没有，所以我不化妆。

然后就来到了执政时期，那个协会的15位成员都当上了政府官员。Cristina是司法技术秘书，艾丽西娅是社会保障局长。那时情况已经不一样了。Néstor在市长期间政绩突出，Kirchner这个姓氏已经在全省闻名，赢取的选票也比当时激动人心的111票要多得多。

“我们知道我们是会赢的。Néstor从那以后老穿着一件栗色皮大衣，那是他当时去投选票的时候穿的。而从第二个任期开始，我们就开始谈总统选举了，但是看起来还离我们很遥远。还差一些，但是也

我们想像的那么遥远。”

在Néstor的第一届省长执政中，她们都开始在政治上处理事务。90年代横在中间，那是非常孤独的时期。圣达克鲁斯省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只有一次，在1995年，一场暴雪下来，Rio Turbio与世隔绝，在中央政府帮助下派来的Hercules船驶进海岸。艾丽西娅回忆，在其他任何时候就再也没有了。梅内姆只在那里出现过一次，是在一个省政府建立的医院的落成典礼上，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张。

对于Néstor，艾丽西娅所做的是去回忆，但是还是不能谈到他的死亡，就像是一把匕首扎在胸口，还是疼。她宁可只在回忆中让他重现，她全部生活的历程里都有他。

“从小开始，从我记事开始，Néstor就是为政治而生的。这不是阶段性的，不是临时的，也不是顷刻的热情，那一直是他的目标。当2003年梅内姆连任，他对我说：“这一届我们进不去，但是2007年我会再去的”。他觉得失败了也没关系，这样会让以后选举中的人们记得他。他从来都不在意，不在意这次选举也不在意其他事情，也不在意来到一个地方，人数屈指可数。对此，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了。我们很多年的政治工作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展的，一个一个的去赢取他们的心。然后，就会出现惊喜。当梅内姆意外地下台后，我们互相对视，然后说，‘不，就是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在一个礼拜之内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还不相信Néstor会当总统。那段时间，我们那么忙碌……当他上任时，我毛遂自荐。就像是一阵的情绪向我袭来，我们从内心活在这种责任里，我们在内心里把自己许诺给了这个项目。在党派里，如果你不注入情感，那么那里什么都没有。”

当Cristina当任总统，任命艾丽西娅为她的部长后，她在艾丽西娅的肩膀上哭。艾丽西娅也被几分钟前Néstor和Cristina给她的拥抱感动。就在那里，她打开了内心一直关闭的堤坝。当她看见她的弟弟和弟妹紧紧拥抱，他们既是夫妻，又是同事，这一场景让她特别容易流泪。

“那天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我知道那背后的一切。”艾丽西娅说，“我哭得停不下来，你看，我其实对于哭…我一向都很克制，因为一个人得学着收起自己的感情。在政治运动中，你必须学会这一点。不是说我们铁石心肠，不是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你的敏感只能留在内心里，而不能表露在外面。你得去帮助其他人，你还得去让其他人坚强。然后，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放开自己，但是在公众场合，是不可以的。那一天，我控制不住了，因为这一切都太重了，太多了。

我的女儿们来了，我的妈妈也来了，站在玫瑰宫，是不可思议的体验。看着广场上的民众，哦，上帝呀，那是怎样的誓约。希望我们不会弄错，我对自己说，像是在祈祷，希望我们不会犯错。我对你说一点：推动阿根廷往前发展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说给人听的话。有多少次我们听人这么讲过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份至高无上的承诺。

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浪漫的事情。”





白厅，得名于原来的厅内装饰皆为白色。白厅是府内最重要的大厅，总统上任交接，政府部长就职宣誓，总统接见外国元首、大使等重要国事活动都在此厅举行。







总统权力交接时的手杖



Cristina 如今是奶奶了



玛西莫, 花儿, 儿媳, 孙子, Cristina  
(Cristina 如今是奶奶了)







Cristina 和艾丽西娅在一起的瞬间





七九大道是“七月九日大道”的简称，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街道，得名于阿根廷独立日，即1816年7月9日。它是世界上最宽的大道，世界上最美的大道，世界上交通最繁忙的大道，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道。

沿七九大道，自北向南有很多知名的建筑，法国大使馆、哥伦布剧院、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尖碑、共和国广场、与五月大道交汇处的堂吉诃德雕像、前交通部大楼以及宪法车站和宪法广场。等到夜晚来临，七九大道路上高大的灯杆，华灯四射，与大楼上流光溢彩的广告灯交相辉映，把整个马路照耀地如同梦幻般的美丽。

# 11

## 她是用爱在捣乱

有一天他们被邀请到 Kirchenr 家，去了很多人。带了几瓶葡萄酒，2公斤的冰淇淋。中午，开了两辆车过来，下车后他们感到很奇怪，里面很安静，也没有烤肉的炊烟。他们走进隐秘的花园看见了他们。Cristina 非常放松地躺在太师椅上，专注于一本书，而 Néstor 在花园另外一头读他的那本书，他们俩都忘记了有访客。



## 那些照片和效率

玛蒂娜是 Pompeya 印刷厂的艺术总监，她惦着脚尖滑行到她的上司 Liliana Mazure 站着的地方，从齿缝里跳出几个字：

“要么她，要么我。”

Liliana 看向那个画板，在那里 Cristina 还在用刀修修剪剪。

“她。” Liliana 回答道，“但是你最好冷静点，玛蒂娜。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Liliana 的“他们”指的是 Néstor 和 Cristina。那是在 1991 年，Cristina 在负责 Néstor 竞选圣达克鲁斯省长的参选活动。

在她卡拉法特的家里，Cristina 再次看了本书的框架。她指着一页上的一行字，用她闪着珍珠光泽的长指甲敲着那行字：

“是的，是的，一直是我负责他的竞选活动。”她边点头边笑着说，“谁会比我更了解他想要的是什么呢。”

对于 Liliana Mazure，在 1991 年的下午，她的艺术总监玛蒂娜爆发了，她一点也不吃惊。她们在准备竞选的宣传广告牌，那些牌子是正反两面的，只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印刷厂是在 Pompeya，在 Saenz 街上。在楼上的艺术部门，玛蒂娜工作的地方，Cristina 继续专心致志，靠近那画板，姿势不是很舒服，她的高跟鞋不能放在脚凳上。她的灰色剪裁的外套就挂在椅子上。她拿着一把剪刀在剪一张纸。

从Liliana和玛蒂娜站的地方，能看见她的长指甲上指甲油的反光。

玛蒂娜嘟囔着，在那里，就在Pomeya楼上，她们亲自制作的手稿。而后来就在这印刷厂发生了这滑稽的场景，她在那里用鞋匠刀、剪刀、图钉、记号笔工作。那时候还没有Photoshop。所有进入印刷厂的照片，打印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但问题是Néstor，他不让她们给他拍照。

技术上需要越好的照片越好处理。她们会在印刷厂的工作室给他们拍照，给他们上反光的妆，设置中性的背景，然后根据每个人的形象挑选得体的服装。这些都是技术上能做到的，但是因此也是必不可少的。和Néstor却是不可能的，他都不让他们见他，他断然地拒绝了为竞选拍照片，也不理论。只是躲避起来，派人说他有很多的工作，让她们就靠现有的素材自己处理，说他信任Cristina。

在那些天，Cristina每天准时地到Pomeya的二楼，就坐在玛蒂娜的身边。当她把带来的Néstor照片铺展开，Liliana和玛蒂娜面面相觑。这就是她所找到的，都是家庭或者朋友聚会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在工作室拍的。而他既不英俊也不上相，有好几张是侧面照，Cristina坚持说其中一张比另外一张要好。Liliana微笑。

Cristina的态度引起了Liliana和玛蒂娜的兴趣，当她离开后她们闲聊。从一开始她们认识她，就是看她无可挑剔地，自信地过来，对她自己的个人形象是完美主义者，这让她们费解。她怎么就不能说服她的丈夫在工作室拍一张简单的照片，这对所有的竞选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他就是这样的。”Cristina说完就没再说什么。她确信再坚持都是无用功，还是得用这现有的简陋的素材来做出最好的宣传照。

“他就是这样的。”Cristina今天说，以她温柔的离得远的方式。她谈起Néstor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面孔。当她刚认识他时候，她爱上这个灵活的脑子时，和那些她认同的思想，但是也有他们不一致的思想：她是完美无缺的，而他总是乱糟糟的，穿着苔藓绿色大衣，戴着厚重眼镜。他这一生都是那样，穿着皮便鞋，外套拉链开着，在礼节上穿着随便，没有花时间去顾及他的形象。当她谈到这一点滴事情时，当她这么描述他时，Cristina都是自豪的。她带着欣赏来谈这个男人，这个与她在这方面如此不同的男人，就好像对于这和其他人很容易沟通的属性的不在意，背后是对他的爱在支撑。

当Cristina谈到Néstor时，当她描述他时，当她在讲述自己的生活而无时无刻都会提到他时，Cristina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

在1991年，她来Pompeya不仅仅是来合作的，还是来控场的。如果玛蒂娜不理解文本的字号上升一个厘米，或者第五次、第六次地修改Néstor肖像画的巨大差距，Cristina就会一次次地坚持，只要她觉得有必要。

也没有人邀请她坐在那里，她就自己挨着玛蒂娜旁边的座位坐下。她拿着一把剪刀，当发现有什么可以改进的细节时，她就剪刻，然后重新粘贴，在那些原件上拆下来，装上去，玛蒂达被气恼得脸都红了。她觉得Cristina不是来检查工作的，而是来画板前代替她工作的。

Mazure笑着回忆着。因在这个场景里，她看见了一个在每个细节上捍卫丈夫的女人。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这些照片很糟糕，她也知



道他没有一个吸引人的形象。虽然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面对这么简陋的素材还提出非分的要求，但是Liliana看着她拿着鞋匠刀斗争的场面还是深受感动。

“她是用爱在工作，玛蒂娜。”

“她是用爱在捣乱。”玛蒂娜承认说，然后又继续回去工作。

Liliana曾经在内务肯工作过，在Oscar Parrilli竞选团队。在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里，时不时就会有这些“企鹅”来探望，很打动她，就像Cristina在印刷厂时一样。她认为在他们身上，能看到一些共同点——面对困境的耐力与坚持。当他们在农场工作时，需要适应那里的气候，他们每天都与疾风做斗争，他们知道如何在恶劣的环境里活动。

当Liliana第一次来到Rio Gallegos的时候，只想马上离开，她都没有办法忍受上街的感觉。他们去众议院，出来，他们去市政府，出来，去拐角的酒吧。Liliana自己问自己：“有这个必要吗？”她只想呆在任何有地热的地方，而不需要出去面对这可恶的风。但是所有其他人都适应了，Crisitna也是。疾风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身上都带了这样的特质。

疾风。

距离。

孤单。

在那些年，Liliana 出席圣达克鲁斯一条公路的落成典礼。那一幕镌刻在她的记忆里，因为在那里她发现 Néstor 可以舍弃很多东西，不仅仅是广告上的照片，还有公众。在那个公路的落成典礼里，有他、Cristina、她，还有其他3个人，总共就6个人。他们很细致地剪裁，就好像那里有很多的群众或者媒体曝光。但是什么人也没有，疾风带走一切。Liliana 有一些苦恼，Néstor 和 Cristina 却没有，他们为那条公路的落成感到很高兴。

在两次竞选后，Liliana 和她当时的同事们有几次去 Villa Gesell 避暑碰见了 Kirchenr 家的人。在那些烤肉时，经常成群而来，从不单独行动。Néstor 和 Cristina 都是氏族活动，和 Crisitna 的母亲，艾丽西娅和她的丈夫。他们来时都带了孩子们，他们很快打成了一片。谈话时一些人压过另外一些人，他们总是会谈到政治。

在 Villa Gesell 的 Liliana 家里吃了几次烤肉后，有一天他们被邀请到 Kirchenr 家，他们也去了很多人。那一天，他们带了几瓶葡萄酒，2公斤的冰淇淋。中午，开了两辆车过来，下车后他们感到很奇怪，里面很安静，也没有烤肉的炊烟。他们走进隐秘的花园看见了他们。Cristina 非常放松地躺在太师椅上，专注于一本书，而 Néstor 在花园另外一头读他的那本书，他们俩都忘记了有访客。Cristina 开始不停地道歉，而 Néstor 为自己东道主的糊涂而忍不住哈哈大笑，最后邀请所有人去一家烤肉馆吃。

那个 Cristina 坐在 Pompeya 印刷厂的画板前，顶替艺术总监，为给 Néstor 制作最好的广告牌而尽力的场景，已经提前地展示给

Liliana了他们是怎样的一对。她在公众场合和私下认识的一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取得了他们自有的运作机制,一对夫妻共同建筑了一个生活项目,包含了所有他们个人的方面。他们是彼此喜爱的对话者,也会毫不保留地表达他们的差异。

“这是我们在七十年代所想的。目标不仅仅是政治,也是个人生活的建设。我们想要成为独特的个体,去感知不同的事物,但不是按我们被教育着该如何去感知的方式”,Liliana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他们做到了,不仅仅是他们之间。Néstor是个很直白的人。在分开的时候,Néstor还批评了我当时的同事。他们之间并不熟悉,也没信任,但是他就是说出他的想法。

# 12

## Cristina: “这里不是兵营,而我也不是新兵”

Cristina开始抛出一串问题,而这家伙开始冒汗。有人向会议主持传纸条,上面写着:“让她闭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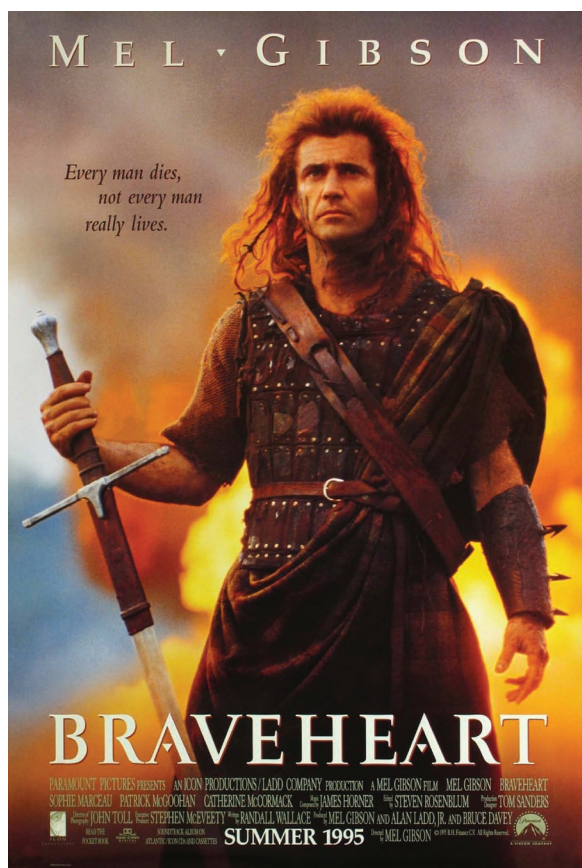
Carrio指着一本大部头的书给Cristina,对她说:“你得在这上面签字”。Cristina回答:“我是不会在任何我没有仔细阅读过的文件上签字的。”

## Fernandez 新兵

Diego Buranello 是政治活动家,任 Cristina Fernandez 1996 年至 2003 年国会议员期间的顾问。他讲述:

“我跟她讲电影《勇敢的心》,其实我对她讲过很多东西,但是这部片子是我记得最深刻的。跟 Cristina 共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在一开始就不能接受一整天都是马不停蹄的状态。Cristina 在工作的时候,不苟言笑,果断而专注,如果你不能跟上她的节奏,她很易怒。但她在心里有个表,也有团队精神,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松。所有时不时地就会有缓和的气氛。当我刚进入这个团队的时候,我像中邪似地工作,对她也有一些畏惧之心。因为她吩咐你做的事情或者她问的问题,都需要你有立刻的回应。她总是只对我说些必要的话,礼貌但是疏远。有一天,她把我叫到一边,然后问我:“你周末都干什么?有去电影院吗?”我回答说是,觉得有些奇怪。然后她问我去看了什么,我说《勇敢的心》。当她坐下来来让我给她讲讲的时候,我就完全地放松了。她很喜欢,至少是在那个时期,那种年代片。后来我就习惯了。在很多这种时候,在她需要加油充电的时候,她就谈论电影。

在 1995 年, Cristina 上任为圣达克鲁斯的国家参议员,当时她的形象,和 Néstor 时任省长的形象,在公众视线里是分开的、独立的。她,



《勇敢的心》是战争片，以13-14世纪英格兰的宫廷政治为背景，以战争为核心，讲述了苏格兰起义领袖与英格兰统治者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1995年5月该片在美国上映。1996年，该片在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奖项。



在国家层面还不为人所知。很快就有了她与梅内姆的碰撞,而且发生巨响,最后以她被驱逐出“贝隆正义党”阵营而告终。

“从年轻时候起,我就不是安生的人”Cristina在今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到。而也许,这个不安生的想法不仅和她在拉普拉塔大学的读书生活有关,也跟她在1995年后成为立法者的经历有关。

Augusto Alasino领导的官方集团和新上任的女参议员在很多对梅内姆政府来说很核心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比如在大陆冰川,航空私有化,财政协定II,劳工改革,尤其是最高法院重组,这个最后的冒犯,Alasino对她拍案训斥。

Cristina在媒体前声明:这里不是兵营,而我也不是新兵Fernandez。

在第二天,Clarín报纸的标题就为“Cristina: 议院不是一个兵营”。在她的办公室,她收到了这份报纸,然后告知她的两位顾问,Miguel Nunez(后来成为了她的发言人)和Diego Buranello。“你发现了吗?”她问Nunez。他俩拿着报纸看,她再问了一次:“你发现了吗?”他们没有注意到她注意的地方。“我现在是Cristina”,她笑着对他们说。“这里没说Cristina Kirchner也没说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我是Cristina”,她微笑着说完,然后回她办公室。这是第一次,她的名字出现在一份全国印刷的报纸的标题上。

“她是个能制造风波的人”,Buranello说。他是在1997年认识她的,那时他21岁,刚进入国会无偿工作。一位Cristina的顾问邀请他来观看参议院委员会的会议。Buranello在这之前听说过很多次Cristina在那些辩论中的表现,但是还从来没有在现场看过。在国会

的走道上有句传言，他不是唯一记得的人，重复说的是：“Alasino真想揍她一顿”。

当来到那天早上的会议，主持的是Chubut的参议员McCarthy，Buranello找到了他一直在找的东西：肾上腺素。那天是在讨论有关碳氢化合物的事情，在场的代表中有一些省份不是生产者。McCarthy得到总统的指令是不管怎么说都得让这个项目执行。

“对我来说，那个会议太不可思议了。”Buranello回忆道，“很有趣，我都无法相信，有5、6个人就那么干坐着，忍受着这个女人把他们都倒。她是很尖酸的，与她做对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他们都不能相信，因为很明显的，她不是用脏话来侮辱他们，而是用论据，而这是最让他们没办法的。他们本来有一个剧本台词，但是都没用了。比如她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不生产碳氢化合物的省份要待在这个委员会？圣达克鲁斯就从来没有要求过在国家谷物协会有一席之地，因为这样不合逻辑：我们不生产谷物。”而那些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说这就是政策之类的一些无聊的话。McCarthy的脸……这家伙不管怎么样都得完成这个项目，就像他们当时都习惯这么办事，但来了这么个女性，搅得鸡犬不宁。当场上气氛越来越紧张，我在想：这是我的菜，我要跟这位女性一起工作。

会议结束的时候，Buranello和邀请他的那位顾问在上电梯时，碰见了叫骂着过来的Cristina。她和大多数生产省份代表协商，但还是不能中止这个项目。在电梯里，她开始跟她的顾问讲话，被愤怒点燃，突然她看见了Buranello，然后问：“站在这里的这位是谁？”“这是我战争的洗礼。”Buranello笑着，数年后他为Néstor的总统竞选团队工作，至今还认为，在那间办公室，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有劣势，因为信任都寄托在那些南部来的人身上。Cristina拿这开涮：“你们相信国

家的政治先锋,而投票给 De la Rúa, 给 Fernandez Meijide, 给 Erman Gonzalez……”她对他说过,而他承认:“现在肯定还要加上马克里。”

在那时,Cristina和当权派的关系已经非常糟糕。在1996年的3月,参议院给了最高法院法官重组的半数通过:这是个关键的法案。Cristina在辩论中持反对方,就像念诵参议院的原文本:“8位立法者和他们的代表们。”挥动着说委员会得由立法者组成,而不是“被指定的人”。这种讲话方式如今已被熟悉,但是在当时,在国会里,还没有任何贝隆党里的人,会这种方式讲话。

她在那次辩论中说:

“尽管集团主席,集团里发言过的成员,所有我的党派,或者甚至可以说,所有正义党的表达,我依旧认为授权代表不尊重宪法第114条的精神。我们不能委任代表来参加最高法院。”

后来经过几次的延迟,在委员会之间来来回回,1997年12月10日,梅内姆政府获得了参议院原草案的通过。

## 冰,水

不久之后,国内又降临了另外一个关乎圣达克鲁斯切身利益的敏感论题:关于大陆冰川问题与智利的协议,最终在1998年年底通过。这是第一次媒体大规模报道Cristina,她对这个草案持有跟当权政府相反的观点,和Néstor一起,Buranello说“他们把这个话题扛在肩上”。他们两位在一整年走遍了国家,来做对这个官方草案的解释,认为这是相当于在战略上舍弃了一个自然资源:水。

那些联盟里的成员,知道政府是在接近智利,也想缓和智利的气

氛，支持了梅内姆和Frei采纳的“多角形”草案，在那里，阿根廷退让了领土的一半。这个论据是很难捍卫的，因为从各方面，各大媒体，都让这个“多角形”的草案看起来是和智利和平的代价。在这年中期，在关于冰川的全体会议，Cristina带Néstor到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会议现场，让他以圣达克鲁斯的省长身份讲话。

“他进去，打过招呼，然后就开始讲话。如果Cristina因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而让人尊敬，我都不用告诉你Néstor的风采”，Buranello说，他出席了那次会谈，“Néstor是绝对领导型的，这个在那时候就能嗅得出来。他说了很久，飞一般的快，说到凌晨。他感谢那些为“多角形”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解释他的立场不是说反对智利，他说他母亲就是智利人。他所陈述的是深层的问题，是捍卫领土策略。在那很久之前，在我认识Cristina之前，在我还在UCA念书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听大陆冰川的讲座。他们做了一系列的介绍性展示，用一个桶的模型来模拟冰，给了很多信息，解释他们为什么反对。在98年，Cristina奔走了很多大学，介绍那个话题。这一年，她出现在很多媒体上，包括在我家，家人都问我：“什么时候中止这个冰川的问题，要说什么呢？”看起来就像是一颗转瞬即逝的星星，但没有转瞬即逝的。

另外一个Cristina激起的政治风暴，使得她和当权派的关系最糟糕的是，她请求质询外交部长Oscar Cailion，公布阿根廷向厄瓜多尔出售武器的问题。执政党下达的指令是没有质询，而只是让Camilion在两院的防卫委员会中做澄清。

在那个闭门会议，Cristina让部长惊讶的是，直接要求他辞职，向他抛出了一连串的论据，说明此事的严重性。Camilion惊讶得目瞪口呆，回了句没有逻辑的话：

“参议员女士,您没有年纪资格也没有履历来要求我辞职。”部长说。

因为已经提到她有可能被驱逐,Cristina在出门的时候被媒体问过这个请Camilion辞职的相关后果,她说:

“这将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如果说在20世纪末了,还像贝隆时的运动一样,一个人会因为持有不同的政见或者对着一个有根据的事实持有不同的态度而被驱逐。因为这不仅仅是派别问题,还很过时。”

这一年Cristina从参议员席位辞去,成为圣达克鲁斯的国家议员。那时候还是个从南部省份过来的新帮伙的立法委员,但是在两年里已经表现了对贝隆主义政府纪律的不遵守。比如她对于最高法院法官重组的立场,对于所有那些问题的姿态。

在她陈述反对意见后几天,一个士官生带到议员办公室一封匿名信:说从当日起,Cristina在所有以下参加的委员会都不代表贝隆正义党:对外和文化关系,刑事和监狱政体,教育,家庭和未成年,区域经济,联邦税务共享,行政和市政事务。在那封信里,既没有提到“驱逐”,也没有签名。

Cristina那个时候说:“这是对圣达克鲁斯的一个惩罚。我是这个省的代表,也是正义党在这个省的代表。我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但是这是我的权利。我做的事情不是不守纪律,而是我永远也不会去遵守违法组织的纪律”。

## 违法和洗钱

在她的立法工作直到2005年，她被选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参议员。Cristina参加的其他委员会，那些遥远的回响至今还能听到，或者说是因为体现在她执政政府的立场上，或者还能看见有些人对她强忍着的不满。

另一方面，从第一层来说，在1999年主持的两院委员会对以色列使馆(1992年3月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遭到恐怖袭击)和AMIA(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犹太人互助协会Argentina Israelite Mutual Association简称。1994年发生爆炸，导致85人死亡)的刑事追踪；另一方面，她又是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第二副主席，是专门调查与议院有关的洗钱非法行为，当时的主席是Elisa Carrio。

关于对危害国家完全罪的调查，Buranello一直近距离追踪两院的工作，说他一直有一种感觉“所有事情都已经策划好了，不仅仅是在委员会内，而是从整体的政治上。有些时刻，有些调解就好像是故意要给他们调查的。Cristina在这个委员会的角色就是推动，制造混乱然后推动。我有个画面非常清晰：所有都是舞台布景，Cristina的工作就是吵闹的努力，持续的碰撞来拉扯这个舞台的幕布，就为了看看是否能看到一些真相。你记得Olmedo(阿根廷演员，奥尔梅多)在情景剧中推倒舞台的幕布吗？她就是Olmedo。”

这使人厌烦。她这种性格激怒了那些已经同意伪装的人。尤其是那些贝隆主义者，之前让她在这些委员会安身就是为了摆脱她。在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调查中，她一直询问，在所有人都要结案的时候



还要坚持。有一次都把一个警员弄哭了。

那时候,在 Galeano 法院,监听卡洛斯 Telleldin 电话录音的 66 盒磁带不翼而飞了。这是那个案件里不可思议的一个事件。两院的会议持续了一整天,从凌晨 3 点到隔天的凌晨 3 点。有一个时刻,叫了那天晚上应该看守却没在的警员们,那个委员会的成员们开始问他们问题。当所有人都觉得问题和那个答案口径一致后,Cristina 却继续问了又重新问,那个警员开始装哑,后来就破声大哭,无法继续取证。所有人都提出结束那个会议,但是 Cristina 没这么想:她让人去把警长叫来。

当时主持这个会议的卡洛斯(Carlos Soria)对她说:“可以,我们后续跟踪。”而她回答说:“不,不,让他现在就过来。”Buranello 讲述说那时候“现场骚动,Soria 眼光游离地看着她,因为他的角色是维护舞台上的幕布。当一个小时后胡安·卡洛斯(Juan-Carlos-Passero)被找来后,Cristina 就直接坐到他的旁边。”

她开始抛出一串问题,而这家伙开始冒汗。有人向 Soria 传纸条,上面写着:“让她闭嘴”。

“那些激进党的人兴致勃勃地看这场好戏,因为他们不能挑起的事情由 Cristina 挑起来了。但是说实话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夜晚”,Buranello 说,因为准确地说,发生的都不可思议:这个晚上,Passero 最终第一次承认,在 1992 年的“大使馆案件”,在 1994 年的“AMIA”中,“在军队中有巨大的疏忽和行政上的错误”。他在委员会做的宣言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次日的 Clarin 报纸上,1999 年 6 月 9 日,标题:“一个警察局长的自我批评”,在其中的一段话中讲到:“Passero 不排

除这些事情的发生是由于联邦在这些建筑大楼里安保措施的松懈”。

在同个调查时间的框架下，在 Passero 的声明不久后，在 SIDE（国家情报秘书处）有个会议，去了一些立法委员。一位女性，SIDE 的代办人，负责提供他们在做的报告，而 Cristina 就向她发问。那些问题关于 SIDE 在这个案件上的工作方式，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持续了两个小时，那个代办人最终都快把整个透明袋子装的阿司匹林都吃完了。再一次，就像当时的顾问说的，晃动着的舞台的遮挡幕布。这事是另外一个在场的立法委员对 Buranello 说的。当他听到整袋阿司匹林吃完的情节时，他说：

“你也太夸张了。”

“不，不，一点也不夸张。她每 20 分钟就得吃一颗阿司匹林。Cristina 还继续问她，继续烦她。那姑娘没准备好有人会这么认真地问问题。”

Cristina 和犹太团体的良好关系就起源于这个时期，她在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上签署了反对意见，还加了一个篇章讲和叙利亚的关系。

一年后，在 2000 年，Cristina 成为另外一个著名委员会的副主席，是在议院成立的调查洗钱的委员会，主持的是 Elisa Carrio。这本书里的其他被采访者也记得这些场面，标志着这些议员之间的关系终结，在这个时期，连同 Alicia Castro，现任的委内瑞拉大使，在外人看来是“铁人三人组”，虽然在内部，她们之间相处得并不好。在我领导的杂志“第 12 页”的增刊，我们想做一期专题，但从来没成功：行程时间上的冲突，但是在做了四次尝试之后，我很清楚地明白，她们不会聚在一起拍照的。这 3 个人里面，名气最大的是 Carrio，经常在电

视上出现,她玄秘的长相让人印象深刻。

洗钱委员会一直以来的工作都被寄予很大的期望。的确这些年有洗钱,但是Carrio领导的调查方式引人注目又很肤浅,使得在最终报告就要结束的时候,委员会分崩瓦解了。这对Carrio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她一直以来都承诺揭露一些预料不到的爆料,但是当她在公众面前展示时,在聚集了众多媒体的发布会上,最后就剩Graciela Ocana还陪着她。

最后的委员会会议在两天前结束,用一种喧嚷,而Carrio在哭的场面收尾。

就在那时,有传言说Carrio泄露情报给媒体。一位顾问靠近Cristina去告知她。Cristina要求发言,开始指责Carrio的泄露,对她说:“你在利用我们来为你的竞选铺路。”Margarita Stolbizer也加入了指责,又跟随了很多其他人的批判。Carrio无法掌控场面,在她的座位上哭,虽然那些不喜欢她的人都说她是表演过度。这是委员会的结局,最终展示了4份报告。

在这个充斥着尖叫、哭泣的会议的一天后,Carrio点名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到她的公寓。她是在床上迎接的Cristina,给她一些糖果。这是她最后一次尝试,去记者发布会时能带着一份正常的报告。在床上,她指着一本大部头的书给Cristina,对她说:“你得在这上面签字”。Cristina回答:“我是不会在任何我没有仔细阅读过的文件上签字的。”然后她就带着这份报告回到办公室。她把它留给她团队的几个人,Buranello就是其中一员。这是很多次通宵中的一次,他们连夜读完这份关于洗钱的报告,这份第二天Carrio就要出示的报告。

Buranello说:“有好多处自相矛盾的地方。在第壹章节里说一个事情,但是在第叁章节里说的又是另外的情况。这是由不同的人执

笔撰写的，而这些人之间对一些重要的事宜又没有互相沟通。但是在那个时候是很难反对 Carrio 的，那是她最风光的日子，媒体都站在她这一边。

早上，Cristina 抵达，我们一起看那些划出来的部分。她说她是不会签字的。”

Cristina 没有在那份报告上签字，而是担保了另外一份报告。委员会的分解是那份报告不是很严肃的第一个征兆。最后委员会还继续，但是什么也没弄出来。Cristina 的拒绝可能就是她气忿的源头。

Buranello 继续陪伴着 Cristina 一直到 2003 年，Néstor 任职总统那年。在这么多年繁忙、纷乱的工作后，突然发现自己要给一位想要尽量低调的女议员工作。她说：“她把自己收起来”，她不想要媒体安排。只局限于议院工作。她围着 Néstor 转，让给他更多的空间，在做了这么多年的主角之后，这就像 4 年后他为她所做的事情一样。在两个月后，Buranello 对她说：“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去做，但是我不能天天对媒体说‘她无可奉告，她无可奉告，她无可奉告’。”

“但是，对她来说，这是已做好的决定。”Buranello 解释说，“在政治上，得重建总统的权威，在这个国家已经被锉平了。她理解我，后来我去随 Néstor 去政府工作。”

# 13

## Cristina 的首席顾问对其的回忆

Maria Belen 来到她面前，Cristina 做个手势让她靠近来，对她耳边说：“你看你的衬裙透明了。你穿起来非常好看。嗯？但是透明了，要尽量避免走光。”

## 宪法问题

在2006年的一个晚上，瓦莱里娅(Valeria Loira)，辗转难眠。她向Cristina撒谎了，而这让她很内疚。她在床上翻来覆去，问自己，为什么要对她撒谎，真是天大的愚蠢。

不管怎么说，她其实并不在意这次和Diego Bossio去墨西哥的旅行。Diego Bossio是门多萨省长Celso Jaque的顾问，他们在几个月前认识，成了男女朋友。她对她撒谎因为在她的参议院工作里，他们的恋情很难公开。瓦莱里娅好几年来一直是参议员同时身为阿根廷第一夫人的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之首席顾问。

这个下午，Cristina在听到不喜欢的言论后，把她叫过去单独谈话。这让瓦莱里娅很紧张。Cristina一直都是在整个团队面前对她交代事情，从来也不会背着其他同事们。

Cristina工作外的言论有好几次是关于她的卷发的。有一次，她把头发拉直了，Cristina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你现在也很好看，但是我就想让你知道，你的卷发很美”。另一次，在一个夏天，瓦莱里娅把头发颜色染亮一些，她就在那个全体集体大会中发现了变化，她在所有人离开后问：“你做了什么？”

但是这个下午语调更严重。



“你对我说实话，你在交往吗？如果你在交往，我很高兴，但是我不希望你去旅行。”在她们单独相处的时候她对她说。

瓦莱里娅否认了，而一切都变得复杂了。她曾经和Diego决定隐藏他们的关系是为了避免一些闲言碎语，但是反而不好。在这个失眠的夜晚，最近这些年的一幕幕都涌上心头，所有2001以后发生的事情，当她刚开始和她在宪法事务委员会工作，就在那天她任命为参议员。

这些年过得繁忙，混乱，宏伟。她们在一起找到了一种让人欣喜的共事方式，但是在同时需要非常细致。而这种细致是让她们俩都很满意的地方。她们的角色分明，分工明确，但是Cristina对瓦莱里娅来说，不仅仅是她的上司。在很多很多的加夜班后，有一种沉淀下来的感情。在共事这么久后，建立了一种彼此的信任，还包括她们中午断断续续一起吃过的水果沙拉。瓦莱里娅和Cristina面对面地吃过很多次水果沙拉，被文件包围，一边还接电话。Diego Buranello在最初几年是这个团队的成员，他看过她们边吃饭边工作的场景。他说他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能像Cristina一样吃沙拉吃得那么快。“插一下，到嘴边，插一下然后到嘴里，有一个节奏。而脑子在别的事情上面，就好像吃饭的时间就是技术性停靠。”

瓦莱里娅那天晚上在想，因为害怕或者害羞而对她说谎是件很愚蠢的事情。她决定还是最好把这层关系公开。第二天早上，还很早她就打电话给总统府，对Cristina说她需要见到她。

“我现在要去出差，着急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着急，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

“很重要吗？”Cristina问，开始有些了解。

“是的。”

“好。那你现在就过来。”

半小时后她就在她面前，Cristina看着她，但瓦莱里娅说不出口。

“你怎么了？”Cristina问道，帮助她说。

“我对你说谎了。”瓦莱里娅说。

“你有男朋友了。”Cristina说。

“是的。”瓦莱里娅说。

Cristina抱着她，她们都笑了。她问她们处得如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没有对任何人说，这个Diego人怎么样。瓦莱里娅对她申明这次去墨西哥旅行不是“旅游”，而是为了工作，但是希望她理解。Cristina对她说：

“我不希望你们一起出差，因为我不希望有人说你挪用公款旅行。你知道都是些什么人的。”

瓦莱里娅已经体会到“都是些什么人”，但是在另外一个时刻她体会得更深刻。那是在Cristina任职总统期间，她被任命为领队SIGEN(国家审计总办公室)，而在2009年，她不得不辞职，因为在她的丈夫上任为ANSES(国家社会保障局)领队之后的几天，那些媒体都出来攻击她。那时她怀有7个半月的身孕，非常敏感，辞职的时候，她苦涩地哭，因为她感觉到了无能为力和痛楚。Cristina久久地拥抱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劝慰她要保重身体。这种身体接触，Kirchner家的人并不躲避，但是也只是在屈指可数的场合中，一直让瓦莱里娅印象深刻，但是这也是她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处在非常脆弱的时刻。

准确地说，引起她注意的是Néstor在一次突访中的身体接触。当

她刚开始和Cristina工作的时候,是在2001年。那些省长们在国内的走道上徘徊,不知该如何如何往前走。他们在悼念Felipe Luduena。他生前是圣达克鲁斯的一位议员,有很长的贝隆思想历史。在Cristina被驱逐出贝隆正义党后,和Cristina组建了另一个党派。他在不久前去世,而在那里,她的妻子和女儿就在Cristina的办公室里,非常伤心。他们对瓦莱里娅说:“今天省长先生会过来”。

然后当Néstor过来的时候,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看见他,就是他毫无顾虑地抱着这两位受到伤害的女性。引起她注意的是,这些安慰并不是停留在礼仪上贴面礼(拥抱,亲脸),也不是那些可预知的宽慰的话语。她看见这位极高大的男人弯下腰来长久地拥抱着这些女性,看他如何抚摸她们的脸,如何在她们耳边说话,然后再次抱着她们,让她们静静地哭。

另外一次超出礼节的拥抱是在2007年,瓦莱里娅给Cristina的,那是她大选胜利的夜晚。瓦莱里娅在挤满了人的大街上,新选举上任的总统出来向所有的党员打招呼。瓦莱里娅一路挤过去,为了能走近那个栅栏,然后用尽所有气力大喊。Cristina听见了她的声音,转过身来。她在人群中看见了她,张开她的双臂。瓦莱里娅一直走向她,两人隔着栅栏拥抱在一起,然后一起大哭。

## 2001年

当谈到Cristina,瓦莱里娅说那也是她生命中最繁重的一段时期。在那个2001年,那时候她27岁,那一年她结婚生子。在那年12月的某天,工作室和UBA的同事Esteban Righi对她说,参议员Fernandez

de Kirchner就要成为宪法事宜委员会的主席了，她需要个有专业学术背景的人来做她的首席顾问。瓦莱里娅和Righi都授课“刑法和诉讼刑法的权利要素”，同时也是研究生导师。

当她把简历交给Righi两天后，她在学校收到Cristina本人急切的电话。

“我想今天就认识你。”她对她说。

“可以晚点吗？我晚上9点结束。”瓦莱里娅回答。

“可以，没问题。这个点我还在办公室工作。”

就这样她们开始认识。这个推到最后时点的工作会面持续了不到10分钟。这个晚上，瓦莱里娅人生中第一次穿过参议院喧闹的过道，走进她办公室，看见了这位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女人，在对她微笑。

“哎呀，但是你好年轻呀，我可以用‘你’来称呼。”当在行贴面礼的时候Cristina对她说。

“我也可以以‘你’来称呼吗？”瓦莱里娅问道。她还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位参议员。

“当然可以。”Cristina对她用一种同事的口吻说到。瓦莱里娅说，总结这些年，“我们有一段完美的关系。”她记得那些紧张或者过度疲劳透支的时候，也记得那些被很多紧急的大事件或者她上司的工作方式导致的极致的严格。但是她很满足自己，从极度混乱的2001年起，就像影子一样一直陪伴着这位女性，也成为看着这位不安生的南部女议员到女总统的这一路风景的直接目击者。

在第一次工作面试中，寒暄片刻后，Cristina对她申明说：“我需要有个人和我一起工作，不仅仅辅助委员会工作，还希望她能成为我工作中所触及的各个领域的顾问。我明天就上任了，你如果愿意的

话,你也明天开始吧。”

瓦莱里娅说“好”。在第二天就开了第一场宪法事宜委员会大会,在那里有很多法律都是Cristina和瓦莱里娅携手起草的,像最高法院法官重组,那条允许组成国家新的最高法庭的法律,或者是公众信息的那条。

这个委员会会议期间,发生了第一次针对Fernando de la Rúa政府的全体罢工,他后来在同个月倒台了。那个12月,天气炎热而沉重。布宜诺斯艾利斯看起来就静止不动了,地铁,火车都不运营,商店也关门了,街上也没有人。但是在议院,有很多的运动,那紧急攸关的时刻。12月20日,躁动不安,就像是一场预兆。就是在那些天,发生了不幸,死亡,敲锅游行,大破坏,银行和国会四周都围上了安全栅栏。

12月19号,Cristina和她的团队在国会。那是一个周三,有会议。De la Rúa已经在8点半的时候在全国联播上讲话。过了午夜,Diego Buranello和Mabel(Miguel Nunez的妻子)在Quorum餐厅碰见。一会后,当Cristina、瓦莱里娅和Miguel想要从国会出来,已经出不来了。国会被数百位尖叫的民众包围。Quorum的一个服务员对Buranello说:

“兄弟,你得把领带摘了,小心他们会殴打你。”

这真是个好建议。后来,连Sergio Crivelli都受攻击了,他是一位在那边走动的报社记者,就像这家报社的很多记者一样,穿着西装。在那家餐厅的所有顾问都把领带摘下来,然后把衬衫的袖子卷起来。Cristina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国会里呆着,过了凌晨2点才出来。虽然Buranello为了不受攻击而伪装,但是后来又决定加入这大潮中,跟随他们到五月广场。“我真是精疲力竭。他们用瓦斯扔我们,我就

不停地跑，从玫瑰宫一直跑到 Callao 大街和 Corrientes 大街的交汇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尖叫个不停。”

几天后，在五月广场，又有一次敲锅的大游行示威。那是12月30号，这次抗议结束了 Adolfo Rodriguez Saa 政府。那是一个周五，Buranello 去国会工作，但是“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到处是叫喊声，那些人们试图从建筑楼外的栅栏翻过去，整个氛围让里面的人觉得无法忍受。他本来已经回 Caballito 的家了。当听说有游行，又一个人从 Doblaz 街和 Formasa 街交汇处步行到玫瑰宫。

就在那里，在人群中徘徊，这时 Cristina 打来电话，大概是凌晨3点钟。她从来没有在这个点打电话，后来也从来没有。她在南部，直觉他会在现场，就想要第一手的消息。

“你在广场吗？”她问他。

“是的。”他回答。

“真是不可能。我上飞机的时候是一个总统，当我下飞机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总统了。你们在那里，在干嘛？”

“我不知道，Cristina。”他边说，边在一堆喧嚷的男男女女中穿梭走过，这些人用手里拿着的任意东西制造声响。

“那里在发生什么？”她从 Rio Gallegos 坚持问。

“这里一片混乱。”

“我能想像，但是跟我说说你看见的场面。”

“广场上全是人，有很多的女性，也有很多像我这样一个人来的。人们就是想要他下台。

“你具体是在什么位置？”

“在玫瑰宫对面，离方尖碑几米开外。”

“你看见人们从不同的方向过来吗？”

“是，还在不停的过来，在喊叫着‘让他们都滚蛋’。”

“那Miguel(Nunez)在哪里？”

“他也在这里，但是我找不到他了。”

“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

“这里很吵闹。手机根本就听不见。”

“好吧。保重。”

那个夏天，阿根廷历史上换了5个总统。

从一开始，瓦莱里娅和Cristina的关系就是持续的。她们团队协作，工作上同时进行。当Cristina在办公室读那些瓦莱里娅准备的，自己阅读过和研究过的材料，总会时不时地叫她过去，因为会碰见资料中的一些难点。她总是会先和团队里的人先讨论，然后准时开展工作。在那种情况，她说过：

“那些会议是在11月30号结束。我需要我们马上延期。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有什么？哪些作者提到过这个问题？”

瓦莱里娅总是枯竭一切地找到所有接触到的资讯，因为她知道Cristina不喜欢概述。她所查找的都是准确而丰富的信息，足够让她能整理出一个思维的框架。资料的来源是媒体，相关的作者，那些以前辩论时的速记。所有瓦莱里娅汇集和筛选的资料都会经过Cristina的手，她会有足够的时间来研读。她会在边读的时候边把疑点划下来，也会在讲话前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给她。

“在第三页有段引用，但是你没有标出处。”她对瓦莱里娅说。

“我现在找给你。”瓦莱里娅回答，挂断电话。

过了一会，她的手机又响了。



“你给我的文章有3月、4月，然后是6月的了，5月呢？”Cristina问。

“没有。”瓦莱里娅说。

“你仔细核实过了吗？”

“是的。”

“那就行。”

那个团队里的人都知道会不可避免的有这些问题。一句“没有经过核实确认”是致命的。他们是提供Cristina一字一句公开演讲的信息库，虽然工作时间比预计的要长，但也知道他们工作的结果是Cristina那些著名的即兴演讲的原始素材。

瓦莱里娅从来没看见过她研读，她都在私人空间完成。但是整个团队，尤其是那四个负责搜索文献的人，他们会专注地跟随上司的每个演讲，因为她组建的框架来表达他们所汇集的信息，对他们来说也很惊奇。

“我在UBA工作超过了16年，见过很多大学生和研究生，见过很多有各种各样特长的人，你也可以想像。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人能有像她这样的能力，在她自己的大脑里整理技术、政治、历史、社会方面的信息……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见过她写下来。她所做的就是逐字逐句地朗读，在纸上用不同颜色的荧光笔标记，我猜是根据不同论据或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她也在那些她感兴趣的地方做标识。然后，在全部读完一次后，又回来找那些对她的论据有利的部分。她有她自己的方式，这是不能被复制的。当然，要做到这点，得有她这样的大脑。”瓦莱里娅说。

“我不能相信你都能理解她要什么。”Isidro Bounine说，他是现任总统的其中一名私人秘书，以前在办公室工作。他指的是这些年

来一直深奥的对话。Cristina到达后,对她说:

“你看国家报了吗?”

“是的。”

“好吧。”

“是的,我知道。”

“我们就从那里开始。”

“当然。”

他们在不同的场景下工作。在副楼有个办公室,是个小小的,单调的,就像所有那些鸟舍一样,Cristina在一个参议院办公室办公。每天的日程非常紧张,经常包含早餐、午餐、点心和晚餐,但是点心时刻是他们这些顾问最开心的时候。他们在办公室的会议室集合,摊开所有东西:马黛茶,饼干,面包,和最后一次旅行中南部带来的红果酱。有一个下午,Cristina没通知就过来了,整个桌子上都是食物和文件,因为在一杯杯的马黛茶里他们不停地阅读,他们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让她看见这摊开的甜点。但是让他们吃惊的是,Cristina让他们向酒吧要了杯牛奶咖啡(lagrima),还停下来和他们聊了一会,走的时候对他们说:

“真为你们高兴,工作的氛围真好。”

瓦莱里娅经常去Cristina在Uruguay街和Juncal街交汇处的公寓。她已经记不起来平常都有什么花。过去很多年了,那些画面也溜走了,而且她也从来没有特别地去留意那些花。但是那种进入了一个所有细节都被精心呵护的地方的感觉涌上心头。在墙面上有画,沙发是中性的颜色,很多自然的亮光和鲜花,充满在空气里,都是很女

性化的细节。

这也是Crisitna的一个方面，没有人会察觉不到的一方面，因为这是她个性的一部分。在会议中打断，为了给南部的家里打个电话，看看是否一切安好。对什么都操心，包括每天的菜单。在去开会前，会先去洗手间整理下头发，出来的时候，那里留下一缕香水的痕迹。对这些数据和信息的来源处很着迷，为之能不分昼夜地工作。也对她的个人形象和两个家庭组织与管理，一个在圣达克鲁斯，一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是心系着她的孩子们。“对一个女人来说会更难一些。”她说过，不是自怨自怜，而是对突然中断谈论法律的对话道歉，因为得去关心她女儿的考试。

“你看她每天都那样完美，女同胞会理解，这得有多难。”瓦莱里娅说，“任何一个同时是妻子、母亲，还得工作的女性都知道这有多难，从休息的时间里，从一点点空余的时间里挤出来打理头发，修护手，熨烫整洁衣服，在家里摆满花，精心布置办公室，团队的工作没人浪费时间。这所有的一切所需要的能量和心思都是…巨大的。一个男性做什么呢？他会不定时地去剪发，他会每天穿得干净整洁，熨齐平整的衣服，然后就好了。其他的事情都由他妻子或者同事去做了。

一个男性在工作条件如此紧张与繁重的情况下，不会去关注家里这一天吃什么，或一个孩子的数学考试成绩如何。因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占用很多时间，多到都无法解释她是如何挤出了这些时间。当走进一个家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家是否有个女人在打理、关注着所有细节。对于我来说，我总是觉得她是超凡的，因为这很不寻常。

Cristina超凡的才能把智力优势和她的女性魅力结合在一起，也多次展示出来。就像有一次，他们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和很多的参

议员和在场的媒体都在大厅里。瓦莱里娅的一位同事 Maria Belen Francini 在分发那些准备好的文件夹。Cristina 在讲台上，然后叫一位同事把她叫过来。Maria belen 来到她面前，Cristina 做个手势让她靠近来，对她耳边说：

“你看你的衬裙透明了。你穿起来非常好看。嗯？但是透明了，要尽量避免走光。”

虽然 Cristina 是多方面全才也不能避免和 Néstor 的摩擦。即使自己的女人已经身为总统，在 Olivos 的家里他也表现得和任何寻常的丈夫一样，时不时地她得提醒他一下界限。在最近，Diego Bossio 在总统住宅和他们一起看足球比赛和共进晚餐。有一次有个菜有点问题，Néstor 就指责 Cristina，然后她生硬地对他说：

“现在就差的是连这个事也得我来操心了。”

当 Bossio 回家后把这个小插曲告诉瓦莱里娅，她在还没听他讲 Cristina 如何回答前，对她丈夫说：

“现在就差的是连这个事也得由她来操心了。”

# 14

## Cristina 在卡塔玛卡省 遭攻击

Diego Buranello 当时陪着 Cristina, 当他回想起这段行程时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这么害怕。我觉得他们会杀了我。”

Cristina 走近麦克风, 前面一系列的妇女向她扔鸡蛋。有一个鸡蛋砸中她的肩膀, 粘着头发。她继续演讲, 骄傲地在舞台上说：“不管怎么说, 鸡蛋对头发还是有滋养作用的。”



卡塔马卡省，西邻智利。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经济以矿业和农业为主。谷地灌溉农业发达，出产棉花、水果、葡萄、橄榄、紫花苜蓿等，山地粗放牛羊。铜、铁、云母、锰的开采占有重要地位。有纺织、糖果、酿酒等工业。

## 卡塔马卡省暴行

在2003年初期，Luis Barrionuevo和Cristina Fernandez都是参议员，但是对立，再一次，是两种对贝隆主义思想的不同理解方式。源于卡塔马卡省的烧选票箱，Cristina在宪法事务委员会请求让Barrionuevo参议员撤职。

Néstor Kirchner是当时总统Eduardo Duhalde(爱德华多杜阿尔德)担保的大选候选人，在当时渗透出与卡洛斯·梅内姆的长期内斗。总统选举从10月份提前到4月份，除了是Maximiliano Kosteki和Dario Santillan被谋杀这个因素外，真正原因还是Duhalde在政治事业里扮演了一个连他自己都认为很了不起的历史性角色：他是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后，成为了由国会挑选出来的总统，平稳过渡后又把民主政体还给国家。

所以说，Cristina和Barrionuevo的冲突就有了双重角色和意义。她，是不安分的立法委员，也是总统候选人的妻子。他，是布市维护“骚动混乱”的参议员，热切希冀当卡塔马卡的省长。Kirchner和Menem在贝隆党的两份名单中列首位，将在4月27号的总统选举中竞争。

在卡塔马卡，2003年3月2号定为省长选举日。在那里，梅内姆主义发展得很好。事实上，从最终的选举结果中，能很清楚地看到：



梅内姆—Romero组合获得49.59%的选票，而Kirchner-Scioli只有13.56%。

在那个夏天，Barrionuevo每个礼拜都乘坐直升飞机去卡塔马卡。这让人联想到2010年，这个阿根廷私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巴塞罗那被截获，机上有将近一吨的可卡因，那些飞行员也被逮捕。记起这事的是Frente Civico y Social(民主与社会阵营)的参议员Marita Colombo。在2003年，这位参议员所属的那个党派，正是Barrionuevo的拥护者焚烧选票箱子来废除他们选举胜利的那个党派。

Luis Barrionuevo当省长有个障碍，是卡塔马卡当地的宪法。在131条明确规定，任何省长候选人都必须在当地居住满4年。Barrionuevo无法满足这个条件，于是，为了跨越这个障碍，他自知必须得到国家政府的支持来起草一个计谋。内容就是假装贝隆主义已经被取缔。

Barrionuevo的计谋在2003的起初几天就决定了，坚持要举荐自己，要求当地的正义党不让他们提名其他的候选人。而当他们到竞选的时候，所有人都高喊，连玫瑰宫也是，“取缔！”

在竞选快结束的时候，他也意识到被取消资格，Barrionuevo破罐子破摔。他在4千人面前说：“周日，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去选举。他们必须得让我们投票，不然的话，我们抢走那些投票箱，我们把它们带到其他地方，让他们在那里投票。要么就投给我们，要么就谁也别投”。

在选举那天，《国家报》标题：“Barrionuevo威胁要抢投票箱”，报道中问到：“Luis Barrionuevo不服从省司法采用的免资格政策，将要

通向何方？”

当日期越接近，禁止投票的威胁就越倍增。Duhald派的人出来帮Barrionuevo派的人。候选人的妻子，Graciela Camano，是当时的劳工部长。根据《国家报》在文章中指出，“Castillo省长声明他已经向Duhalde总统汇报Luis Barrionuevo威胁要抢选票箱子，但是上头回复说他也做不了什么事情来确保选举顺利进行。原话是‘Barrionuevo不是我能控制的人物。’这是从Duhalde那里收到的回复。”

Duhualde的内务部长是Jorge Matzkin，也支持“取缔贝隆主义”的计谋。Matzkin的副手是Cristian Ritondo，现在是Pro派，也是因为选举中的“不合法”问题而成为焦点。Ritondo对媒体声明说中央政府已经在“对卡塔马卡发生的事情做预防性的跟踪。”但是提前为“正义党中被剥夺选举权利”而担心。

在卡塔马卡选举当日，当地的正义党已经准备好了捍卫“取缔”这一说辞。如果说，从国家总统府都拥护这一解说，卡塔马卡的本地人又何必质疑。这可能就是标准的模板，在这能看见体制的如何运行不仅仅来自于自身的力量，还借用当局的力量、权力的力量来产生暴力。

15名贝隆党市长的拘留令在第二天就被解除了。投票中心直接就不开放。从一大早开始，恐惧就笼罩了整个省。那些Barrionuevo的跟随者们在路上烧轮胎，阻挡市民通往投票桌的道路。他们和“民主与社会阵营”的党员们直接瓶击撕打起来，或者直接就冲到学校里把投票箱抢走。

在选举活动开始5个小时后，Castillo省长取消了选举，因为已经不能保证选民的安全。卡塔马卡将在8月重新投票选举，但在这

之前又发生了很多事情，这其中的一件是对Cristina Fernandez的暴力攻击，因为她曾经在一次参议院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提出解除Barrionuevo的职位，那时有些暴民混迹在包厢的媒体记者堆里，会场还发生了一次人所不知的断电。

当选举活动被暂停时，所有的媒体都重复播放那些画面，能清晰地看见Barrionuevo的支持者们放火烧选票箱。这次暴力事件的爆发为即将来临的四月总统大选蒙上了惶恐忧虑的气氛，离大选只隔了一个月。

在3月8号的参议院，一场持续了8个小时喧闹，而没有取得任何结论的大会。官方集团和Barrionuevo结成帮派。最后一致把讨论推迟到同月26号，然后委托给宪法事宜委员会，当时由Cristina Fernandez领导主持，出一份相关的报告。

在3月16号，当委员会在收集证据和分析Barrionuevo的案件时，Cristina飞往卡塔马卡参加副省长Hernan Colombo, Kirchner的盟友，组织的一场党派活动。当她降落在Felipe Varela机场，她和随行人员乘坐一辆小轿车和一辆面包车去往市中心，但道路被一群欢呼着Barrionuevo的人群给截断了。那些车被拦截了大概有一刻钟，在这期间，那些人围绕上来，敲打车窗的玻璃，对车里的人吐唾沫或者叫骂，基本上是针对Cristina的，因为骂得很明显，“叛徒贱人”。

Diego Buranello当时陪着Cristina，当他回想起这段行程时斩钉截铁地说：

“这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这么害怕。我觉得他们会杀了我。”

他们先乘坐面包车，到广场对面的省政府大楼。有栏杆包围着，

而在广场上有许多 Barrionuevo 的跟随者，对着 Cristina 喊。他们从面包车上下来，得走一段台阶到政府大厅。那时收到的指示是：“从面包车上下来后，就从台阶上冲上来”。当他们刚开始下车，就砸来一群鸡蛋。这种敲砸的暴力，使得 Castillo 省长推迟活动，晚一个小时在体育中心。

“我是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活动的。”Crisitna 对他说。

当后来他们抵达体育场时，首先讲话的是副省长 Hernan Colombo，然后一位广播员有请 Cristina。她走近麦克风，而在这时候，排了一列的妇女，手里举着 Barrionuevo 的横幅，又继续用言语侮辱她，向她扔鸡蛋。有一个鸡蛋砸中她的肩膀，粘着头发。她重新振作，发表了那次演讲，至今在档案的影像资料里还可以看见，她说：

“军阀的子弹都没能阻挡我们。现在更不会让一帮黑手党得手，阻止不了我们。”

在这个演讲里，她骄傲地在舞台上说，不管怎么说，鸡蛋对头发还是有滋养作用的。

看起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对 Buranello 和随行的摄影师来说并非如此。活动结束后，他们两个人独自在街上，没找到回机场的车。突然，传来了一阵尖叫：“就是他们，他们是和 Crisitna 一起的！”Buranello 转过身，然后看见来了几打的 Burrionuevo 的人。他们想往后退，但是体育中心的门已经关上了。就好像是在拍警匪片，当这群无赖冲过来时候，刚好出现了一辆车，他们俩一头钻了进去。那些人开始用石头砸车，把车窗玻璃都弄碎了。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猛踩油门，一直到机场，Cristina 在那里等他们。

在3月26号和27号,开展了参议院的例行大会,会议内容包括了对Barrionuevo解除的处理。Cristina做为委员会的主席,作为主要的演讲者。

她做了一个冗长而又细致的解释,来说明Barrionuevo是如何使用法律上的计谋来制造在卡塔马卡猖獗一时的混乱气氛。也例举了所有和卡塔马卡省一样的省宪法。在这个气氛非常紧张的大会上,她击碎了Barrionuevo在卡塔马卡编织的政治司法上的陷阱。在这个大会现场,还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Baglini参议员请求讲话,说他的同事们指认出,卡塔马卡视频中出现的暴民其中有一个就在现场的记者区。Negre de Alonso参议员揭发“在场的安保人员有在搅扰,几乎想要暴力地驱逐那些顾问”。Brizuel del Moral参议员也确认说他的三楼办公室有被间断地切断电源。Barrionuevo一直保持沉默。

在Cristina的讲话中,比较突出的几段话有:

“我们认为,在3月2日的选举活动中那些激起的事件和事实与Jose Luis Barrionuevo有直接的关联,他为间接的肇事者,负有政治上的责任。

我要挑战所有人,挑战这个机构里的每一位参议员。大家可以在这里安置一台电视机去看卡塔马卡的那些画面,去听Jose Luis Barrionuevo是如何煽动民众造反,说要去别处投票。我想让你们去看看这些影像,去听听这些话语,然后你还能对阿根廷民众说Jose Luis Barrionuevo和在卡塔马卡发生的事情无关,说他现在还能体面地坐在这里,坐在我们所有人中间,要求着其他的市民们去遵纪守法和尊重当权,而恰恰我们自己组织里的一个成员自身就没有做到。

“这些影像在全世界传播，就像那张照片一样，一个国家的参议员手里拿着选票箱，庆祝选举工作因为暴力事件而无法进行！”

“他们也对我们说有人被逮捕的事情是编造的，说没有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的人。但是我也听说，不是作为国家的参议员听说，而是作为一个记者，坐在宪法事宜委员会里，听‘面包工人联盟’工会秘书说，他被认为是 Barrionuevo 的朋友。他们一行8个人都是单一税主体(小规模纳税人)，出席了‘面包工人代表大会’，恰好是在卡塔马卡选举的那个周末。当问他这些人在卡西诺(Casino)酒店被扣留时做什么，回答说他们在喝马黛茶，然后就不知道其他的事情了。”

从圣马丁区把他们带去，那也是参议员 Barrionuevo 居住的区。而 Barrionuevo 参议员说这是杜撰，说没有人被扣留，也没有人出过。也有两个被扣留的人提供过比如 Barrionuevo 姐姐的住址。所有的证据都在公文里。

“这个不是政治派别问题，这不是说是激进党还是贝隆党的问题。很多人误以为捍卫 Barrionuevo 就相当于在捍卫贝隆党，他们是在拆毁政体法制。”

“这个参议院被诋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时有合理的理由有时没有。在 De lu Rúa 时期的受贿事件，以及后来我们所忍受的那些揭发的事情，而现在，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我们不去严肃地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您们觉得民众还能忍受这个机构到什么时候？”

2001年12月20日，当联盟倒塌的时候，有些人认为那将只是激进党的问题。但是最终涉及到了所有党派。所有的：贝隆党，激进党，社会主义党，共产主义党，独立党……所有的党派。因为当人们对法制机构失去信任时，不是针对一个党派而是全部，从本质上来说，是

得重新相信政治是民主的工具。”

虽然有这么多的论据和充分的证据，Duhalde 官方政府还是保全了 Barrionuevo 参议员，他完成了整届的任职。他们坚持用“取缔贝隆主义”理论。



15

## 从“第一夫人”到“女总统”的华丽转身

在墨西哥与墨西哥总统的午宴  
与世界首富的晚餐

“当然了，阿根廷政客的一个特质就是不懂经济，你看Duhalde。Anibal Fernandez告诉我，Duhalde曾经对他说经济会让他感觉无聊。”

## 进入总统府

在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我就站在瑞吉酒店14楼的电梯门口。这是一栋智能的，非常现代化的大楼，设计师是阿根廷的Cesar Pelli（西萨·佩里）。我在等Cristina来做最后一次采访。

已经是5月29号，编辑给我的时间已经到期。合同上写的交稿日是2月15号。但是这是在Néstor去世前先签订的，就像我在刚开始在序言部分讲过的，在那个时候，我想过要放弃它。但是最终没有那么做，现在我站在这里，新的期限也已经到期，我现在写着另外一本书，这是后来构思的，包括了遗孀Cristina以及她的痛苦。

在Néstor去世后几个月内一片安静，后来就是在卡拉法特的一次长采访。后来又是一片安静，和几次延期。那些政府紧急的事务，每一天都烫手的，激动的新闻，都让我理解她的推迟延期但是还是不能避开自己无法忍受的焦虑状态。在她的方面，为了一些原因，具体是什么我还没时间去解码，Cristina偏向在远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方跟我对话。也许是因为她需要放空她自己，从关键角色中逃出来，将自己安置在另外的一个环境中。在这些对话中，她谈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过的事情。

我和我整理好的行李，准备好了陪她去墨西哥和巴拉圭，但这

两个行程在最后的时刻被取消了。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众多媒体都在报道她的身体状况，用很多医用形容词和名词来装点，大街上我们叫低血压。现在我站在墨西哥城，今天我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纸上重新又开始谈到她的“中暑”和她的“虚弱”。这个中午，我和她的随行人员到查普特佩克(Chapultepec)城堡，中午是总统Felipe Calderon的宴请。那里热得让人无法忍受，墨西哥的礼节在每位被邀请的女士的餐桌上都放了一个扇子。上来的菜是辣烧鸡，用鸡肉和可可、香料、辣椒烧制而成。在那热天和辣味里，扇子太派上用场了。这个午宴，背景音乐是马里亚奇乐队(墨西哥国粹)，女士们都往沙发里靠，不停地扇着扇子。很美的景观。但是Cristina拿着黑扇子的照片，被阿根廷的有些媒体就解读为她身体的虚弱。这比暑热更折磨人。

现在我又有麻烦了，因为下午7点我得回布宜诺斯艾利斯，8点她得飞向罗马。而我依旧还没有采访到她。没有采访就飞回去会让我很难受的，这点我确定，没准我也得变成低血压。当我停在14楼三架电梯口的时候，都已经是下午6点了。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我航班前的最后一个小时。在这一楼，是女总统的楼层，有保安刚才下去请我上来。刚才有仪仗队里的人打电话给我说：“你6点的时候去14楼，在那些电梯口等着，待在那里不要动。”

虽然我的行李箱子已收拾好，我也准备好7点的时候就冲出去，但是现在都已经是6点了而她还没到，而且我还问自己她怎么过来：上午的时候他们签署了一堆的双边协议，然后是和Calderon的午宴，结束的时候都过下午4点多了。之后会见马岛战争中现居在墨西哥的前士兵，然后会见阿根廷的科学家们。如果我把自己放在她的位置，应该会累得嗷嗷大叫。

在电梯前停靠着，听见有人对一个看守我的男性讲：“已经上来了。从M电梯上来的。”我就正好是在“M”号电梯的对面。我把背靠在墙上，试图着放松自己。她上来了，就是现在。

突然电梯门打开了，我看见她了。她就在我的对面，就像仪仗队里的人指示的那样。她笑了。

“你看你得把自己放在哪里才能不让我逃走。嗯？”她对我说，做了个手势让我跟着她。

我们到了客厅，我也没注意她是否有像在卡拉法特似的指给我一个地方坐。我是如此焦急，我就坐在她的旁边，拿出两个录音笔。与此同时她也坐好，然后我听见她对助理说：

“姑娘们，拿些咖啡过来，要美味的，还有巧克力。我只喝咖啡，不然的话，到了意大利衣服就塞不进去了。”

她的精神很好。穿着一件黑色的薄纱，很宽松，船形的领口，漆皮的宽腰带。我注意看她是否会脱掉高跟鞋，就像我和大多数女人一样，在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后做的。她没有。她问我书的情况。几个月前我发给她两个章节让她看看风格语调。那时我还没有采访到她，简单地说，是想争取到她的采访。其中有个章节是关于Carlos和Gladis的。我在那里写到，在1974年那个时期，拉普拉塔的学生们不经常去饭馆吃饭。她回复过来的复印件上只有一个标记，在那句话上画了箭行符号：“我们有在外面吃饭的。”

坐在沙发上，咖啡和巧克力都摆上了小圆桌，我对她说我想谈谈2003年，关于她第一夫人的角色。

“这个角色从来不存在。”她意有所指地回答我。“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是我们一直都一起工作。当然，最后的一些决定，根据两个

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角色而定。但是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是通常意义上的第一夫人。我们俩的优势是我们从来不会同时失去理智，我们总会彼此缓和对方。现在也是一样。你可能会问自己，那现在这个女人独自一人了该如何处理。好吧，实际情况是，他的缺席会强制我不失去理智。他的缺失让我痛苦，让我非常痛苦，但同时他的缺失也让我保持冷静。我觉得这是一种自动的强制执行，是一个留给我和他的作业。我总是比他更能控制自己。我们女人都是这样的，我们被教会了如何控制自己，我们就是被这样训练的。我现在还是一个人，但是他的缺席依旧使我冷静。”

在2003年，Néstor Kirchner登上了总统宝座。从90年末以来，他和Cristina一同主办的卡拉法特集团。这个集团呈现在每周文件里和每周的讨论里，成员是批判梅内姆的贝隆党领导人，这条政治道路一直通向2003年掌权。但是在这之前，还穿过了一段怀疑的时期，还有不平静的联盟。

首先是让Eduardo Duhalde作为Carlos Menem“再次参加大选”的首要对手。Néstor和Cristina支持Duhalde—Ortega的竞选组合，但是输给了De la Rúa—Alvarez的组合。后面这个赢的组合，通过Chacho Alvarez表达的也是，由贝隆主义发展为Frepaso(Frente del País Solidario国家团结阵营)。

Cristina记得那些年的辩论，那些疑惑，接近Duhalde，和关键时刻清晰地、毫无预料地看到了通向总统的道路。

“当Duhalde支持我们的时候，一切都开始有了色彩。关于可能性，我当时也无法相信，但是我们排在第二位的时候，我不再怀疑了。在那时，我就清楚地明白Néstor将会当上总统。这是非常强烈的，我

对很多情况还不能快速地适应。我需要我的时间来调整。不需要太久，但是我需要一点时间。”她说，我想在我们讲那一段的时候她还不是总统候选人，“当Néstor上任总统后，我有四个月的时间失声了。开始是发声困难然后就是失声了，这是我的一个弱点。在非常紧张的时候，就像那次在卡塔马卡的碾压，我就会这样。但是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我去医院做检查，做声音测试。那些医生对我说：‘但是女士，你拥有一个高音’，然后就没说其他的。有一天一个参议员Mabel Muller对我说，‘别去想它！是压力！当我和老公或者孩子们吵架的时候，我也会失声。’确实就是这样，这是我自我修复的方式。当Néstor上任后，我们尝试着在Juancal街和Uruguay街的公寓上居住了4天。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在那个小区的建筑里，没有那么多的贝隆党员，而楼里的那些先生女士都不能出门遛狗，因为门口人头攒动，挤满了各路人和保安，都将要把我们赶出去了。后来我们就搬到了Olivos(总统住宅)。那是2003年的5月29日，在军队日，你看。我只能做手势，因为当时哑了。在Olivos总统府邸，我停在大门口，我看着那喷泉，那水面的反光，那片宁静，一个人，试着去领悟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又将在哪里停下来。”

当她讲到声音，当讲到情感很汹涌的时候，她的发音困难会突然发生。我问她是否在前几天，5月25日在Chaco(地名)的时候发生的那样。那是一个演讲，当中她哭了，她的声音嘶哑了。这一天距离Néstor任职总统那日刚好8周年。

她说那天对她来说不是容易的日子。她想起那个时刻，她坐在参议员的座位上，而不是给她预留的第一夫人的座位上，来看她的丈夫宣誓。她说不是作为妻子的身份去听他讲，而是作为一位一生都和他有一样信念的同事。她说那天就明白，这条路充满艰辛，“但是

从来没想像过会有多艰辛，从来也没想像过得付出多少代价”。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嗓子破了。

她对我说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失声的。度过这个5月25日，这个第一次没有他的5月25日，对她来说太难了。

“我那时非常激动。有人批判我，因为我没有提到那些爱国者，我不在乎。Coqui Capitanich讲到了Belgrano和Moreno。我这辈子一直在讲Belgrano和Moreno，那天我需要讲讲他。

这是我第一个独自一人的5月25日，而这一天是他距离他任总统之日刚好满8周年。我想讲讲这个。”她说着，切起身体，抬高音量，“因为那一天，当他坐在国会里，宣读他的就职演讲，其实并没有人相信他。除了我和其他的几个在场的人，没有人相信他将会做到他所说的那些事情。如果你去读他那天演讲的稿子，就会发现他现在的政府就是所讲那样的。

在这个演讲稿，就像之前其他的讲稿一样，是Carlos Zannini和她起草的。在他任职的前一天，Néstor在Juncal的客厅里面一边看一边把那些纸张扔到地上。“这个稿子我是不会读的。”他说，因为他不喜欢里面的一些用词和语气，“都是废话。”他重复说。Zannini和Cristina赶着时间重新写，他们在过夜后写完，也就是25号当天了。

Cristina添加了一句以前写给Néstor5月14号演讲中的话，当时梅内姆旨在玷污选举结果，结果在一片指责声中下台。那句话也像旗帜一样飘扬：“我来不是为了在玫瑰宫的大门上留下我的信仰的。”

这是Cristina让人想像不到的另一面，她能思考还能把这些想法在他的演讲中写出来。因此，有人说那个时候实际上在执政的人是



她。那些政治分析家玩的角色游戏很多变。当他执政的时候，说幕后是她。而现在当她在执政的时候，又说他在背后操控。在2003年，她还没有执政，但是她非常清楚，也能把这20多年来午休时讨论的想法写出来。就像Cristina说的，“都是些关于价值观的演讲，并不是诺言。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承诺多长的公路或者多少个学校。那些学校当然得去建，建完了我们会去做落成典礼，但是要在演讲里面去许诺这些，是没有的。”

在2003年的5月14号，卡洛斯·梅内姆从候选人中落下，使得Néstor Kirchner以22%的选票当任为总统。

## 债务和独立

Cristina在墨西哥城待了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埃卢(Carlos Slim)在Soumaya Domit博物馆接待共进晚宴。Soumaya Domit是以他去世的爱妻命名的。Soumaya博物馆是一个巨大的蘑菇形状，从里面看，空间是无穷尽的，白色的，弯曲的，容纳了64,000幅艺术作品。

晚宴的桌子在一楼区。从我的位置，背对着主桌，可以看见白色的宽台阶，在楼梯上有副Miguel Angel的临摹La Piedad，是铜制品。斯利姆的一条手臂动不了，在外套外贴着身体。因为一次血管意外，此后就得随身带着一个装置。

我们和Gloria Bidegain和Liliana Mazure坐在任意一张桌子上，我们谈得停不下来。后来那张桌子上又来了6个墨西哥男士：一个是60来岁，一个是50来岁，一个40来岁的单身大叔，其他的是青少年，

分别是15、16和17岁。

我们互相自我介绍，然后问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他们说他们负责Slim先生的一些房地产生意。夜越来越深，我们的聊天也越来越放松，我们了解到所有他们的姓氏都是Slim，这些少年是孙子们在熟悉艺术和生意世界，而那个50来岁的是Soumaya博物馆的工程师。在甜点和咖啡后，做为额外的礼遇，他们把我们带到6楼，展示Rodin和Claudel。

到发言的时候，首先讲话的是斯利姆，他称赞阿根廷的整体经济和“老百姓的购买力”。在这么多产业里，他同时还是Claro电信公司的老板。

然后Cristina讲话，点到阿根廷是整个拉美拥有手机数量最多的国家。然后，着重讲到了Néstor政府和关键的经济政策：摆脱和消除债务，重新确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位置。

在酒店的采访过程中，我提到这个话题。

“但这个与其说是政府决定，不如说是生活选择。”Cristina说道，“他一直都讨厌债务。经营他自己的私人生活里就没有负债。从我们结婚那时起，我们就一直有积蓄。这来源于移民文化：有结余，没有负债是一种美德。不是说Néstor从某个经济理论中带来，他不是读着经济学的书而策划着摆脱债务。他只是认为，对个人而言合理的，对公众也是合理的。这存在于他的DNA里面。当然，知道外债是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还款…这一直在他脑子里旋转，旋转。当Lula(卢拉)对他说，她的想法一致，准备去做的时候，他说：‘现在就是时机。’这几乎和巴西是同声同调的。他

走到总统的位置，一直带着储备的想法。这也是他一辈子做的事情，把钱存起来来获得安全感，可以不求任何人。

“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竞选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会参议员期间，我们当时在Ezeiza机场，他和Alfredo Coto在说话，他说，‘阿根廷要更好地发展需要5百亿美金的储备。’在那个时候，听起来还很夸张。那是2005年，我们的储备是200亿。但是这就是道路方向，而他做到了。”

我问她，Néstor这一生对经济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法律的兴趣，这个属实吗？她笑了。

“不是的！他是在和Cavallo大喊着争论后，感觉到自己在理论工具上的欠缺才开始发疯了似地学习经济学。那时在联邦投资局，那些争论都很激烈，几乎都要动手了。那是在91年，他才刚任职省长。Cavallo呵斥他。当然了，阿根廷政客的一个特质就是不懂经济，你看Duhalde。Anibal Fernandez告诉我，Duhalde曾经对他说经济会让他感觉无聊。

“但是你别这么说，博士。经济怎么会让人无聊呢？”Anibal对他说。他们就把经济扔给那些经济学家。在货币问题上，当他发现自己不能跟他想要的那样来与Cavallo争论时，他就开始大量阅读。但是可不是一本、两本、四本的，他是把这当成工作中的一部分，孜孜不倦地读，读，读。他得懂得经济学才能更好地制定政策，是理论加实践，没有其他路。

Cristina还是微笑着，在这个墨西哥城特别的傍晚，时间好像溜得过分地快，然后就快到了她去罗马和我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时间。她笑了，是因为她说，数学一直伴随着Kirchner家的人，首要的推进者是她的婆婆。

“我婆婆对数字很着迷，让孙子们牢记99乘法表。艾丽西娅的女

儿们，Natalia和Romina，还有玛西莫，都算得比我好。小孩们在玩锡清兵，扔地上，然后奶奶经过时随便抓一个娃，问‘8乘8多少？’过一会又经过时，抓一个女孩，问：‘4乘6呢？’就是这样带大这些孙子的，当初也是这样带大他的。他能够心算乘除，这是家庭的原因。”

她在回忆中，想起在圣达克鲁斯玛西莫跟着奶奶学习算法的日子，想起那段那个男子向她承诺要当省长而且最终实现了的时光。

“他是好学爱专研的，当他在圣达克鲁斯上任的时候，那个省的情况就跟2001年阿根廷国家的状况是一样的。那个省也快破产了，几乎如出一辙。圣达克鲁斯欠债10亿，而且是美元，有超过百天的游行示威。

那些学生们都没上完课程，根据政令，直接升级。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服务都不运行了。当他上任的时候，政府拖欠公务员2个月的工资和节日赏钱，还有对那些省政府的项目供应商也有债务。很糟糕，整个就是一场灾难。然后他就开始整理。因为在所有身份前，他就是经济整理大师。

从第一届执政开始，省里的债务就慢慢地消除了。他开始用津贴作为一个工具来刺激那些经济上脆弱的产业。从那时就能看出他形成本土市场的趋势，恢复劳动集体协定。好，这些就是总方针，整体轮廓。”

关于Néstor“对抗”的一面，这个属性也适用于她。Cristina说不是的。

“如果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他不喜欢斗。他争吵的时候都是被迫的。现在，如果逼他，他会至死抵抗。就是那样，他不会屈服的。

比如，当我们和Duhalde党派的人，去Alberto Fernandez的办公室开会，讨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事情，要提我为参议员候选人，他们过来商议名单。

是Diaz Bancalari在为Duhalda主义争吵，你可以去问他。这位Diaz议员也是这次墨西哥随行中的一员，他目睹了整个决裂，不是由我们这边挑起的。Duhalde决定不再协商，Néstor说：‘是这样还是什么都不是？好吧，什么都不是。’然后就撤出我的候选。

当我们去吵架的时候，都是别人逼我们。他们不能指责我们是好斗的，因为我们只是不会在压力面前退缩。”

所以，焦点从“激愤”(Crispacion)到后来的“克式激情”，(Crispacion单词分开就像是Cris+Pasion, Cris就代表Cristina, Pasion单词意为激情)，她的博客广受欢迎，是贝隆党里备受崇拜的博客空间。然后时间就快到2007年。当时她是候选人，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7点了，我得出门往机场赶了，她也得开始准备下去意大利的行程了。

有人靠近我对我说他们将会把我放到总统的专车“密封舱”以确保我能及时抵达去乘坐飞机，这样我还有半个小时的采访时间。

我尝试着再放松一下自己，侧目看了看那些装着巧克力的盘子，还是和在Calafte时一样，我的胃是关闭的。

相反的，她又要了一杯淡咖啡，然后问我：

“我们继续吧？”

# 16

## 总统夫妇在政治上分歧 争论

Néstor 在睡觉前，说了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我说：‘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了。’因为他这一生跟我在一起所有时光，都是在努力地保护我。有时候这让我很恼怒，因为我感觉他对待我就好像我是块水晶一样。

## 政府, 争吵, 决定

在2008年,他们想要罢免我。是的,对于这点,我没有丝毫怀疑,他们不希望我成为总统候选人。尤其是Clarín集团。Magnetto就此还去Olivos总统住宅去看Néstor,告诉他,他们不希望我是候选人。他对全世界都这么说。后来有一天,我就听说了…你可以去问Florencio Randazzo,让他给你讲讲是怎么回事,当他深信我就是候选人的时候,Felipe Sola对他说:“不,这立不住,你看我跟Alberto Fernandez谈过了,他对我说这样立不住的。”而Radazzo对他说:“可是我跟Néstor谈过,她就是候选人”。另外一个就坚持说不是。那个集团施加了很多压力,这个我一直都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是,那个集团的代言人,在内部,是我们的内阁部长。

在2008年,125法令从一条个别的政治决策,成为了所有社会经济模型讨论的轴心。所以,我说我们每次去争论都是被逼的。那个形势逼着我们去为了捍卫政府而争论。在那年,当你打开电视机,你会听到很多讲我和讲Kirchner的事情,这个情况从来就没有在其他任何人身上发生过。没人这么发生过,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没有。我做的演讲可能有时内容会很强硬,但都是有理有据的。而回报我的是人身攻击,一个接着另一个,他们甚至都否认我捍卫自己的权



利。当我批判Sabat的讽刺画，在那些画上，有一张我的嘴被堵住，脑袋里是Néstor，还有是Moyano的两手被捆住，沾满了血…不是的，你作为一个优秀的漫画师身份，并不代表着你站在了一个不能触碰的位置。对此，我们跟Horacio Verbitsky有差异，他总是跳出来说：‘不，和Menchi不要计较。’但为什么Menchi就可以这样对我？为什么我不可以对一幅诋毁我的画发表评论？为什么这些优秀的漫画师不去临摹Noble的夫人伸手给Videla？这些不能说吗？不能观察到吗？我得闭嘴吗？

Néstor出来捍卫我，当然，虽然他不喜欢Lousteau。为了避免我的政治成本，他已经提升了工资的所得税。125法令，是Lousteau带来的，我们咨询了Alberto Fernandez，我们问那个小伙子是否确定，他说是，说大豆不是问题，问题是小麦和玉米。就这样，甚至都不了解哪里才有真正的利润。我至今还问自己怎么会任命他，还有为什么Alberto…在我的任职中，我认为自己有两个任命是错误的：Lousteau和卫生部长Graciela Ocana。我为自己的不当任命负责，但是这两个情况问题的根源是没经验。我从来没有怀疑他们的诚实，我也没有批评他们个人，但的确是个错误。Ocana对A型流感和革热病危机的处理真是…如果本人不是医生，是无法胜任卫生部这个职务的，而她也向我承认了这一点。当她离开的时候，我很清醒，她也认识到我任命她是一个错误，而她接受这个任命也是一个错误。

在2008年，是争吵的一年，我和Néstor互相指责对方。他把Lousteau的离职书摔给我，而我回答他：“Lousteau我是可以辞退的，但是我该如何处理Cobos，你安排的给我副总统Cobos？”就是同样的

争吵，重复了很多次，后来还简化了。他说：“你和Lousteau”，我回答说：“你和Cobos”。然后他就得闭嘴了，可怜的。

2008年的7月17日的早上是可怕的，是副总统投反对票的那天。我们在Olivos,和Corcho Scochimarro看电视上的辩论。在一个时刻，我忍受不了了，我说：“我要去睡觉了，反正我已经知道Cobos要怎么投票了。”我很确信他要投我们的反对票。我们女人有一种很细腻的第六感，一种能辨别背叛的特殊基因。Néstor说不会的，说到最后时刻他还是会投给我们的，因为他是政府帮子的组成成员。我上楼了，他们还留在下面，看大会。我睡着了。大概早上5点的时候，我醒了，摸了下床，是空的。我自问，这家伙跑哪去了。

我马上下楼，穿着睡衣，在那里我看见了他，塌在沙发里。有些事情是无法原谅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我抓他的手臂，对他说：“你现在就过来睡觉，听见了吗？现在！”他完全是神经错乱的状态。其他人看见我的脸，说：“是的，是的，我们都去睡觉吧。”我把他带到床上，他觉得他给我造成了失败。他在睡觉前，说了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我说：“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你了。”因为他这一生跟我在一起所有时光，都是在努力地保护我。有时候这让我很恼怒，因为我感觉他对待我就好像我是块水晶一样。但是，好吧，这是伴侣间的事情，男性总是倾向于去保护女性。好吧，也不是所有男性。我很幸运拥有了这样的伴侣。

当我看见阻碍，说实话，我从未疑惧。可能是天性使然，我们从来没想过退缩或者讨价还价，或者做一届软弱无能的政府。我指的是从一开始我们谈的所有事情，我指的是那些信仰。我觉得是对一个国家而言，信仰是最好的事情。

我想过，好吧，我说，如果赶我走，希望也是因为我所想的或者我做的事情，而不是因为我不敢去做的事情，肯定不会是因为软弱而被赶走。我不想成为 Alfonsín，他离开时是做了他不想做的事情，这是他的结局。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再愚蠢也不会，因为他们低估我了。

我和 Coalición 联盟开始会议讨论媒体的民主，那个集团持续多年致力于制定媒体法的 21 条法规。Alberto Fernández 问我：“你搞这个做什么？”“没什么。”我对他说。“我就是感兴趣”，“你看啊，Clarín 对这个可不感兴趣。”他说。我回答他说：“我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 Clarín 会不会感兴趣。”好几次都发生过这样的对话，气氛很紧张。最后我对他说：“如果 Clarín 集团不感兴趣，你还有什么问题？”之后我们开始和联盟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我想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能把这个项目往前推。没有人相信我们敢这么做，坦白讲，没有人。

也没人相信“全民足球”这个项目。事实上，如果你如今往回看，在习惯上的改变和转变方面，是非常巨大的。在这个国家，有很多 20 来岁的孩子，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在家看过足球比赛。他们得去加油站的吧台里去看赛事。那些家里没装有限电视的人，得走出家门去看足球。你看，谈到“面包和娱乐”，但是对那些穷人来说，连娱乐也没有留给他。那些没有装有线电视的人家，不能看足球赛事，也看不了进球得分，都习惯了。从字面上讲，“全民足球”这个项目包含了看得见的民主。因为它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今天，人们可以在家看球赛，反响甚至比我们先预料的更加强烈。当那些阿根廷足球协会的领导层过来，我们做了这个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决定。

有人，我不想点名，避免他引火上身，他过来对我说：“我可以给

你牵线。”“去做吧。”我对他说。两天后，我们和Grondona以及其他的领导层在Olivos会见，是在晚上10点。当我们还在聊天时，我对视着Grondona，问他：“如果说有人比政府出更多的钱，您会怎么做？您会接受吗？”他回答我说：“不会的，夫人，我们会和您合作。请不要怀疑我的话。”我决定信任他。

另外一个定义性的方针是恢复劳动者的资源，我认为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做了是因为2008年的推动，当年整个世界都往下行。因此我如此看重Amado Boudou，是他过来带给我那个想法。那是在一个节假日，Massa给我打电话，他当时是内阁部长。Massa有个毛病…就是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就会笑个不停，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可怜地，不能停住笑。那一天，他给我打电话时快笑死了，对我说他跟Amado在一起，Amado发疯了，想要告诉我一个想法。‘好吧，过来吧。’我对他说。我们就去了内阁办公室，是的，是在一个节假日，因为他们都是穿着运动服过来的。他们俩都来了。Amado对我说，Massa还在那里笑，“总统女士，这个世界不会回到它过去的样子。我们得通过AFJP(退休养老金)。”我问他具体怎么讲，然后他就开始铺开一张张的纸，解释给我听。Massa在一边都快笑死了。我对Amado说：“我很喜欢，但是我们得给Kirchner打电话，看他怎么说。”当时我们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到内阁处。我们坐在我的办公室。Néstor到了，站在后面，站中间，Amado又重新把纸张摊开，解释这个项目。在那个时期，国家支付60%的钱给AFJP，来满足最低养老金的支付。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时刻。Néstor安静地听完，当Amado讲完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首先向他伸出手，然后握紧他的手，对他说：“我完完全全同意。”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重要

要的夜晚。

Néstor原来就想过，甚至我认为都和Lavagna分析过如何恢复储备金，但是没有成功。用了两年，我们就使资金翻了一番，赚了他们用了12年才聚集的财富，这是非常震撼的生意。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别人都曾经想过，但是都没有干劲去做。比如全体的抚恤金，比如航空，比如同性恋婚姻，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每个项目我们都被说成是机会主义者，但其实都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

比如，他们说我们在同性恋婚姻上是机会主义者，而现在幸亏出现了出现了那封Juan Castro给Néstor的申请，当时他还是省长，而他赞同同性伴侣收养孩子。总之，我们利用的是权力赋予的机会，我们只是借机行事。就像他在总统就职典礼上说的，那是我写的，也是我一直感受到的：“一个人走到这一步，不是为了把信仰留在门上。”

突然有人进到房间，她点头示意，带着某种安详、喜悦，也许是因为她已经发泄完了。我没有时间去问她这个，因为她给我一个贴面吻，然后就走了。我把录音笔都装到包里，有人对我说：“去拿你的行李箱，然后在两分钟后到大厅。”我照做了，两分钟后我从远处看到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披风。整个大厅一团忙乱，很多在对着讲话喊叫，在外面有一排的小车和货车。我跟随着服务人员对我做的手势，根据指示我上了一辆队尾的灰色皮卡。他对我说，在最后的时刻皮卡会带我到商用机场。我一上车，就听见司机按上了安全门的按钮，就好像这关门声是启动的信号。车开始行驶。我们后面跟着辆救护车，再后面跟着巡逻飞机，是自动的。那场面就像是游乐场的游戏，就好像是一条蛆全速滑过墨西哥城。每个街角都有警察

封路,为我们让行。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总统都是这个待遇,但是这里,在墨西哥城,用这样的速度赶机场是很奇怪的事情。突然,那个司机喊道:

“哎哟,真爽!”

## 两百年庆典

对于两百周年的庆典Cristina在卡拉法特的房子里给我讲过,关于现在已经落成的两百周年纪念博物馆在墨西哥也对我讲起。首先她讲如何组织2010年的5月25号的庆典,然后讲如何在墨西哥,产生了保护新博物馆的星星“Siqueiros”的诺言。虽然,就像她在后面解释的,“Siqueiros”还成为了实现另外一个更具野心的计划的工具,就是讲述阿根廷历史。

2010年盛大的庆典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高潮。也许也是那些天的情感,身体,精神面貌,展示了阿根廷并没有活在那那些大媒体渲染的那种不满的氛围里。

在卡拉法特,当想要寻找一个例子来给我解释她不是着魔的,而是完美主义的时候,Cristina就开始讲了庆典准备工作的例子。在玫瑰宫里,她参加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工程的会议。

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变动,美学上和象征性的改变。在Cristina总统执政期间,落成了El Salon de las Mujeres(女性画廊)和Los Patriotas Latinoamericanos(拉美爱国者展厅)。但是创新上最显著的是前海关Taylor的修复,地理上精确地坐落在城市的建成处,用来安置那些被修复的墨西哥壁画家的作品。

对这两个项目,Cristina都埋头于细讲如何组织工作。她讲得那



么专注以及仔细，以致于给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不改变话题，她会一直讲下去。我问她是否操心那些美学上的事情，建筑的、历史的，以及相关的。我讲到了关键点，她果断地说，是的。“我需要这么做。”

“200周年的庆典真是神奇，所有事情都是我和Parrilli策划的。这个得那样，那个得放那里。Zannini觉得是多余的。我对他讲“‘极度震撼’(Fuerza Bruta)的每一副场景。

因为工作的流程是这样的，我对他们讲那些事项，他们在那些想法上发展，然后我再继续地重新整理。我们在不同的会议上对话。后来我让加入“巴拉纳战争”(1845年11月20日发生的“Vuelta de Obligado”巴拉纳战争，阿根廷联盟对抗英法舰队)。而“腾飞的阿根廷”(Argentina Voladora)的想法就是来自他们。但他们提出原住民放在“腾飞的阿根廷”之后，我说不。因为比那个要先存在，所以应该先放原住民。宪法的那幅场景我们讨论过。他们来的时候带着想法是正义和那些选票箱一起烧，我对他们说不，不是的，在这里正义会永存，没有人能触碰它，国会关过门，总统坐过牢，但是正义一直延续。对于Zannini和Kirchner，听我好像说一些胡话，就好像我每次致力于这个事情上的工作就像是去理发店。庆典一个周前开始封路，Néstor火冒三丈地过来。“不能封路，所有的交通都被截断了，老百姓要来骂我们的。”他对我说。我对他说：“别夸张了。”而当人群开始过来时…那是不可思议的场景。我早就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会来3、4百万人，所以我选的是七九大道。我甚至在Néstor任总统之前就在思考200年庆典的事情。在我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和大学老师Stiglitz Margarita Gutman交谈，她对我说应该给阿根廷200周年重新赋予意义。好吧，后来我碰见了Parrilli，他像我一样的有病，我们俩就肩并肩地做这个事情。



后来是Tecnopolis(城市技术博览会),这将会非常的壮观。因为将会是纪念独立200周年。5月25日是政治和军事上胜利的日子。但是,独立,是通过科学和知识获得的。

在200周年博物馆,绝对的主角是“Ejercicio Plastico”, David Alfaro Siqueiros惊艳的壁画。在2003年,在经历了18年不锈钢柜子里的航行和司法上的诉讼,这些壁画差点就要失去了, Néstor称其是“艺术珍宝”。2009年, Cristina已经在任职总统,参议院投票通过对其征用。于是就开始了异乎寻常的修复工作,因为那个壁画有200平方米的面积,而且遵照Critica报社老板Natalio Botana庄园地下室的设计,是在1933年在Don Torcuato画的。壁画是包裹的,在墙壁上,在地上,在天花板上铺展而开。在Taylor海关,保护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箱子里。

刚开始修复时,能看见Siqueiros和他的助手们画的先期作品的碎片,助手有Spilimbergo、Berni、Castagnino和Lazaro。在Clarín报纸上出了一条简讯说那些能接近作品的人都为其大量的色情内容感到吃惊,说展示了模特的裸体和Siqueiros的妻子。Blanca Luz Brum是在阿根廷军政府统治黑暗时期(Decada Infame)作画的,在Critica报社老板家里,那时他已经是Blanca Luz的情人。后来在她的晚年,于智利被Augusto Pinochet(智利政治家、军人。发动政变推翻政权,担任总统统治17年,任内创造经济奇迹。)授勋。

“你去看过那个博物馆吗?但是你有认真地浏览一遍吗?我请你一定要抽出时间去看一看,去看看那前海关Taylor楼画廊里14根历史性的拱。我们和Tristan将会做一个章节,关于会见这些每一根拱。这些拱……”她这么兴致勃勃地讲,让我想要改变话题都是徒劳的。

“当我看见它们的时候！因为我是从陪同 Néstor 第一次去墨西哥访问的时候，有两位民主革命党(PRD)的国会议员过来跟我讲，让我拯救那些壁画。我对他们说好的，我也这么做了。但是同时，我从玫瑰宫的阳台看前海关的那些作品，就在科隆广场旁边。那里全是水，发生水灾了。我们得做点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想怎么做呢？”他们问我。然后我就思考…那时候，他们在一个带空调的棚屋里修复壁画，那是由阿根廷和墨西哥的企业家出资赞助的。他们也问我：“修复完后，我们要放哪里呢？”后来有一天，我就把两件事情关联起来了。我们为何不放那里呢？为何不把海关关了然后我们做一个巨大的博物馆，用玻璃来吊顶，这样室内就会有光，再加上水的声音？水，当时还没想到这个部分，是后来才想出来的。但是我告诉他们，我想要一个现代与古典的碰撞，这个我非常喜欢。而最终，当这些作品终于能在画廊上呈现时，我走下来，看着这些拱时，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啊……”她耸耸肩，就像是吃了巧克力似的，“所以那时已经很清晰了，每一根拱都代表一段历史时期。我又像回到了准备200周年庆典活动时的工作，整理。”

在博物馆，有 Alfonsín 的总统绶带，他也是 Cristina 一生很崇敬的人物。在这条拱上，也记载了 Néstor，当他收复 ESMA 时的失足，他也以国家的名义请求原谅，但是忘记指出委员会大审判(Juicio de Las Juntas<sup>①</sup>) 在历史上是斗争的一个界标。Cristina 回忆这一天，明确

---

①委员会大审判：1983年12月15日，阿根廷总统 Alfonsín 上任5天后，下令对阿根廷军事独裁的3个委员会进行审判，针对其在1976年政变后到马岛战争期间所犯的罪行。在阿根廷乃至世界上引起政治意义，尤其对邻国国家，因为它们也有类似遭遇。

地指出,这个疏忽不仅仅是遭到外界的批评。

“我们那天吵得很厉害,我对他说过:‘你自己写好演讲稿,你自己写好,因为你一去那里,你就会动情,然后就可能说错话。’但是他……他那时过得非常紧张,比我要紧张得多,他从来就没有停止想念他的同伴们。他想去那里,讲那些杀害的事情。这是他人人生高潮的一天。我以为我会晕厥过去,那天是那么的热……他们开始唱Charly录的国歌,所有人都举起手指做出V的手势,我只觉头昏脑胀。那个时代穿到我大脑里,浮现两个失踪的小孩子在对话。”她笑着,“然后是JuanCabandie讲话,很镇定,接着是Néstor讲话。当我听见他那么严厉地批评Alfonsin的时候,我想阻止他,可是没法阻止。我告诉过他,让他讲“应得权威法”(“Obediencia Debida”: Alfonsin政府颁布特赦令,战争中由于服从上级命令而犯下侵犯人权罪行的士兵不受仲裁)和“句号法”(“Punto Final”: 由Alfonsin颁布,对军事罪行审判确定最后期限),但是你不能不讲“委员会大审判”(Juicio de Las Juntas)。但是,好吧,Néstor就是那样的人,而今在200周年纪念博物馆里,有Alfonsin的绶带,有对“大审判”的认知。我们将来也会放一些Néstor的东西。他的皮便鞋,他的打结好的领带,他的Racing队的球衣。”



Carlos Slim Helú, 出生于1940年1月28日,他是墨西哥电信的最大股东,亦是墨西哥美洲电信的首席执行官,并持有墨西哥卡尔索集团,商业网络遍及世界各地。2010年度福布斯榜首。2013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榜首。



2012年福布斯排名



“极度震撼” Fuerza Bruta 的创作团队的灵魂人物编导迪奎詹姆斯(Diqui James), 在90年代团队就以钢索飞人秀「De La Guarda」引领风骚十余年, 跃登百老汇名剧, 成为阿根廷在探戈之外的新兴文化资产; 2002年他开始构思Fuerza Bruta, 2005年Fuerza Bruta在阿根廷首次诞生出演, 07年即荣登百老汇大剧院。一炮打响。

很难为它明确地归类, 它综合剧场、舞蹈、舞台装置、全景剧场演出、互动装置、特技、狂欢Party、装置艺术等元素, 完全打破艺术类型界线。360度变幻的演出装置、炫目的灯效、上天入地的空间创意。Fuera Bruta还打破了传统剧院艺术观众坐台下, 表演者在台上表演的观赏经验, 强调立体空间和极致的互动。







Felipe Calderon(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



La Senora del intendete:《市长的女人》电影海报。





Magnetto: 阿根廷《Clarín》号角报的大股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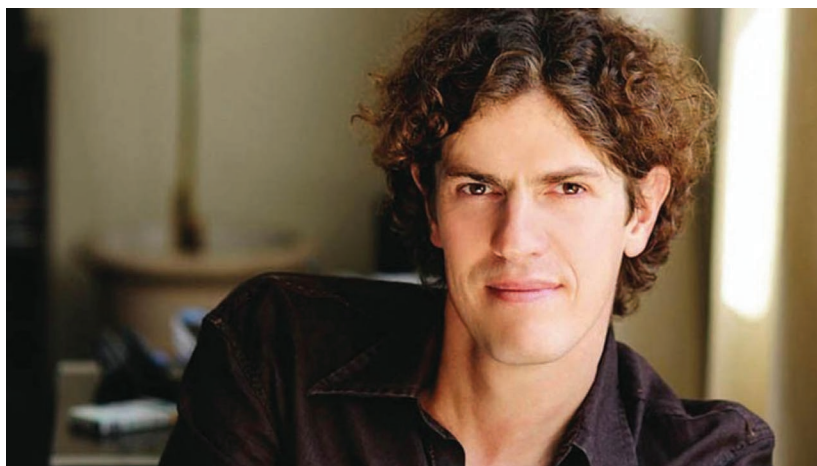
Florencio Randazzo: 阿根廷前交通部长



Felipe Sola: 2002年至2007年任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



Alberto Fernandez: 2003年至2008年任职阿根廷内阁长



Lousteau: 2015年12—今任阿根廷驻美国大使  
2007年12月10日—2008年4月27日任经济部长



Graciela Ocana: 2007年12月10日—2009年6月29日任卫生部长



Hugo Moyano : 阿根廷工党首领, 工会秘书长。



Domingo Cavallo : 前阿根廷经济部长





Julio Cobos: 2007年12月10日—2011年12月10日, 阿根廷  
副总统

2003年12月10日—2007年12月10日, 门多萨省长

重要历史事件: Cristina 作为总统提出的提案, 国会内部半  
数平分, Cobos 身为副总统, 可以投最后一票关键票, 他投了反  
对票!





Amado Boudou: 1962年11月19日出生，生长于Mar de Plata银海市，2009年至2011年任阿根廷经济部长，2011年至2015年期间任阿根廷副总统。



Daniel Scioli: 1957年1月13日出生，布宜诺斯艾利斯首都。

1986年认识模特 Karina Rabolini，与其在1991年结婚，1998年离婚，2001年复婚。1978年，另外一位女性生下他的孩子 Lorena Scioli，1993年该女性亲子鉴定官司获胜，Scioli方承认这位女儿。

2015年与 Zannini 组成团队竞选总统大选，失败，位居第二。

2007年12月10日—2015年12月10日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

2003年5月25日—2007年12月10日任阿根廷副总统。

1980年至1997年，为杰出的运动员，游艇赛手，曾获世界冠军，1989年，海上事故，被巨浪激起的螺旋桨拍中，失去右臂。1997年退役。创建“Villa La Nata”运动俱乐部。也参与家族企业“Casa Scioli”管理团队，在其领导下破产。





Carlos Zannini: 1954年8月27日出生于科尔多瓦,已婚,四子。

被称为 Néstor 和 Cristina 的“右手”,“军师”,“战友”,可以说是 Cristina 最信任的身边人。传各省长,部长递交总统府的文件都要先经过其办公室查阅。

2015年与 Daniel Scioli 组成大选竞选团队,组合“Scioli 总统—Zannini 副总统”,竞选失败。

2003年5月25日—2015年12月10日任阿根廷总统府法律秘书。

1995年12月10日—1999年12月10日任圣达克鲁斯省议员

1976年3月24日,政变前的几个小时,被捕入狱,政治牢。1980年出狱,回科尔多瓦大学继续法学专业,1981年获法学学位。1984年受朋友邀请,去圣达克鲁斯发展,在那里与 Néstor 结识。1991年 Néstor 当任省长时,任命他为局长,1995年成为立法委员。



Massa, 全名: Sergio Massa, 1972年4月28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2015年参加总统大选, 位居第三。未进入总决选。

2013年12月10日起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议员

2009年7月24日—2013年11月25日: “老虎”城市长

2008年7月23日—2009年7月7日: 阿根廷国家内阁长, 背景为时任内阁长 Alberto Fernandez 在参议院未通过 125 法令, 被任命为替换 Alberto Fernandez.



Lavagna, 全名: Roberto Lavagna, 1942年3月24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职业: 经济学家, 外交家, 政客, 教师。

2015年支持总统投票中支持Massa, Massa也承诺如果获选, 将重聘他为阿根廷国家经济部长。

2007年参加总统大选, 选票结果16.89%, 位居第三。获胜为Cristina, 第二位为Elisa Carrio. 他获得选票最多的省份为科尔多瓦省。

2002年4月27日—2005年11月27日, 任第115届阿根廷经济部长。

1967年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政治经济学学位, 并且获得布鲁塞尔大学奖学金。在那里, 他认识了一位比利时女学生, 之后结婚。共有四子。现已有5个孙子。



Juan Cabandie: 2013年12月10日—今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员  
2007年12月10日—2013年12月1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法者

重要经历：1978年3月16日出生，他是“五月广场的外婆”（当时很多怀孕的女性被军政府逮捕，他们在女性生下孩子后处死，孩子还活着，母亲已经不在人家，所以成立的这个组织，都是外婆在寻找当时的孙子孙女）组织找到的第77位孙子。阿根廷有一首歌《YO soy Juan》（我是胡安）讲的就是他。在2004年5月24日的恢复ESMA的典礼仪式上，时任总统Nestor发表讲话后，他作为“不能忘却的历史”代表发表了演说，结尾处讲到“真相才是绝对的自由”。

1977年，他的父亲 Damian Abel Cabandie(19岁)被军政府逮捕，几个小时后，他的母亲 Alicia Alfonsin(17岁)也被带走，当时正怀着Juan。同年12月，他母亲被安置在“孕妇集中营”。次年3月，生下Juan。母子陪伴的时光仅为15天。此后，他母亲被杀害。他被一名联邦警察Luis Antonio Falco带走，给他换了名字和出生日期，使他相信自己是亲生的。

2003年，Juan开始怀疑自己的出生。因其所受的家庭待遇，他的个性性格以及家里模糊的他出生时的场景回忆。他对养母施压，要求真相，养母最终承认了他不是亲生的事实。于是他开始加入“五月广场的外婆”来寻找来历。几个月后，他找到了。2011年，Luis Antonio Falco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



Alfonsín: 阿方辛, 1983年至1989年出任阿根廷总统, 他是几十年军事独裁统治后首位民选总统, 任内未能改善经济。1989年宣布提前大选, 7月8日提前交权, 把政权移交给正义党, 为阿根廷近代史第一次和平笛政党轮替。





Carlos Menem: 梅内姆, 1989年7月8日—1999年12月10日任  
阿根廷总统

1983年12月10日—1989年7月8日任La Rioja省长

重要事件: 推动1994年宪法改革, 将每届总统任期由6年改为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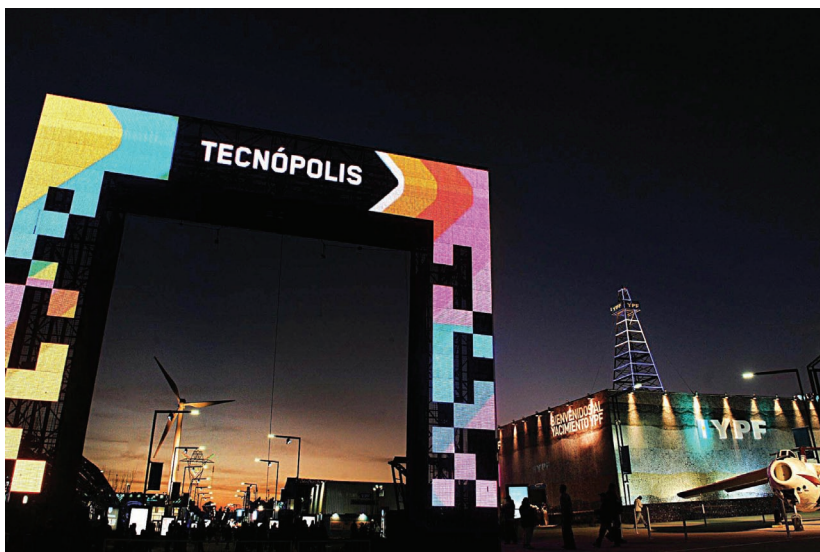
前海关里的壁画



Tecnopolis(城市技术博览会)



Los Patriotas Latinoamericanos 拉美爱国者展厅



17

## 愿天堂是你想要的模样

当我醒来，而你已不在身旁。

他死的时候就在这里，在床上，和我在一起。  
我很安慰他是在这里去世的，而不是在 Olivos  
总统府。他非常热爱这个地方。

## Néstor

Cristina 爱抚着灵柩。长指甲涂着白胶，手指滑过棺木，就像是在摸衬衫的领口。嘴里说着：“任性，真任性”。她敲打着木头，但并没有愤怒。敲打只是在对抗着痛苦。在10月28日的那个凌晨，在为 Néstor 守灵的那个夜晚，Cristina 的个人生活又和一桩集体大事件交织一起。这就是，Néstor 的死亡，既是 Cristina 生活上的巨大改变，同时也是阿根廷近代史上的一个印记。

在玫瑰宫的弥撒室里，棺木上的光洁对她来说似乎还不够，时不时地，她就用手帕去擦拭。她整理了好几次人们送给他的彩旗。她的眼睛用一副墨镜盖着，露出的半张脸依旧能看到恐惧与坚毅的转换。她在那些鲜花下面摆了一封很特别的信。她，这场辞别的女主人，还是对所有细节都操心。

在那么多个小时里，她都站在棺材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他谢幕。她把手放心口然后像飞吻一样给那些不停过来的列队。这些人对着他哭，对着她喊：“Cristina，要坚强！”

那天晚上她安慰了很多人，那些男孩女孩，是民众组织的成员，也安慰了前来吊唁的他国总统。她安慰卢拉，弹去他外套上的毛线。她拥抱 Rafael Correa(前厄瓜多尔总统)，轻拍他的后背。她把额头靠在 Hugo Chavez(前委内瑞拉总统)的肩膀上。从这个晚上起，Cristina

身上有些地方不一样了。她是总统，也是寡妇，但是也是母亲。还没有去思考，还没来得及去消化，Néstor死亡的同个夜晚，Cristina就移换了角色。她不允许自己是那个被安慰的人，她要抓紧平静的缰绳。从那个晚上直到今日，她都躲在那里，躲在这个角色里，这个角色要求她保持冷静，不管是在所有人都哭的时候，像守灵那个晚上，还是当所有人蜂拥而至的时候，像竞选的时候。

如今，Cristina经常谈到Néstor。他生命最后35年的时光里，他是她的同事，缓冲器，平衡点，是朋友，是对话者，是爱人，是知己，是领导，是同伴。就好像是故事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在Néstor去世后的这几个月里，Cristina在公众场合消化她的痛苦，因为她并没有其他选择。她既不能隐藏她的痛苦，也不能停止感受这痛楚，更不能停止她的工作。至少一次次地回忆Néstor，不仅仅是艰难的岁月，还有幸福的时光，她看起来处理得还不错。他缺席带来的痛苦并没有阻止回忆起他来的幸福。

“他死的时候就在这里，在床上，和我在一起。”我还没有问她，因为我不敢去问，她自己开始说，“他没有死在医院里。我算过时间了。刚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呀，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想要唤醒他。但是后来，我才重新整理发生的事情，我打电话给医生问他。就是这样的，事实是在这里的，那个医生不敢告诉我他那时已经死了，也可能是因为没有人能接受这个事实。我就不能。我们那天早上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绝望而徒劳的。”在蹦出“死”这个单词后，她那有光泽的长指甲猛烈敲击这木头沙发的臂。但是在微微摇头和敲指甲后，她找回些勇气，继续重新讲，“我很安慰他是在这



里去世的，而不是在Olivos总统府。他非常热爱这个地方。这是我送他的，是我发现的，然后给他的。我这么做当时其实是违背他意愿的，为这事我们吵了很多年。他对我说：‘别在那房子上开销了。’”她笑了，“但是后来我把对这个地方的爱传递给他，在也没有比待在这里更值得怀念的了，在看球赛前在沙发上打个盹。”

“在最后一个礼拜，他表现得特别的热情，也很平和。我们不是那种会在公众场合或在人前秀恩爱的人。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是我侄女的丈夫Patricio对我说的。‘你吻他了。’他说，然后我就记起来了。

“那个晚上，我们和Patriocio、Natalia一起吃的晚饭。报道上说是我们和Lazaro Baez吃的晚饭。我这一生都没有和Lazaro吃过晚饭。那个晚上我在为了第二天编写一个关于“人口调查”的Twitt。Néstor特别反感Twitt，对我说：“又在搞这玩意？”我回答他说：“别烦我，只要我自己感兴趣就行了。我对你的足球赛事说过什么吗？”但是后来我被疲劳打败了，实在太累了，就把Twitt推到第二天再写。

那个晚上，我的侄子们来了，我们看了《6, 7, 8》电视，我们就在那里，你看。”她对我说着话，站起来，走了几步，向我靠近，她指给我客厅那端一个巨大的三人沙发，是松软的，雪茄色的，“Néstor就坐在这头，而我在那头。沙发正对的是一个电视机。他在不停地切换频道，然后突然就停在一个频道，屏幕上出现了D.Elia。他们问他更喜欢谁做候选人，是Néstor还是我，然后他说这个没法选，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让他选，他说：‘好吧，那我就引用Néstor的一个回答，他曾经说：‘在学校的时候，我是一个四分，Cristina是一个十分。’我们四个人都笑了，Néstor从齿缝里蹦出话：‘这个叛徒胖子。’我开怀大笑，多么甜蜜……我走到他那里，然后吻在他嘴上。



“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个吻。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就发生那件发生了的事情。”

他们两个躺在双人床上，就像往常一样，每人手里拿一本书。她早上时候听见了什么声响，突然醒了。她去开灯，看见他一动不动，就喊人。是无法接受他的死亡，做着很多无望的尝试企图想把他带回来。

然后就有那条27号早上第一时间让人难过的短信在整个国家疯传。

发生的事情就是他走了。

她失去他了。

永远。

Néstor去世的一幕就这样毫无征兆地上演了，如今已经7个月了，我看着Cristina，听着她一次又一次激起的语调，我猜她自己个人，以及近代历史都还需要他，虽然他已经不在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Néstor为了她和她的政府而斗争。

“Néstor有一种远见。”Cristina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地方。因为他从前就有，总会充满激情地去对待很多事情，只是因为他有这种前瞻性，他相信20个人也可以是5000人。他也成功传递给了别人。我认为那些年轻人参加组织，他们这么做是因为那些个人、个体身上散发的气场。Néstor大概会感到非常自豪，为自己在政治上留下的观

念遗产。

在2007年7月，Néstor顶着来自商业财团的巨大压力，捍卫Cristina为总统候选人，在那些天发生了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一年的7月9日，也就是独立日那天，布宜诺斯艾利斯下雪了，这是非常奇特的。那些雪花飘落在这么建筑群上面的场景，唤起了很多人脑海里曾有的景象。就是《El Eternauta》（《永恒》）那本连环漫画的雪花，那个人民英雄宇航员。《十二版》的第二天的封面就是这个：在黑色背景里，《永恒》中的大英雄庞大的身影从一片雪花中飘至而来。“Hector Oesterheld曾想像着布宜诺斯艾利斯飘雪的场景，在今天，在50年后的今天，这个梦成真了。”也就在这一天，在7月19号的这一天，在拉普拉塔市的阿根廷剧院，Cristina开始了她的总统竞选之旅。

他如今是“Néstornauta”（发明的新词汇，nauta意为宇航员，前缀加Néstor，代表Néstor像那本漫画书里的宇航员一样，不朽的英雄），一个时代的贝隆或者非贝隆的党员们接受他的邀请。如今，在那幅漫画里，包含大众百姓对这位领导人的热爱，与此同时，阿根廷政治语言风格被创造和展开，那些年轻人表达对祖国的爱。她也出现在那些博客里，被画为他的同伴，穿着太空服，戴着头盔，头盔里能看见她眼睛的浓妆重彩。

这对伴侣政治上的发展可能阻碍我们去看他们个体，但我们依旧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生活中厚重的爱。Cristina得学会适应Néstor的离开，这种缺失将一直伴随着她。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陪伴她，

他们在现场对她高喊：“Néstor 没有死，Néstor 活在群众里。”

她知道这是 Néstor 一直梦想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靠任何形象顾问所能抵达的。在那里，无数颗真诚而深挚的心在跳动，而这也是 Cristina 获取力量继续前行的源泉。





Hugo Chavez 前委内瑞拉总统



Hugo Chavez 前委内瑞拉总统



Hugo Chavez 前来慰问

女总统



Rafael Correa(前厄瓜多尔总统)







棺柩于玫瑰宫内



玫瑰宫门口横幅上写 FUERZA CRISTINA：要坚强，克里斯蒂娜！



全家福：Néstor 为总统，Cristina 为第一夫人



全家福：Cristina 为总统，Néstor 为第一丈夫



总统的家





如今的 Cristina



漫画中的第一个场景,白雪皑皑下的五月广场



《El Eternauta》是科幻连环漫画，台词作者Hector German Oesterheld，漫画作者Francisco Solano Lopez。



# 后记

## 起始于圣地，终结于和顺

2016年回国，几个行程安排非常松散，6月来了一批阿根廷企业家访华需要陪同，9月又定好来一团政客朋友希望我在国内跟随。于是7、8月就显得有些尴尬，在北京会太热，回阿根廷又是年中假期，人们都在休假。如果跑回去又跑回来不免折腾。于是决定在国内走走，顺便翻译一本比较喜欢的书。这里还得感谢一位中资企业的老总帮我把书从阿根廷带回来了。

走的川藏线，4个人包了辆吉普，包了个司机。一路石，一路泥，一路颠簸。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赶路，10多个小时的行程。晚上8点吃完晚饭后，8点到9点到酒店处理公司业务上的事情，9点到12点奋力码字。白天在车上的时候，封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已经边阅读边打好腹稿，所以晚上的时间也没耽搁，基本直接敲字即可。

一路跑来，心静如水。

也是好事，路上经常没手机信号，也没网络，所以很多时候不受打扰。也可以如果不去西藏，已经完成不了这本译作。其实在路上，也没想过自己会坚持下来。总觉得会中途放弃，或者就不愿意翻了，或者没时间了，或者劲头过了，总会有很多的变数。

体验了几秒钟的生死。

说来是看到司机疲劳驾驶，加之中间有一段路是平路水泥路，就自告奋勇地要求开车。开了几刻钟后，转弯迎面来了大卡车，下意识要躲它，力道有些急，车有几秒漂移的感觉。总结是因平时都开小车，首次开吉普没习惯。毕竟还是一名女司机。在那几秒里，我脑里出现的画面是报纸上报道我们失事的新闻，我下意识地想得如何盖住脸，才会走得不那么难看。又想车里的同伴们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总之，几秒钟过去了，没翻车，出了一身冷汗。想着这大概是去圣地路上的礼物吧。总是时刻提醒你，生命不可预料的短，出乎预想的快。

所以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何止这个，赚钱也要趁早，年过芳华，珠宝也不那么耀眼，锦衣日行都觉乏味。有想做的事情更要趁早，等着等着，一点都不痛快了。所以做这个事情就是“乘兴而来”，大不了像王徽之“兴尽而返”，有“兴”总是好的，有“兴”就有生命力，就怕麻木无痛痒。

到拉萨后，多日的疲劳终于爆发，直接选择赖床了。于是就独自留在拉萨一段时间，去了一个个的庙，求长寿求富贵求子孙求幸福，该求的都求了，剩下的感觉就是佛祖的事情了。

一路上都没有精致可口的饭菜，在一家咖啡馆吃到一份台湾卤肉饭都是感恩戴德。于是定点在那家咖啡馆呆了几个下午，效率极高。有次有人走过看了一眼，说：“这年头还能如此静心也属不易呀”，我笑笑说：“世界与你得浮躁成什么样呀。”

有时候可能是没找到静下来的理由吧。

拉萨数周后，开始感冒了。持续几天每天10个小时的翻译还是很容易疲惫的。很多事情，大脑不知道，身体会知道，不是吗？器官

是有记忆的，每个器官都不傻。比如右肩和颈部开始不停地抗议。所幸此时，第一稿已接近尾声。扛了几天，终结第一稿，飞回北京，得工作了。

接下来的时间，白天出差，各种飞，晚上或者周末的任何时候，开始改。就像生了个丑姑娘，得给她动手术整整容，化化妆买买衣服啥的。大开了几次刀，几个大手术下来，真是精疲力竭。以后也提醒各位看官，码字有风险，动工需谨慎。

然后就是10.1长假了，奔着腾冲而去，这个地方还没开发，一路通行，没堵车，没闹心。躲在森林温泉里，一个人一个池子，抱着笔记本狂改。

第五稿是在和顺古镇的客栈改完的。讨个吉利，岁月静好，土和民顺。

## 后记再话

完稿后，终觉书本里有大量的政治人物、南美历史、风情文化的部分对于未曾前往的读者而言在理解是比较费劲的。于是决定以插图的方式来做一些重要的注解。所以在本书中会有很多原著里没有的信息，希望这是帮助理解的一个方式。

同时，在这个微文阅读的时代，读书大概成为了很大的奢侈，尤其网络信息爆发的时代，品一杯清茶，读一卷纸书已是难得。生活节奏之快，让我们没法把眼睛停下来去看冗长文字里的一点小乐趣，隐藏在大量铺垫里的痛点，亮点和笑点。于是，又把目录改写了，加入了每个章节的引用与梗概。希望这个也会使阅读更顺意一些。

本文需要感谢的人很多。就不说了。

文末附上与本书作者的第一份邮件往来的中西文。出于保护隐私，作者的回信中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已做删除。

## 写给作者的信：

Estimada Sandra, Buen día.

Me pasó tu contacto Gustavo NG.

Soy Eva, fui a Buenos aires a estudiar economía (Posgrado) en 2010, después me quedé allá representando vinos argentinos en el mercado chino. Ahora estoy viajando por China y vuelvo en noviembre.

En la feria de libro de este año, encontré tu libro <<La presidenta: Historia de una vida >> y me encantó. En una semana terminé de leerlo.

Acá en China tengo muchos amigos que son de empresas Chinas que tiene oficinas en Argentina, a ellos les interesa mucho la política, les comenté varios fragmentos del libro y le gustó mucho. De allí, empecé a realizar un intento de traducción aunque me falta muchísimo conocimiento de ambas partes. Y quiero hacer algo que puede ser beneficioso para ambas.

Yo exporto vino argentino a China, y también quiero compartir la cultura argentina con la gente de mi país. Me parece muy interesante traducir este libro, porque este libro esta incluyendo la historia, la cultura , la política, los valores y muchos más.

Intenté traducir sin molestarte porque la verdad es que no se si puedo terminarlo o no. Pero en septiembre, cuando hable con Gustavo en Beijing, por sorpresa que me entere que ustedes eran amigos. Allí mismo, le pedi a comunicarme con vos.

Le quiero comentar algo personal: cuando estuve traduciendo la parte de "Gladis Y Chiche", lloré toda la tarde y toda la noche.

Me encerré en mi hotel en Tibet sin salir . La emoción era tan fuerte que no podía controlarme. Viajé a Tibet para hacer ese trabajo porque necesito un lugar tranquilo. Allí encontré códigos de esa época, cosas similares que pasaron en China, también en el pasado.

Le escribo este email a usted por varios motivos:

1, Quiero agradecer su trabajo, gracias por su tiempo y su paciencia para presentarnos un arte tan especial.

2, Quiero saber si es posible juntarnos en noviembre cuando vuelva a Argentina.

Espero su respuesta, atentamente.

Y te mando beso enorme.



## 译文：

敬爱的 Sandra 女士，您好。

是 Gustavo NG 先生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了。我叫 Eva, 2010 年的时候去阿根廷读研究生，之后就在那里居住。我现在在国内出差，将会在 11 月回阿根廷。

在今年书展上，我看见了您的这本书，非常喜欢，一个礼拜就读完了。我有很多中国朋友在阿根廷开公司，或者负责办事处，他们虽然不懂西文，但是对阿根廷政治很感兴趣。我把其中的一些章节跟他们分享，他们很是喜欢。

我觉得我们对阿根廷的了解还太少，想单纯地想分享一些这边的文化。于是就翻译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包含了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生活习惯、价值观等等元素。

我在翻译的时候并没有告知您，因为我不确信自己会完成它。但是 9 月得时候，我的好朋友 Gustavo NG 代表阿根廷来北京参加作家翻译大会时，我们聊起了此事，发现他刚好也是您的同事。他让我联系您，说您会很开心的。

我想跟您分享一段个人的感受：当我翻译第七章“Gladis Y Chiche”的时候，我在拉萨的酒店里，关在房间里，一边翻译一边哭，从下午哭到晚上，情绪扑来，无法自控。我想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的缩

女总统

影,我能隔着时空完全感受到那个时期的脉搏。那里那时发生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曾上演。

我给您写信有如下目的:

1. 特别感谢您的时间与耐心,来完成了这样一部丰富的作品。
2. 我在11月会回阿根廷,希望我们能见面。

等候您的消息。

吻。

## 作者的回复

Hola Eva!! Me habia quedado intrigada cuando G. me contó por guasap que una mujer china estaba conmovida con el libro sobre Cristina!

Me emociona mucho lo que me contad que te pasa con ese capítulo. Es el mejor. Es en si misma una historia completa. Dos parejas. Una de ellas se iba a deshacer muy pronto, con la muerte de Chiche, y la otra estaba integrada por un chico y una chica que iban a ser presidentes!

Un enorme gusto leer tu correo. Te mando un abrazo y cuando estés por aquí ya nos conoceremos. Sandra.

### 译文：

你好，EVA！！

当Gustavo跟我讲有个中国女孩为这本书动容时，我还非常好奇。

你对我说的对第七章的感受，让我非常感动。这也是本书最好的部分。那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两对伴侣，同是革命战友，两对夫妇曾经住在一起。其中一对，丈夫失踪，饱受折磨后，人生暗淡。另外一对夫妇，丈夫和妻子都先后成为了国家总统。

非常高兴读到你的邮件。给你一个拥抱。当你回来时，我们好好认识下。Sandra.





感谢 Gustavo NG (当代杂志主编, 电台主播) 在翻译过程中提供的巨大帮助。